

2014

朗润之声

Viewpoints in Langrun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成立二十周年

National School of Development
20th Anniversary



目 录

Part I 朗润廿载

1 壹 老师寄语

2 贰 朗润 20

北京大学国发院二十周年
系列庆典活动精彩图集
志愿者：朗润因你们而美丽
合唱团：经双学子感想二则

8 叁 我与朗润

姚洋：我与朗润园
周其仁：在江湖与庙堂之间
汪丁丁：我们一起成长，在朗润园
沈艳：那些年，我们一起上过的班
黄卓：沾光容易，添彩不易，
且行且珍惜
宫玉振：我的朗润情节
徐建国：十七年一瞬间
赵普生：致青春 我的十七年经双路
陈曦：与君同行
行桂英：微风轻拂忆朗润
邢惠清：往事并不如烟

61 肆 朗润印象

文字类一等奖
印象朗润四言韵诗
图片类一等奖
优秀摄影作品选登

Part II 朗润之声

伍 朗润对话

71

李强教授：传统中国何以未能产生
现代资本主义
陈平原教授：学术视野中的王瑶先生
聂锦芳教授：通往《资本论》之路
闵维方教授：中国的经济转型
与北京大学的改革
陈平原教授：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

陆 师门聆讯

87

雷晓燕老师：随心播种 静待花开
宫玉振老师：运筹帷幄内 问道朗润中
刘国恩老师：选择与自由

柒 茶话经双

102

“聚焦朗润 对话双办”交流活动

捌 扬帆职场

117

职场沙龙金融专场、国企公务员专场

玖 薪火相传

120

CCERCLUB 本科生科研分享会

拾 联系我们

122

2014~2015 学年骨干通讯录

拾壹 会刊众筹

1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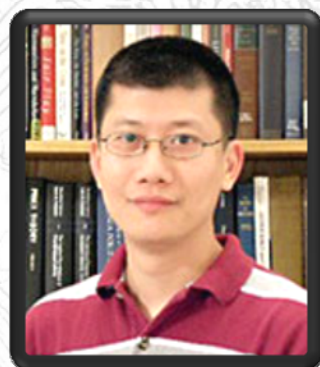
老师寄语

姚洋：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于 1996 年开办经济学双学位项目，至今已经培养了近万名经济学双学位或辅修学生，校友遍布世界各地，许多同学成为各自领域的栋梁之才。我希望，无论同学们今后是否从事和经济有关的工作或研究，在经双的学习经历都会成为同学们的宝贵财富。



张帆：祝中心在创新与传承上达到平衡，把未来建筑在厚重的制度和文化基础上，像松柏一样冬夏长青，像溪水一样源远流长。祝同学们在这欣欣向荣的春日，找到生活的意义，体验生活，奋发向前。

薛兆丰：我的愿望，是让同学们掌握经济学的思维方式、永不停止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我希望与同事们和同学们一道，把国发院变成爱思考者的乐园。





朗
润
20





朗
润
贰
拾



朗润因你们而美丽

——想写一篇短文感谢志愿者

文章简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二十周年庆典系列活动即将告一段落。这其中，不乏志愿者们忙碌的身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团委书记蒋少翔老师作为志愿者团队的总指挥，用文字记录下了这么多天以来志愿者团队中的汗水与感动。

没有人有权力去要求你们付出，但你们却用无怨无悔的热情来奉献。

纵使次日就有期中考试，哪怕下周要交毕业论文。无论是在二层看不清演讲嘉宾的面庞，还是待后台只能窥探创院君子的背影。可以夜里 1 点去机场接机，亦可只睡三个小时再次上岗。一次次的领命与服从安排，一次次的机动与临场调度。你们用完美的服务让嘉宾、校友和观众享受了一场场饕餮盛宴，却只能通过朋友圈观光别人的分享来追踪细节。

你们这群可爱的人！

研究生、双学位，甚至与朗润园毫无关联的学子，都积极参与到院庆的志愿者服务中。我没能参与与领略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团队与精神，但有幸负责安排 NSD20 周年院庆系列活动的志愿者服务。请原谅我的“默认服从”，请原谅我的“临时加岗”，请原谅我的“调剂替代”，请原谅我的“重岗换位”，而事实上你们已经用实际行动回报了我对你们的信任，包容了我的失误与强硬。这种回报是令人感激的，而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崇高的。

学院当为你们感到骄傲，你们才是学院真正的延续。因为认同、因为使命，这是学院努力的成果，从你们的默默付出与热情服务来看，这 20 年是成功的，这 20 年是值得的。从校友的积极响应与踊跃捐赠来看，未来 20 年是更要努力的，未来 20 年是更值得努力的，因为你们的“可爱”是对过去的肯定，而 20 年后作为校友的你们返回母校时的积极与热情才是对学院未来最大的褒奖。虽然本次拍卖现场研究生和双学位校友憾未竞争成功，但你们的学长在捐赠箱里留下的爱心是对学院最大的响应。20 年对于你们还太年轻，相信再过 20 年，30 年，作为校友的你们再返母校时一定是另一番光景。

一个良性的学术机构应是培育学术自由与思想独立的学者和学生，靠的是每位校友与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与广泛捐赠，而不是每一位老师都要卖命地去推销产品，挤占研究。庆幸的是，朗润园就是这样的一片学术净土，因为有这群学者教授们，社会各界才会大力支持；因为有你们这群未来之星们，校友才会踊跃捐赠。朗润园的这种精神与传承，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捍卫，而我们每一个人也愿意去捍卫！

为了节约和服务校友，你们成为最机动的用餐群体；为了志愿者的工作，你们连生日都不能陪密友度过；我甚至无法满足你们每人一件合身的院庆 T 恤，你们却愿意一整天一整天的志

愿付出。即使身体抱恙也要站好最后一刻岗，即便没被安排岗位也要主动索要任务，本来通知一个上午材料装带却一直站着工作到晚上，已然透支身体却仍然调整到最好的姿态微笑服务.....

我为你们的辛劳而心疼，更为你们的付出而感动。朗润因为你们而美丽，学院因为你们而荣耀，研究生、双学位——志愿者，这也是一种精神与传承。

谢谢你们！

2014年4月20日夜于燕园

撰稿人：蒋少翔老师

20 周年院庆之合唱团

参与学生感想（1）

“红楼飞雪，一时英杰……”在国发院二十周年院庆晚会上，双学位合唱团演唱的《燕园情》是开场节目，也是代表双学位三千名学生的唯一节目。伴随着或高亢或低沉的歌声，同学们一起见证了这十年一遇的荣光，也在他们各自的经双记忆里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3月23日，CCERCLUB联系北大合唱团成员，组织数十位双学位在读学生开始在朗润园进行第一次排练。分声部，连声，识谱……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着。不过，从第二次排练开始，计划赶不上变化，朗润园教室均被占用，同学们只好站在露天大院里排练。同学们都说，在朗润园的院子里排练是最难忘的事情之一。当时正值阳春，柳絮因风四起，同学们张口练声，柳絮不免“误入”，颇为恼人。然而，在和煦的阳光下，纷飞的柳絮与朗润园的朱红楼宇交相辉映，唯美动人。同学们苦中作乐，笑侃之：“真是名副其实的‘红楼飞雪’啊！”经过短短几次排练，一曲悠扬的《燕园情》萦绕在朗润园上空。随后，同学们满怀激情，将歌声带上壮丽的舞台，献给了敬爱的国发院……

合唱团最终的圆满演出离不开幕后工作者的辛勤汗水。在双办三位老师的全力支持下，CLUB中负责合唱团的小伙伴们分工合作，忙前忙后，从策划，到协调，从分发演出服，到帮女同学们购买别针，他们事无巨细地服务着，赢得了同学们的一致称赞。

对于参加合唱团，同学们是无怨无悔的。在短短的几次排练里，他们结识了又帅又萌的指挥CK和许多经双的小伙伴，收获了宝贵的友谊。正如一位参加排练的经双同学所说的：“参加合唱团的机会成本是放弃五六个周日上午的时间，收益却是新的友情、难忘的人生经历，当然还有与胡海泉近距离接触的机会、双办老师倾情献上的免费午餐、补助……在我们排练的最后一天，总导演刘谦老师向我们致谢。其实，我们想谢谢国发院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丰富了经双生活。”

撰稿人：朗润之声 罗彤

20 周年院庆之合唱团

参与学生感想（2）

真的很开心加入经济学双学位合唱团，在国发院二十周年的晚会上成为其中一员。我是在论坛上看到这个通知的，觉得会特别好玩，又可以认识很多好朋友，会有一段难忘的回忆。但是挺犹豫的，因为自己音不是很准，然后就有点恐惧，怕丢脸。不过好在小伙伴们的鼓励，大家就索性都一起报名参加了。所以，感觉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小伙伴们在合唱团还是算队伍庞大的。

刚开始特别担心自己的音不准，会拉低大家的水平，毕竟我们都不是专业的，但是帅萌指挥特别耐心的纠正我们的音准，还时不时地讲个笑话，逗乐大家。很快地大家就进入了状态，积极训练，跟着帅萌指挥的节奏“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练习气息，特别欢乐，水平绝对是突飞猛进的。自从修了经双以后，真的很难有周末，也很难和这么多小伙伴相聚在一起，尽管大家有各种事需要忙，但是大家都会留出周日上午的时间参加训练，这不仅仅是因为大家对合唱的认真也得益于我们的后勤服务人员。特别感谢我们的后勤人员非常体贴周到的服务，在每次训练的时候，总有零食给我们这些吃货惊喜，在这里我还不得不说，经双办公室给我们的午餐真的是太丰富了。一起在朗润园吃汉堡，啃鸡翅的日子。真的很难忘。当时正值柳絮纷飞的日子，在燕园红楼中，柳絮飘满整个院子，为我们“燕园情”的歌曲伴奏，为我们的努力鼓掌。

期待了好久，终于到了表演的那天，第一次穿那样的漂亮的长裙，大家都欢喜不已，在镜子面前舍不得离开，还拿上手机找小伙伴拍了各种不同姿势的照片。上台之后看到指挥给我们的各种，短句，开唱，轻重的手势，我们还是顺利圆满的完成了任务。谢谢帅萌指挥带领着我们一群五音不全的人，完美的唱出了我们对于燕园的感情。

这次合唱的经历，不仅收获了欢乐，友情，还有对北大，对国发院的热爱之情。到现在为止，还会不由自主的哼起燕园情“红楼飞雪，一时英杰……”

撰稿人：朗润之声 季欣

我与朗润园

[我与朗润]之姚洋老师

我与朗润园的渊源——确切地说，我与朗润园里的几位前辈的渊源——一起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时，我是北大管理中心的研究生，有幸参加了体改所和发展所组织的北大、人大、南开三校经济学研究生研修班，近距离地接触到了周其仁、王小强、陈锡文、宋国青等一批青年明星学者。当时的他们尽管也只有三十出头，但已经是我们这些更年轻一些的学生们膜拜的对象。从他们身上，我们学到最多的东西，是养成了关注现实世界的兴趣。尽管我们可能无法理解他们的家国情怀以及改造世界的雄心，但是，对现实的关注却让我们受益终身。

和林毅夫老师相识，当然是我和朗润园缘起的起点。那天是 1988 年 1 月 2 日，刚刚下过一场大雪，我和另外两位同学转了好几次车，才到达西直门内一座军队招待所里，去见孙来祥老师介绍的那位神秘的留学归来的“台湾老师”。林老师和我们谈了一上午，现在记下来的，只有他问我们的一个问题：如果你去新疆贩西瓜回到北京来卖，你会贩最好的西瓜、还是最差的西瓜？这个问题现在成了我在面试研究生时常问的一个问题，但当时的我们，连回答这个问题的门都摸不着。自此和林老师结下的 26 年缘分，影响了我的一生。和林老师做硕士论文的一年半时间里，大概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发展所度过的，但是，作为小字辈，对那些敬仰的明星学者 --- 周其仁、陈锡文、邓英淘、杜鹰、罗小朋等 --- 还只敢远眺，没有直接交流过。有一次，和周老师同时在六里桥下公共汽车，往发展所走，但就是不敢和周老师打招呼，尽管周老师闪着招牌式的水晶般明亮的眼睛看了我一下（估计他不认识我）。

和林老师做论文，是从在电脑前输数据开始的。后来在芝加哥的一次留美经济学会的聚会上，我才从林老师那里知道，我输入的数据，是他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那篇著名文章用的。后来又学会了查英文论文。文革期间的外文期刊，只有社科院经济所图书馆里有。记得我到那里查论文的时候，图书馆的老师兴奋不已，带我到地下室找到了蒙满灰尘的杂志。我后来的托福和 GRE 考试成绩还能达到差强人意的标准，和读英文论文分不开。林老师给我布置的硕士论文题目是研究中国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要我应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后来论文答辩的时候，管理中心的陈良焜老师的评语是：“林毅夫带学生做的东西比较俏。”期间也有和林老师争论的时候，现在想起来，都是因为我没搞懂造成的。记得那次争论之后，第二天再见到林老师，刚好是中秋节，他拿起桌上的一块月饼，掰成两半，自己吃一半，给我一半，说：“都是年轻人嘛！”这就算过去了。

那时大家都申请出国，而申请需要报名费。我向林老师提出借钱，他让我到他家去取。那时他们家住在黄寺一带。我骑自行车到他们家的时候，已经大汗淋漓，林老师夫人陈老师来开门，我发现林老师家里铺着地毯，正不知所措之时，见林老师光着脚走过来，自己也就把凉鞋脱了，光脚跟着林老师走进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走在正儿八经的地毯上，而且是光着脚！甫坐

定，陈老师就端出一碗绿豆汤给我喝，那甘爽的滋味，至今记得。我拿了林老师给的钱，从此再没有还过。

第一年申请没有成功，我只好回到西安，进工厂工作两年。这当然是我最低谷的两年，因此给林老师写过一封信，他回信鼓励我要坚持。两年之后，我终于到威斯康辛大学农经系读博士。1994年夏天，沈明高到麦迪逊开会，告诉我林老师要在北大成立一个研究机构，而这年秋天，林老师到麦迪逊做讲座，我就和他提出要回去工作的想法。到1996年初，我上市场上找工作。当年的AEA年会在旧金山开，CCER的三位主任和副主任，林毅夫、易纲、海闻，都到了。我的面试大概是在海闻的房间里。因为刚下飞机，林、海二位老师基本上在睡觉，只有易纲老师问我问题。其实也没有问什么，现在只记得易老师说：“我们对你都很熟悉。你回去等消息。”现在每次参加AEA年会面试求职者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汗颜：如果当初易纲老师也像我今天面试求职者这样面试我自己，恐怕我得不到CCER的工作。

因为要等太太读完书，我回国的时间推迟了半年。我们全家回到北大的时间是1997年1月1日深夜，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校园既熟悉、又陌生。第二天，张维迎和卢锋、胡大源、张帆到勺园请我吃饭，这个待遇太高了，至今难忘。因为燕北园的房子还没有完成，我们全家在勺园住了一个月。天天吃食堂，有些腻了，一天晚上我就拿着饭盆去北大南墙外的饭馆里买饺子，发现价格是28元一斤，掐指一算，北大给我的月工资只够吃十斤饺子，于是我明白，这饺子不是我能够吃得起的，扭头回到勺园，和太太、儿子接着去吃食堂。想到当初我一个穷学生还能够时常到西南门外的长征食堂吃半斤饺子、喝一瓶啤酒，心里当然不是滋味。好在有福特基金会资助两年，其后CCER又开办了BiMBA项目，形成了自我造血机制，否则生活水平真会低于学生时代。

最欣慰的是，CCER已经于1996年底搬入朗润园，我不再需要像前辈们一样，在老地学楼挤两间半的办公室了。由此，CCER开始了和朗润园不解的情缘。

回顾起来，CCER和今天的国家发展研究院（NSD）有两个渊源，一个是发展所和体改所，另一个是留美经济学会。林毅夫、周其仁、黄益平和沈明高是发展所的，宋国青和张维迎是体改所的；易纲和海闻做过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其后加入CCER或NSD的陈平、张晓波、刘国恩和林双林也做过留美经济学会的会长，留美经济学会的现任会长是CCER第一届硕士生倪金兰。CCER和NSD的性格，也是由这两个渊源决定的。二十年来，CCER和NSD开创了中国经济学界的多个第一，但很快被其它地方所模仿（比如，除CCER之外，国内还有三个“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但是，CCER和NSD的灵魂是他人无法模仿的，这个灵魂就是现代经济学和中国现实的紧密结合；这里的老师们不仅做严谨的经济学研究，而且关注和参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进程，用林毅夫老师的话来说，就是：“我们在创造历史”。

民国离今天并不遥远，但众多民国人物已经成为人们畅谈的传奇。这样的传奇正在朗润园里发生。

撰稿人：姚洋老师

在江湖与庙堂之间

[我与朗润]之周其仁老师

在北大，周其仁是曾被学生评选的“最受欢迎教授”之一。每逢上课，能容纳三四百人的教室都被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要靠放座号来维护选了课的学生的“权利”。

在中国经济学人的圈内，他被认为是“学也学不来”的学界楷模。几十年来，他奔走、扎根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用脚力、头脑和心来观察、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问题和变革。

上午9时，未名湖畔北侧，一座朱门青砖的古典风格庭院在晨光中安静矗立着，与清朝皇家风格的朗润园浑然一体。精巧的朱门旁挂着两块白底黑字的牌子——“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简称“国发院”）。

两块带“国”字的招牌，光绪年间内阁、军机处会议的旧址，一时令人联想起古往今来多少读书人“经世济民”的人生情怀。

在这庭院右翼的一个小间里，头发银灰色的周其仁已伏案忙碌许久。眼下，他正在完成旨在分析中国土地制度变革的著作——《城乡中国》的下部。

两小时的采访在一种充满张力的“叙事”中急速地流淌而过——他逻辑缜密，又充满细节，每回答一个问题，都会给出一个来自真实世界的生动故事，张弛有致地调动着听者的情绪和思维。

在北大，周其仁是曾被学生评选的“最受欢迎教授”之一。每逢上课，能容纳三四百人的教室都被挤得水泄不通，以至于要靠放座号来维护选了课的学生的“权利”。

在中国经济学人的圈内，他被认为是“学也学不来”的学界楷模。几十年来，他奔走、扎根经济调查研究的第一线，用脚力、头脑和心来观察、理解转型期中国社会的问题和变革。

自80年代之初，这位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者往来穿梭于“江湖”和“庙堂”之间，几乎参与了中国的每一步，“为推动中国农村改革做出了尤其重要的贡献。”（韦森语）

“理性，激情，雄辩，治学仍不忘忧国。”在回复记者的短信中，财经传媒集团总裁戴小京用12个字来概括这位80年代的老同事。

一个经验主义者的成长轨迹

1978年早春，在北大荒农场的一只高音喇叭下，28岁的下乡知青周其仁一边听着恢复高考的消息，一边盘算着自己如何填写志愿。因为年龄偏大，他不得不放弃了北大，在第一志愿上填了历来招大龄学生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

此时，他已在中俄边界下乡整整10年，其中在山中狩猎7年半。

10年前，他坐了四天三夜的火车，带着相信伟大领袖提出的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

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劳动差别)的狂想,如愿来到黑龙江建设兵团农场。

在这里,他学会了割草、锄地、扛粮食等各种粗重的农活,不以为苦,反觉得“大有可为”。不过,这个上海来的中学生满肚子“高见”,喜欢批评这个论断那个。半年后,他没能当上人向往的拖拉机手,反被连队领导发配到山上打猎。

在完达山上,他跟着师傅每天巡查遍布深山老林里的几十个“陷阱”,诱捕野鹿、圈养、然后割鹿茸。山上不用出操,也不用“天天读”,且不受准军事管理的束缚。很快,他喜欢上了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一待就是七八年。闲暇时,就在窝棚里翻读着父亲从上海邮寄来的书刊,其中有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和《国富论》。

在寂静的大山里,他一边从事着几乎自给自足的狩猎和畜牧,一边读着从“惊人、庞大的商品堆积”后面被《资本论》作者发现的理论,以及亚当·斯密所说的“分工水平是理解经济现象包括富裕程度差别的一个关键”——那是多么远离眼前生活状态的概念和图景。

源源不断寄到山上的书包,也引起了农场工作人员的注意。有一天,周其仁接到通知,让他下山到团部一趟。在团部办公室,一个年轻人坐在乒乓桌上,开始考问他各种理论问题。后来他才得知,这是现役军人领导的农场,为展开“批林批孔”、读6本马列原著招理论教员的面试。考官不是别人,正是后来在80年代的北京闻名天下的“四君子”之一、时任黑龙江建设兵团四师理论教官的朱嘉明。

等他和朱嘉明再次相遇时,已是1978年的北京。

当年的北京,百废待兴,社会的各个层面都热气腾腾。10年的农村生活经历,让他无法满足于课堂上教授的那些经典。他和同学们传阅各种书籍和有关国外现代化的报道。一次在西单墙,他不期而遇已考入中国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的朱嘉明。

交际广泛的朱嘉明,把他带入了一些跨高校的读书和问题讨论小组。在一次聚会上,中国社科院的研究人员带来了一个来自现场调查的重磅消息:由于大旱造成饥荒的威胁,安徽当地的农民偷偷地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当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农民吃饱了肚子。

这让在农村生活过的青年们异常兴奋——在贫困好像与生俱来的中国农村,原来也存在迅速改善生活的路径!可是,这样的事为什么还得不到上层和社会的认可,要偷偷地搞,这是为什么呢?

此时的北京城,关于“方向”和“产量”之争尚不见分晓,甚至被视作改革开放“序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一个农业文件,仍明确表示“不准包产到户”。

因为投稿的机缘,周其仁结识了在《未定稿》杂志当编辑的王小强。两人合写了一篇论证包产到户的文章,到处投稿无门。一位前辈权威得知此事,对北京农科院院长秘书赵晓冬叮嘱说,“可不能理这两个家伙”。

不久,周其仁遇到了对他一生影响至深的人——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

此时,这位“中共内部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刚平反复出,出任国家农委副主任一职。从人大经济系老师白若冰那里,他听说有一帮年轻人在讨论的一些话题,很感兴趣,说要“见

识见识这帮小年轻”。于是，热血青年们被稀里糊涂地带进了杜润生家。

“我们当时不知道他是谁，更不知道他是多大的官，大家七嘴八舌地在那里争着说，他在一旁听。这个老头有磁性般的吸引力，他特别会问问题。其实，我们的看法还很幼稚，他也不直接批你不懂，而是通过跟你讨论，把你引向深入。”

杜润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假期到安徽农村调查“包产到户”的机会。1981年夏天，二十多人组成的调查小组拿着国家农委开的介绍信，坐着火车硬座到了1977年后包产到户的发源地安徽滁县。兵分三路，王小强、周其仁被分在综合组，他们跑遍了定远、凤阳、嘉山等地农村，白天走访当地的干部和农民，晚上整理访问纪录，也看到了衣不遮体、一家人穷到只有一条裤子穿的可怕贫困。

那份研究报告后来被送到了中央高层。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说，这份报告“把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问题讲得一清二楚”。后来，他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提出：中央的经济决策必须以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基础，要求中央国家机构从有下乡经历又读过大学的年轻人中抽选500人来做政策研究工作。

1981年底，中央发布了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一个一号文件，给予农民创造的包产到户以合法地位。

1982年，还没毕业，周其仁随着同学陈锡文、杜鹰一起，被提前“分配”到杜润生门下。编制设在中国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办公地点在西直门内半壁街，调查研究工作则由杜润生领导的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直接领导。

1985年年初，发展组“分流”，部分成员去了刚筹办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陈锡文、邓英淘、罗小鹏、杜鹰、白南生、高小蒙、谢阳、周其仁等继续专注于农村研究。次年，农村发展组变更为国务院农研中心直属的发展研究（简称发展所），由杜润生直接领导，王岐山是第一任所长。

一年中的大半时间，他们在全国各地的农村做实地调研，常常一次出发几十天在外。每人都背上一袋子书下乡。戴小京回忆，他们俩有一次到安徽凤阳调研一个多月，白天走访，晚上整理记录，“农民家里晚上没有电，就点个油灯跟农民聊天、喝酒。”

每次从农村调查回来，头一件事就是向杜润生做汇报。“汇报之前，我们那群年轻人最当个事，整宿熬夜地准备材料，因为知道在杜老面前不容易过堂。”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认识层次上去了。

“哪些是你真把事情搞清楚了，哪些只是你猜的、想象的，杜老很容易看出来。他就听，问你问题，从来不会批评你，就有很强的感召力让你再去把事情搞清楚。如果真搞得比较清楚了，他就会很高兴。那时候得到杜老的一点肯定，我们会非常开心。”

周其仁说，在杜润生身边的日子，我们年轻人总有的毛病“像打铁淬火一样把杂质磨掉了。”

“年轻时候都是一样的，慷慨激昂，拔出一把刀说我要怎么杀，怎么去改造世界。后来才知道你脑子里想的很多治国救世方案，其实是因为对实际情况还根本不了解。等你真了解以后，

还有很强烈的愿望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那就不容易了。”

在农口的 10 年，基本奠定了周其仁的学术风格和“气味”——不折不扣的经验主义研究路子，以及在各种现实得约束条件下寻找解决问题的路数。

他说自己特别喜欢顾准在 1972 到 1973 年间写的一本文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这反映了我们那一代人思想方式的转变。”

在灰暗绝望的个人境遇中，顾准这位少年时即投身革命运动的思想家仍对自身和国家进行反思，提出一个类似“娜拉出走”的问题——革命夺取政权以后怎么办？他认为，最要紧的是“清醒地看到问题所在，知道我们已经解决了什么，哪些没有解决，哪些是走过了头，实事求是，而不是教条主义地对待客观实际”。

周其仁说，杜老后来和他们这些年轻人讲：要有理想，但不能理想主义，你们有理想还得要跟经验结合，跟你所处的时代、跟国家的实际情况结合。

1990 年，在风雨飘摇中，农研室被解散，两百来号员工听候发配。当时在英国访问的周其仁折道去了美国，随身只带了一套西服。他先后在科罗拉多大学、芝加哥大学做访问学者，1991 年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经济史的博士学位。

在海外，牵动他的仍是中国问题。他对美国经济学界盛行的“黑板经济学”兴趣寥寥。泡在大学图书馆的日子里，他读科斯的交易费用学说，读巴泽尔“关于主动资产”的分析，读阿尔钦的产权理论，心目要解释的现象，还是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制度变迁的路径。

发展组成员之一、清史学者王高凌曾撰文回忆，1993 年他随已退休的杜老去福建，老人在车上感慨：“要是这时候（宋）国青、（周）其仁、（高）小蒙都回来了，该有多好！”

“这是他心里的几员爱将。”王高凌说。

发展所的学术协调人

在 80 年代的改革史上，发展组及后来的发展所可谓赫赫有名。

从 1982 年到 1986 年，在杜润生的统帅下，后来先后任所长的王岐山和陈锡文，带着一批年轻人一道参与了中央农村发展与改革政策的制定过程。

有一年，中央“一号文件”通过程序后，杜润生派王小强、周其仁去国务院印刷厂负责最后的校订。他们知道责任重大，工作很仔细。等到文件付印时，周其仁才突然意识到，这份党内文件印出后，自己是不可以过目的——文件只传达到县团级，而他连党员都不是。

在农研中心老同事赵树凯、蒋中一、何道峰的记忆中，周其仁是发展所中的“领军队员”之一，“思想具有穿透力，逻辑性很强，对问题高度敏感，理论比较超前。”相比王岐山、陈锡文擅长组织、领导的干才，周其仁的角色更像是一位“学术协调人”。

“其仁说话是很有煽动力的。”忆起当年开会讨论的场景，如今是昆百大董事长的何道峰笑出声来，“我后来和他开过玩笑，说他光做学术研究是可惜了，如果在别的地方，他或许可

以成为一个鼓动家。”

在这一帮老同事们看来，除了研究能力突出，好口才也助了周其仁一臂之力。

当时在农研室联络室工作的蒋中一说，周其仁是最早提出了城乡不平等的人之一。“大概是 83、84 年，当时农村包产到户已经完成，大家在讨论下一步改革该怎么走，内部讨论得很热烈，观点很多。他们几个人就提出为什么农民的身份和市民不同，认为户籍制度把国民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群体。”

关于农村改革的“第二步”，研究小组提出的另一项更重大的议题是：改革已存在 32 年的粮食统购统销体制。

在被饥饿记忆缠绕着的共和国史上，粮食问题一直被视作危及国家安全的重大议题。蒋中一说，当时许多中央部委包括农业部、商业部、计委的一些司局长们都有抵触，“情感上、政治上都有，非常坚定地认为粮食必须进行管制或半管制。但是，其仁他们问为什么非要政府管制？难道粮食这种东西没有商品属性么？”

周其仁后来回忆，他们那个小组对这个问题下了很多功夫。最早提出全盘改革统购统销制度的是宋国青，一起跟进的还包括罗小朋、高小蒙和向宁。为了验证有关想法，粮食研究小组曾在江西、广东等地做过系统的调查研究。在杜润生的肯定下，还选了河北一个地方做试点。

1984 年 9 月，一帮中青年学者在莫干山召开了一次在中国改革思想史上具有标杆意义的会议。会上，除了著名的价格“双轨制”外，白南生、周其仁所在的农村经济小组讨论了如何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和改变农村产业结构的可行性办法。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秘书长张劲夫双双派出秘书上山听会。会后，各小组派代表下山，向正在浙江考察的张劲夫汇报。周其仁代表农村经济组参加了汇报。

回京后的一天，周其仁接到突然通知，让他到中南海西门跟中央领导出差。等被中央警卫局的车子送上专列，他才知道中央领导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一开车，总理就召集开会，谈着谈着，他让“农口”来的小周谈谈“你们那个改粮食体制的想法”。

是年年底，国务院总理到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讲话，宣布实行粮食合同订购政策，正式开启了改革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波冲击。

1985 年，统购统销改革的第一年就出现了粮食减产的现象，产销区两头“摆不平”。加之货币超发引起的通货膨胀，粮价较大幅度上涨，市面上出现恐慌抢购，甚至发生了激烈的干群冲突。中央内部和社会各方诘难四起，令杜润生和方案小组都受到了压力。

最终，中国的粮食市场化走了“很漫长、很艰难”的二十多年，终于终结了统购统销体制。

“能说的，不如会听的。”离开“农村改革的参谋总部”后，周其仁如此理解“建言”，“听的人最难，他要在各种约束条件下做选择，职位越高，受到的约束越多。而且，对这些约束条件，建言者往往并不知道。听者会听，才下得了决心决策。”

“当年，我们有幸接触的到那些很会听的领导人。”

回顾过往，戴小京说：现在当作一般常识来看的东西，在二三十年前是看不明白的，当时

有各种各样的观点，一路都有争议，“也许其仁那时候就预测到了。”

他和周其仁在 1986 年合作执笔完成的研究报告《农民、市场和制度创新》，记录他们那时对农村产权改革的认识：农户的土地经营权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表现”，否者“倒退也就难以制止”，一旦重建这种权利，整个国民经济体制将需要全盘变革。

归国 10 年后，周其仁从 2007 年起又一头扎进老本行——对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实地调查研究，试图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找到一条变革现行土地制度的可行路径。

有人说，“几乎每一幢新大楼下都埋着故事。”在中国近十年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过程中，由于国家征地、拆迁而使地方政府和农民、市民之间的冲突、暴力事件频频发生，已成为当下中国最尖锐的社会矛盾之一。

2013 年 11 月，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其中，对农村土地体制改革有了突破性的表述，对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宅基地的流转、入市开了一道有条件的“口子”。

我问周其仁：如何看待当年的“战友”、如今身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的陈锡文此后频频在公开场合发表的坚守“四个不能”等“后退性”言论？

“幸亏有个陈锡文！”他很干脆地回答。听者一脸愕然，他又补充：“我是在逻辑上有点不同意见，其中也包括锡文的。但是，从推进改革来说，幸亏有个陈锡文。”

“中国的改革怎么可能喊个口号就一路春风呢？都是一波三折的。改革的需要从来先在某些局部出现，与全局的普遍状况有不小的距离。局部先行的改革还不能与‘大部队’脱得太远，更不能对立。锡文现在是负责中央农村政策的大官，他当然要着眼于全局。中央就要站得比较‘中央’，不能冲到最前面。老话说守正出奇。中央守正，一些地方才能出奇。出奇能致胜当然好，逐步推进就是了。万一受挫，也无碍大局。因此，千万别以为‘保守言论’一定有害于改革。很多时候，‘保守’恰恰有助于改革，因为这样才能让改革不翻车，它拉着你、扯着你，提醒局部先行的改革举措顾及各种复杂的力量和诉求，要求改革的操作非常仔细。当年农村改革都这么来着。一路狂冲下的‘改革’，容易翻车。最后，所有的尿盆子都扣在改革的头上，让改革背黑锅，欲速则不达。”

周其仁说他很欣赏这么一句话：“天下的江河很少有直直的，都是拐来拐去的。为什么？水要跟大地妥协。当然最后水还是往东流了。那是挡不住的。”

缝出一幅“真实世界”的图景

一年中很多时间，周其仁喜欢跑在各地做实地调研，农村，企业，城市。凡是真实的现象，他似乎都有兴趣。

2004 年，他一脚踏进江苏常州人民看守所。隔着铁窗，和铁本案的“主角”、民营企业家、刚刚入狱的戴国芳进行长达 4 个小时的交谈。

这是他的调研“军规”之一：“风口浪尖时，不能躲，要尽可能到现场去，这是获得真实知识绝好的机会。”

一说起和周其仁调研的经历，自称外行的北大学者薛兆丰会频频使用一个词——“厉害”。

一下飞机，冲在队伍第一个的一定是他。他已经和接飞机的人聊上了，开始问问题了。途中，车在不同的地点之间奔波，二十多人的中巴上，大家都一个接着一个累得睡着了。耳朵里只听他的声音，他还在不断地聊，问问题，最后被他问的人也累得睡着了，他还在那里东张西望，看田野，在思考什么。

没有人能赶得上他，他的精力太旺盛了。原因之一是问题本身会激发他无穷的精力，他只会关注激起他兴趣的，然后就抛开一切，抓住问题的本质。

2009年，我曾和其仁一起到内蒙古做一个和食品安全相关的课题调研。白天，我们跑到养牛农户那里做调查，当时室外是零下二十多度，养牛棚里也有零下十多度。我们都想的是问几个问题就赶紧回车里。结果，他拉住农户，在养牛棚里不停地和他聊，不停地问。

这里也有他的语言天赋，他好像什么方言都听得懂。还有钢铁一样的肠胃，什么都能吃得津津有味。白天的调研结束后，晚上回到住处。他先召集同学们坐下来开会。等会结束，差不多已经快晚上11点了。他还有一个客人来访，等到来访已是凌晨1点，他们还在那里聊。我们都累了，同学们也累了，只有他一个人还是两眼放光。

他每天见很多人，名字，官职，来自的组织和部门，很多信息的碎片。你会很惊讶地发现：他在任何时候都能把这些碎片缝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调研能力不是一两天能够做得到的。

在北大国发院，愿意跟着周其仁出差做调研的老师和学生可以排上一个长队。薛兆丰形容：“只要他愿意带，一招手，学生们都会乐意放下手头所有的事，跟着他跑，去给他当助手。”

国发院一些学生毕业后留学国外，就读于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这样的名校。每年12月，北美那边一放圣诞假，第二天他们就出现在成都附近的县城里跟着周其仁做调研，一直待到假期结束前一两天才请假离开。

“我跟他们说：你们都已经在走不同的路（美国主流经济学的路）了，在美国用数学公式写论文，有导师，还跑回来跟周老师做农村调研干什么呢？他们说：因为这样跑跑很有启发。”

关于如何做社会调查，周其仁可以给新闻记者和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们上几天几夜的精彩课程，关于他的调查法则，他遭遇的故事和人……

我是不会喝酒的。但喝酒这个问题，我已过关了。最早时候在安徽做调查，农口喝酒的风气很重。因为一到基层，你不跟他喝酒，他就不好好跟你聊天。我是真不会喝酒，同时我也不喜欢，耽误时间。他们中午喝酒，喝了后下午就没法好好跟你谈了；而且那个氛围，你要不喝酒，你很难跟他们混在一起，这曾是我的很大问题。

后来，我找到一个法子。当时我们所里有一个计算机，上头连着一台小打印机。我就打了一个图，放在衣服口袋里。一到喝酒的时候，我掏出来，说你看，这是我的心电图。在场的人

一看这个，算了。等时间长了，大家就会知道这个人是真不会喝酒。

你如果有问题意识，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开门钥匙。你跟他讨论，利用那套发问的办法。很多人觉得他虽然在这地方待着，有些事情他也不了解，你把他问倒了，他就很有兴趣给你聊下去。

我后来发现，你探察世界的这种好奇心本身也会感动一些人的。其实，人多多少少都对这个世界到底怎么样有一点好奇心，也有兴趣想知道他不知道的事情。你就发现，所谓的调查研究实际上就是一个探索过程，大家一起来“缝”，东补一块，西补一块，我们一起把这个图像给缝全了。

很多人说，你怎么那么会跟人聊，怎么到哪都能问出问题来，人为什么愿意回答你的问题。我自己心知肚明，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异功能，就像驾驶员一样，你是飞过一万小时的人就多少不一样，你再聪明，再伟大，再天才，续航时间不够就差点劲。

这首先是一个态度，你如果真想弄清楚事情，没有什么搞不清楚的。当时在杜润生那里，我们小组里就这么一句话：不是什么能力和智商高低的问题，你就是续航时间不够长。在农口当年，我们每年多少趟出差得出去跑，这个没什么窍门的。

一旦你对中国社会真正深入进去以后，它的方方面面都会展现在你面前。如果你像一个挺纯真的青年，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一看和纸面上不一致就一惊一乍。人家不敢给你讲了。真实的社会就不是那么黑白分明的。如果一个事情不是个别的，就是系统里头有问题。

总的说来，我对哪类事情比较有兴趣呢？就对“事与愿违”的事情比较感兴趣。你说搞人民公社的出发点不好么？毛主席当年就是想把农民穷成这样？我不那样认为，他领导这个国家，怎么会要那样的结果？问题是经济规律。

等你把这个道理揭示出来以后，实际上所有的当事人在某种程度获得一种解脱、解放。这就是体制改革，否则就变成对人的改造。人是很难被改造，所以我们说“文革”是个狂妄的年代，以为可以改造人。等游戏规则改变以后，人的行为就不同。

经济学家汪丁丁曾和本刊记者讲起一桩往事。2000年左右，有关方面组织了几位如今都颇具知名度的经济学家去横店做调研。汪丁丁是调查报告的审阅人之一，那时他还不认识周其仁，阅读中，他被一份深入透彻的报告所吸引，大呼精彩。后来得知：有几位学者转了一天就回北京了，只有周其仁在那里蹲点了足足10天，访问所有重要当事人，还泡在档案室里一份份读院士记录。

提到这些年国家机关盛行的调研风气，周其仁忍不住批评了起来，“离当年农研室差个十万八千里”，“哪是在调研，他们是巡视，对事情到底是怎么样没兴趣，感兴趣是到底摸准上面的心思没有，看能不能迎合。”

他也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调研“口碑”，恪守保密原则，远离聚光灯。网上流传他的照片，大多是他在各种研讨会现场的抓拍照。他喜欢人家不认得他，交谈起来才自然。

走另一条制度经济学研究路径的汪丁丁一直鼓励北大学生去跟周其仁学习做社会调研，希

望看到有谁能模仿到他。“遗憾的是，目前没有一个学成的。”

汪丁丁对周其仁在社会调查方面的成就评价很高。他甚至认为，周其仁已超越了享有世界级声誉的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因为费老的‘乡土社会’基本是稳定不变的，而其仁后半辈子调查的是急速转型期的中国社会。转型期，多么困难！”

大约 2003 年前后，两人在西湖边有一次对话。“我让他注意身体。他回答我说：丁丁，大多数省份和企业是我以前就拜访过，可能拜访过多次。但是变化太快了，几年不去就要再拜访一次才跟得上变化。”

汪丁丁视周其仁为兄长。除私谊外，他说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从其仁的感受中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

“其仁的感受，总是比任何人都更贴近中国社会的重要问题”。

“微妙”的逻辑与艺术

在和庙堂咫尺之遥的中国经济学术圈里，周其仁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

譬如，他是一个较少挨公众骂的市场派经济学家；譬如，他多年来一以贯之地反对政府干预市场，却依然是被中央到地方很多政府部门所倚重的学者，陆续担任过央行货币委员会委员、证监会发申委委员等“显赫”要职；譬如，他和权力一直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尽管人们都认为他和新一代的“他们”之间有某种历史渊源。

人们习惯拿他和动则犯“众怒”的自由派学者张维迎、茅于軾、许小年等相比。他和这几位都是好朋友，只是讲起话来有所不同。而与一些曾为政府政策“背书”的“高参”学者相比，他又以自己的独立而赢得了认可。

财经作家苏小和曾用《圣经》“灵巧像蛇，驯良如鸽子”来形容他的分寸感。比喻出自《马太福音》，耶稣在打发门徒外出传道、治病赶鬼前，勉励他们要像鸽子一样良善温柔，又要像蛇一样讲究策略。

听过周其仁讲座的人，多少领略到其话锋的犀利。他也承认，自己的文字表达与口头表达差别很大，“经常自己的一篇讲话稿也会改上一整天，可能这也是个坏毛病。”

在他不温不火的文字中，你也清楚地明白，那些“商榷”针对的是哪一类观点、哪一些人。

周其仁说，自己只追求“把话说准”。

“什么叫分寸感好？”他略有几分抵触，“所谓分寸感好，一个是说你政治上的谨慎，一个是把话说准确。现在很多人认为不把意见讲过头，就不会引起注意，我认为这有点偏颇的。问题是你说话到底准不准？”

和周其仁共事 4 年的学者薛兆丰用“subtle”（义为“微妙”）来形容他的语言风格。“为什么各方面都会买他的账呢。一是因为他的观点都是以事实和经验为依据的，这是最强大的。第二个，就是他的微妙。”

“他不是好好先生，他不中庸，他只是 subtle（微妙）。”薛兆丰笑着分析，“他知道自己的方向，但他要‘说得通’。而且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方的力量在博弈，这些你都不能忽略，你怎么去说服他们，所以，他会表达得很微妙。”

这样的微妙，自然不会让媒体觉得“过瘾”，因为“不够刺激、不够非黑即白”。

如果把这种“微妙”，仅仅理解为一种语言层面的修辞，那可能是对周其仁的一种误读。

一位要求隐去姓名的自由派学者告诉记者，周的特点是不说“正确而无用的话”。“就是没有现实操作性的。大家都知道正确的方向该是什么，问题是怎么去做到？”

“譬如谈土地私有制问题。几十年过去了，公有制或者集体所有制已经这么久了，把已经公有化的土地再长期承包给个人或家庭。这中间的过程太复杂了，涉及到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关系。”

“很多学者，包括我，都没有这个耐心，什么增减挂钩等等，光这些名词已多得让人头晕，算了，我就登高一呼：就是要搞私有化或者私有制。反正，方向是对的。”这位学者说：“只有周其仁有这个耐心，具体地去看怎么解决问题，一步一步地去做。”

2010年，周其仁带领的国发院综合课题组总结成都城乡统筹改革经验，出版了《还权赋能》研究报告，随后引发了他和湖北“三农”问题学者贺雪峰关于土地私有的持续论争。争论中，贺批他以给农民“确权”（确定土地的承包经营权、房屋产权）的含蓄说法，实质是主张“土地私有化”，是“假不懂”的深谋远虑。

“我哪里会有话不全说出来？”周其仁辩解说，“我当然知道清晰到家庭的土地产权的含义，但我从来不认为可以经由‘私有化’来实现清晰的土地产权。”

19年前，周其仁就撰写了论文《农村改革：国家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化》，对自1950年以来中国的地权变化进行了研究。

1950年出台的《土地改革法》明确保护土地私有。1953年的“土改”，把土地分给农民家庭。时隔3年，集体化运动以及后来的《人民公社60条》，把已归农民私有的土地甚至连宅基地都一并收归集体所有。

为了搞清楚当年这“一放一收”是如何完成的，他曾查找到历史档案。当时，集体化工作队动员的时候说：这个地是毛主席领导我们分的，现在毛主席又要求集体化，你不拥护，就把你的土地收回。

“所以，他的观点是：产权制度，是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共同维护的一种权利。如果缺乏植根于人们心目中的自由，没有长期的演练成为普遍的行为习惯，仅仅通过一场政治运动来赋予的‘产权’，它注定是非常不稳固的。”薛兆丰分析说。

如今致力于农村扶贫公益事业是何道峰说，农村目前的贫困化和现有的土地制度有很大关系，尤其是近十年。“我同意周其仁主张的土地确权和私有制。但再往下走，建立一个怎么样的制度，我们俩的意见也不尽相同。”他认为，只有通过立法才能根本解决土地问题，当然，这会涉及一整套有关城市规划、行政、税收的法律制度。

相比较，周其仁的观点似乎要更保守一些。“不要那么急急忙忙发一个文件或者做一套新的产权制度。因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今天来一个开明婆婆，往这个方向改；明天再来一个保守婆婆，往那个方向改。”这样变来变去，人们的预期更不稳定，行为也将更变异。

“让一套产权制度在社会当中慢慢地磨，通过多方面力量的博弈，慢慢地成型，成为习俗，变成所有人的习惯，然后用好的法律把已成事实加固下来，而不是重新去打造一个新世界。”

什么是他主张的“渐进”路线呢？

三十多年前的“包产到户”，是把耕作权给农民；接着，是把经营权、卖粮食的权利还给农民；然后再是土地承包的转让权。最后，一套日渐完整的土地权利就还权赋能了。“眼下这一环节是解决集体建设用地的权利问题。慢慢来，不要着急。”

采访中，汪丁丁说自己更愿意用“判断力”来定义这种“分寸感”，“就是康德反复强调的判断力。”

“其仁对中国政治有极好的判断力。在康德-阿伦特的政治哲学传统里，可称为实践智慧。既不是单纯的实践能力，也不是单纯的思辨能力，而是两者的适度结合。其仁在人民大学读书期间已表现出这方面的特质。”

在汪丁丁眼中，周其仁是他认为具有出色“实践智慧”的两位友人之一——另一位则是新闻界的胡舒立女士。

猎人的枪声

不温不火的周其仁也有擦枪走火的时候——那是10年前引发巨大舆论风暴的“顾郎之争”。当时，媒体以“国内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失语”之说法极力渲染、推动这场风波。

在《经济观察报》上，一向以“不爱赶热闹”婉拒媒体的周其仁以《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为题，用自己从1996年起对三十多家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调查为经验依据，对郎质疑几家上市公司国有资产流失的研究方法、数据、逻辑等等漏洞进行了全面的批驳。言辞之尖锐犀利，令许多熟悉他的风格的人大感意外。

“太精彩！其仁那篇是那场论战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韦森说：“大概是他这辈子火气最大的一篇。”

一位接近主流经济学圈的人士告诉记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者们噤若寒蝉，因为“谁敢批郎咸平一句，不管你说什么，都会被网上的愤青们骂臭、骂死。张维迎素来是这样的脾气，周其仁火气这么大，倒有点意料之中的意外。”

周其仁后来几次反省，说自己那回写得太冲了，“没控制好”，“情商有问题。”

一位熟悉他的北大学生说，看似温和的周老师“骨子里是一个很孤高的人”，对自己认定的理念相当坚持，其实从来不怕得罪人。

据一位亲历者回忆：90年代一次级别颇高的场合，周其仁提出的观点惹得当时一位领导

不悦，传出来的讥讽说：你们无非就是杜润生的徒子徒孙罢了。周其仁知道了当即回应——“怎么着？我不相信这辈子还有比‘杜润生的徒子徒孙’更让自己感觉高傲的称号。”

此事在农研室的老同事圈中迅速传开，令一干亲历过政治动荡和世态炎凉的当事人颇引以为傲。一位农研室的旧人告诉记者，“虽然现在不常和其仁见面，但知道彼此是可以信任、价值观是相同的。”

2005年，一位晚年居住在富强胡同6号的前国家领导人去世。周其仁闻讯后当即赶往杜润生家，正好老人家要赶去吊唁，临行叮嘱他得写点东西纪念首长。在前领导人去世一周年，周其仁以当年直接的接触为据，撰写了一篇真挚感人的回忆文章。此文后在网上广为转载，令许多人为之动容。

“公道自在人心。我当时就是一个平头百姓，刚离开大学校门不久，连党员都不是，是改革的浪潮让我有这个机缘。所以，我应该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把当时的东西写下来。没有什么好怕的，大不了回去打猎。”

光阴荏苒。90年代后，当年的小伙伴们或步入政界或下海经商，其中有不少如今活跃在舞台的中央。仅周其仁所在的研究小组，就走出了多位如今在政坛上炙手可热的高官，其中有发改委副主任杜鹰、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陈锡文，以及中纪委书记王岐山。

“我从来没发现其仁有任何拉帮结伙的迹象，他也从不加盟他们中的任何派系。”汪丁丁说，“朋友们议论过其仁不像上海人。这是褒意的评价。据我观察，其仁在待人接物上始终是清清爽爽（沪语，意为干干净净）的。”

在两种力量之间

2008年7月，98岁高龄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在芝加哥大学发起并主持了“中国改革30年讨论会”。会前，他让助手写信邀请周其仁写一篇关于邓小平的论文，缘由是——“你可能是提供这样一篇论文最合适的人选”。

在这篇后来影响广泛的《邓小平做对了什么？》中，周其仁提到产权理论在中国情景中的应用——“广义的交易费用决定着制度的存在及其变迁。”

尽管科斯的理论在1959年说，清楚界定的权利才是市场交易的关键前提。周其仁说：“中国的经验表明，农民和基层自发的产权界定，加上地方和中央给予的合法化承认，共同成就了产权的重新界定。”

“这个经验非常有意义，我甚至认为对整个人类都有意义，因为将来再走错也不怕，中国的改革已经预备下一贴可用的解药。”

历史的机遇，让周其仁这样一度在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们有幸参与了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决策。那么，如何看待80年代那场改革的缘起和发展呢？

周其仁说，回头再看那被评价为历史地位很高的5个“一号文件”，实际上是用来教育干

部的。“你说包产到户是农研室发明的？是杜润生发明的？是人民被逼得饿得不行了，活人不能活活就这么饿死，总得找个办法吧。”

“凡遇到困难、有需要解决的大问题，总有人想办法突破。讲到底，每个普通人、普通家庭、企业、基层和地方，总有改善生活、发展经济的愿望，因此总有人出头来面对困难、抓新的机会。这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

这是周其仁所理解的“顶层设计”——国家机器对底层的、地方的自发改进、改革的做法给予合法承认、保护、完善、提升，使之成为政策、成为国家制度。仅此而已。

这也是他最为推崇的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对“中国经验”的理解。科斯和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中，提到所谓的“双轨结构”和“边缘革命”。

所谓“双轨结构”，是说中国经济的成功离不开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个体户、乡镇企业和经济特区这些确定“产权”的活动，其实苗头都出现在 1978 年之前，而且各地都已经偷偷摸着石头过河了。但是，如果忽视了自上而下的政府作用，也是无法切实理解中国改革的真实过程。

在为“中国往何处去”忧思一片的中国思想界里，这也多少解释了周其仁对未来的乐观——一旦现有的游戏规则“摆不平”，底下自然会冒出来各种求生、求变、求发展的办法和创新。

“我们能做什么事？生活天天在冒东西，无非做点甄别——哪些冒出来的东西有可能性，再给它加点减点什么，它可能就起来了。在调查研究当中，做选择、梳理，使得杂乱无章的现象变得比较有条理，让信息传输的成本降低。”

对知识分子们设计改革蓝图的热情，他至始至终抱有怀疑。“我们写文章、做调查、做呼吁、进行学术辩论有用。但是，你要搞清楚一点：我们只是起辅助的功能，敲敲边鼓的。”

在芝加哥开完“中国改革 30 年讨论会”的第二天，周其仁坐着国际航班赶回了国内。在成都，一场以“确权”为基础的城乡统筹土地改革试验正在进行中。

2007 年，重庆、成都两市宣布成为国家城乡综合改革试验区。一次在成都开会的机会，使得周其仁对那底下发生的事产生兴趣。他写了一封建议信，提出试办土地交易所的构想，得到了时任重庆市委书记汪洋的重视。

2008 年 10 月，全国第一家农村产权土地交易所在成都挂牌。

在过去 5 年中，他带领国发院的课题研究组，对成都进行的统筹城乡改革进行蹲点调查，跑遍辖下各区市县，与官员、农村基层干部、农民、商人等进行了几百次的座谈，同时参照了重庆、长沙、嘉兴、深圳、北京京郊等 8 个点的调查研究。

成都郫县的“占补平衡”做法，柳街设立解决土地确权纠纷的“长老会”，民间商人自办蛟龙工业港的创新和经营，三道堰的小城镇建设以及灾后重建的制度创新，锦江实施的集体土地的招、拍、挂……各路人物在底下进行的土地流转的“大开练”，让周其仁兴奋不已。他从中看到了一条可能的土地制度改革突破路径。

亲身见证过 80 年代初“包产到户”的星火燎原之势，让他坚信一条规律：“中国的事情很

厉害，如果这个事是符合方向的、是底下有根基的，你上层只要开个口子，从NO说成一个有条件的YES，底下就不断地拱出来，欲罢不能。这个力量远远超出学者的力量。”

“就像两种化学元素相遇，我们的力量加上这个力量，会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

作者：徐琳玲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参考文献：马国川，《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什么？》《改革的逻辑》《城乡中国》《中国做对了什么》；柳红，《80年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光荣和梦想》。）

我们一起成长，在朗润园

[我与朗润]之汪丁丁老师

文章简介：本文中汪丁丁教授旁征博引，借以阐述了他的自由观：“自由是整体的性质，而不是个体的性质。换句话说，只有当一群人共同成长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才成长为自由的。”幸运地是，朗润园（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BiMBA之所在）并没有像其它校园一样绝望地纠缠于权力关系或货币关系，而是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精神共同体”。在汪丁丁心中，“人品与学品兼顾、传统与创新兼顾、以公共政策基础为主要研究领域”正是朗润园深厚的文化基因。展望未来，朗润园的核心议题，亦即管理学的核心议题再次被抛出：如何在创新性与连续性之间保持最佳平衡？

朗润园二十周年纪念文章，采用这样的标题，可能有些幼稚。所以，我从“成长”这一语词开始我的叙述。我这一代人，在六十岁的时候，人生的体验足够丰富，以致我比我年轻时有了更深切的感受，于是我在2013年9月出版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序言的结尾写了这样一段文字：“自由，是整体之事，我们一起成长。我们的‘成长’，定义是：有能力欣赏更自由的人生。”

请注意，自由是整体的一种性质。没有人能孤立地获得自由，因为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社会之内，George Herbert Mead称为“社会自我”（social self）。William James深入观察人们的自我意识，然后询问：我似乎总是通过一系列“我的”来定义“我”。如果我完全脱离我周围关系最密切的那些物和人，当真就很难说清楚“我”是谁。

人生永远同时处于“物质-社会-精神”三维之内，于是人的生活问题无非是来自物质生活的、社会生活的和精神生活的问题。物质极端匮乏的时代，我们感慨生活不自由，因为有柴米油盐温饱问题的紧迫感。市场化改革三十多年，我们已不再有柴米油盐的紧迫感，不过仍在感慨生活之不自由，伴随着中国社会迅速转型并因此而远比西方更激化的学业职称婚姻子女养老诸问题的焦虑感，又由弥散于我们生活中的普遍焦虑而引发的，是我们日常生活的情感枯竭——人与人之间深层情感交流的日渐枯竭。于是有各种修身养性的工作室和讲习班流行，让我们在无休止的忙碌中有一刻停顿，谓之“灵修”，其实是短暂的精神生活。根据老黑格尔的阐述，精神自由，这是人的本质，也可以用梁漱溟“人禽之辨”的语言来表达：心为形役，是谓“禽”。形为心役，是谓“人”。我推测黑格尔不懂古儒家的修身之道，不能如梁先生那样有一番更精微的阐发：身形越忙碌于对外部世界的征服，它对心灵束缚就越紧迫，从而心灵就越不自由。所以，修身之首要原理便是转入“静”的境界。静以通天下所感，颜回谓之“同于大通”。Hannah Arendt也有深切感受，她用难以翻译为英文的拉丁文来表述这一心灵转向：我们从忙碌的世界抽身而出，从“生命行动”（Vita Activa）转入“生命沉思”（Vita Contemplativa）。

黑格尔的意思是，只有通过精神生活，人获得最终的自由。克里希那穆提的演讲文集，其中一个中译本于是有了“最初的和最终的自由”这样一个令人动心的标题。同于大通的境界，《庄子》（大宗师）里有一段描写，孔子询问颜回怎样才可达到，颜回答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为“坐忘”。迟至宋代，朱熹仍懂得“半日静坐半日读书”的道理（不无争议）。东方养生，千万法门，皆以“静”为入门之要旨。秦焚书，仅留农、树、医、卜之书，故中医保存着修身养性的传统。民初西学兴，主心性的中医传统被主身形的西医传统取代，破败凋零，命悬一线，仍在等待中国人寻求心灵自由的时代之降临。

心性求自由而身形沉沦于现世，这是古往今来精神探索者必须求解的一道难题。例如，梁漱溟自述毕生努力求解的，只是人生（心性）问题和中国（现世）问题。他为中国问题奔走几十年，直到晚年才返回来求解人生问题（《人心与人生》）。

确实，就心性而言，最终的自由，不需要向外诉求什么。所以，我常说，精神生活的特征是“自足”。既然如此，为何自由是整体的性质呢？根本原因在于人类兼有心性与身形——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言的“介于神与兽之间的存在”。所以，要让心性追寻自由，必须让身形对心性的束缚有所松动（参阅梁漱溟“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合印序”）。

我仍从梁漱溟先生的千年预言开始铺叙。他在上世纪上半叶预言，下一个时代人类将进入伦理时代，那时拯救人类的，是儒家学说，再下一个时代，人类将进入宗教时代，那时拯救人类的，是印度佛学。梁先生的作品，常引发诸如胡适先生和张东荪先生这样的学院派学者的批评。不过，梁先生自承是行动家而非理论家。故而，我们不应让理论家的批评遮蔽了梁先生表述的实践感受。在我的感受中，梁漱溟的实践感受，针对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梁先生性情如此，他总是以生命的全部力量投入于人生问题（早期为修行而拒绝结婚）和社会问题（“以出家的精神办乡村教育”）的求解。在这样的碰撞中迸发出来的任何观念，注定了是重要的。

在我的理解中，梁先生所言的宗教时代其实是精神生活主导的时代，而梁先生所言的伦理时代其实是社会生活主导的时代。我理解的社会生活，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的深层情感纽带。如前述，在物质生活超越了温饱阶段之后，我们最感痛苦的是深层情感枯竭。在何种程度上，这一状况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关系或与竞争相适应的私有产权制度，我不能跟随我喜爱的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而轻易有所论断。虽然，古人有“义利之辨”，其中一派人士论证，追逐名利越久，心性迷失就越深，他们依据的是“性相近而习相远”这一经验法则。又虽然，演化经济学家 Samuel Bowles 在《经济文献杂志》（JEL）发表过一篇著名文章，“内生偏好”，他相信市场经济足以熏陶和塑造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偏好。我推测，有更深层的原因让我们的深层情感随着物质生活的发达而枯竭。

不论如何，我相信，温饱阶段之后社会生活的主题是深层情感交流。这一主题，纽约新社会研究学院的阿伦特讲座教授 Agnes Heller 表述为“emotional involvement”，与“development”和“justice”共同构成“美好生活”（good life）的三个维度。亲身经历过奥斯维辛和古拉格，右的

和左的极权统治，她自称是“反思型的后现代主义者”。

凯恩斯的“剑桥小圈子”不仅有著名的罗素和维特根斯坦，还有著名的伦理学家莫尔（G.E. Moore），他的名著是《伦理学原理》。这部作品说服力太强，以致多数读者从来不读第一章以后的内容。莫尔在结尾的时候对人类未来的伦理生活有所憧憬，他认为友情将成为美好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因素。这也是柏拉图的见解，诸种情感当中，灵魂相伴的人们最感慰藉的，莫过于友谊。

与利益无涉的纯粹友谊，由这样的深层情感纽带结成的社会网络，今天被称为“精神共同体”——各种共同体（communities）的蓝图，或者，“乌托邦”。例如，这是我的感受，多年来我们在朗润园里结成的社会网络，不论它有怎样的名称——学术共同体、教育共同体、教育科研共同体……，它的基本性质是情感的。任何社会关系的基本性质，按照结成社会网络的纽带的性质可以分为三类：货币的、权力的、情感的。

或许因此，学生们喜欢朗润园。我感激那些最初营造了朗润园文化的朋友们，因为，朗润园完全可能如其它校园一样绝望地纠缠于权力关系或货币关系从而让我们的身形疲于奔命。此处，“文化”应定义为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预期。朗润园里人们相互之间的行为预期，很少是争权夺利的。于是，朗润园成为青年们心目中的一方净土。这样的文化氛围，使自由成为一种现实可能性而不再仅仅是一种逻辑可能性。显然，在货币、权力、情感这三类社会纽带的性质里，只有情感是可能让身形对心性的束缚有所放松的，从而心性可能获得最终的自由。让我再次阐述我的自由观：自由是整体的性质，不是个体的性质。换句话说，只有当一群人共同成长的时候，他们每一个人才成长为自由的。

人际交往的质量，周国平这样刻画：“使一种交往具有价值的不是交往本身，而是交往者各自的价值。高质量的友谊总是发生在两个优秀的独立人格之间，它的实质是双方互相由衷的欣赏和尊敬。因此，重要的是使自己真正有价值，配得上做一个高质量的朋友，这是一个人能够为友谊所做的首要贡献。”他的另一段文字也深得我的欣赏：“社会是一个使人性复杂化的领域。当然，没有人能够完全脱离社会而生活。但是，也没有人必须为了社会放弃自己的心灵生活。对于那些精神本能强烈的人来说，节制社会交往和简化社会生活乃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够越过社会的壁障而走向伟大的精神目标。”

那么，二十年来，这是一群有着怎样品格的人？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朗润园里营造着以精神共同体为理想形态的社会网络。我更喜欢将这类问题留给读者，由他们的观察，得到他们自己的解答。

我愿意在这里解释的，是我理解的朗润园文化基因——即有能力持续复制朗润园内的人与人之间行为预期的一组要素：（1）人品与学品兼顾。如若不坚持这一原则，以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和中国目前的学术生态，不过十年，朗润园最初的那些文化品格必定消失。当然，我们不能确保每一位加盟朗润园的员工都兼有令人满意的人品和学品。Martin Nowak 2006年在《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报告，标题是“三分之一定律”。他是哈佛大学的“明星教授”，这篇报告大

意思是说,如果生存策略 A 在任一种群当中稳定地成为唯一策略,如果生存策略 B 比 A 更自私,那么,当这一种群的个体采取策略 B 的时候,会感受到来自种群的歧视压力,从而不得不转而采取策略 A,但是如果三分之一以上的个体采取策略 B 时, B 将迅速取代 A 成为稳定的唯一策略。三分之一定律意味着,如果朗润园全体成员的三分之一以上采取了更自私的行为模式,朗润园将迅速变得与其它校园无差异;(2) 传统与创新兼顾,后来我从德鲁克自述中找到了类似的原则。德鲁克毕生思考的管理原则——一个人的、组织的、社会的,在他早年研读柏克著作时已有萌芽,那就是在变革与连续之间保持平衡,称为管理的艺术。朗润园既有的学术传统是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如若我们迅速且剧烈地转向其它诸如社会学、政治学、或文学、史学和哲学这样的学术传统,那么,不过十年,朗润园的基本学术优势就将消失。另一方面,朗润园的学术传统必须保持足够的开放性。UCLA 的人类学家 Robert Boyd 和 UC Davis 的种群生物学家 Peter Richerson 1995 年在《Ethnology and Sociobiology》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why does culture increase human adaptability?”根据这篇报告,在任一种群里,如果个体只有两种可选策略——单纯模仿(例如沿袭传统)和独立探索(例如开辟新的研究领域),那么,探索者和模仿者各自的适存度随模仿者数量的增加同时上升到某一阈值之后,模仿者的数量就会迅速下降而探索者的数量稳定地上升。大致而言,独立探索策略在种群中的占比应在三分之一的水平上;

(3) 以公共政策基础(policy foundations)为主要研究领域。由于最初来到朗润园的那些学者的人生体验与知识结构,我相信,未来十年或在更长远的视野中,朗润园的学术优势仍是公共政策基础研究。但是,朗润园学术传统的演变,保持既有格局之外,还要或多或少预测二十年之后社会科学的基本格局。受限于篇幅,只能概而言之。首先,人类社会重大危机与公共政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而不是越来越疏远;其次,未来二十年,技术与政治,一如既往,是塑造公共领域及公共政策基础研究领域的两大因素;第三,融合着微观行为视角与宏观秩序视角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随着计算技术和成像技术的迅速发展(能力)和普及(成本),在经济学和政治学(与公共政策基础研究关系最密切的)这两大领域里,先后凸显为主流,并且正迅速向人文(目前主要是历史和语言)与社会科学的其它领域扩展;第四,后现代社会科学研究具有强烈的跨文化冲动,因为西方学术界不再满足于或不再可能满足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野。在人类文明演化的最长远视角下,中国似乎是两河流域文明之外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因此,中国与西方相互构成真正的“他者”,在思想史上多次成为相互对照的镜子。

朗润园二十年,我和这里的朋友们一起成长。可是,中国是大国。对大国而言,社会转型期十分漫长,以致超过了任何具有奇里斯玛魅力的领袖人物之自然寿命。所以,韦伯政治社会学关于奇里斯玛人物与官僚化趋势的论述,与中国社会转型格外地相关。奇里斯玛(charismatic)魅力人物,依照中国历史能够提供的案例,大约每五百年之内只出现一次。可是目前这一次文化转型期,至少需要两百年才可能完成。奇里斯玛人物开创的伟大事业,于是只能由平庸人物来继承,关键是,对平庸的社会治理者而言,最符合理性的治理模式就是将奇里斯玛时代的一切生活细节加以制度化,当然,这也就是韦伯所言的官僚化趋势。大势所趋,韦伯对资本主义

的前景十分悲观，称之为“理性铁笼”。德鲁克深受柏克著作的影响，毕生思考这样一个社会治理基本问题：怎样在创新性与连续性之间保持最佳平衡？对德鲁克而言，这是管理学的核心议题。围绕这一核心议题，他展开了现代管理学的全部内容。注意，是管理学家或社会治理者必须面对的核心议题，而不是奇里斯玛人物必须面对的核心议题。

我们在一个转型期漫长的社会里生活，我们必须面对上述的管理学基本议题。换句话说，过于强调制度化，将迅速扼杀朗润园的生命力。另一方面，完全没有制度，朗润园将陷入混乱。在变革与连续之间持续平衡的艺术，是朗润园朋友们无法回避的核心议题。

长期而言，朗润园立足之基础还必须包括独具特色的教育——教学相长，不仅有研究生教育而且还应有本科生教育。朗润园的教育主旨，应以学术判断力的培养为核心。其实我可以写得更长一些，如果我的文字不如此枯燥的话。无奈，止笔于此。

撰稿人：汪丁丁老师

那些年，我们一起上过的班

[我与朗润]之沈艳老师

2003年8月，非典刚过，我回到燕园正式上班。那时朗润园中心后面的二楼还比较空旷，我可以随意挑办公室。在二楼办公的有沈明高、汪浩与柏兰芝。明高豪爽，2月份到CCER与他第一次见面时，他就爽快邀约，过来吧，这儿挺好！初见汪浩时，他比较沉默害羞，后来的单位午餐，才见识了他无数次不动声色的冷幽默。对兰芝的印象就是气息如兰。她的办公室里有一台加湿器，屋内不仅湿润，还透着特别的清香。兰芝的办公室，可以透过窗棂，坐看荷塘与荷花。想想，一边读论文一边赏荷……炎热的日子里，朗润园却静谧清凉，在这里教书做学问，想来是能沉下心的。那个时候林老师常说CCER premium，就是指在CCER工作，即便工资低，却享受着特别的风景。

当天第一次与邢惠清老师聊天，我正襟危坐很礼貌。想着回国了，对人待事都要特别认真。但是很快就发现，CCER的氛围却不是这样。我遇到的同事，做事都极认真，但又都是很可爱的人。那时林老师海老师办公室中间是陈曦、晓萍、汤宁办公的地方。开始是有事情去找她们，后来没有事情也要创造事情去问问她们，因为那个办公室有特别愉快的气氛吸引人。门房的小唐师傅、小武师傅，还有值夜班的王师傅，每个人做事都极认真。现在深圳的李志义，当时一个人却为整个院子提供能想象到的最快捷的IT服务。这风格如今被沈成玲童鞋传承。当朋友抱怨自己遇到IT问题没法解决时，我常常骄傲地说，要是我遇到同样的问题，小沈肯定会为我搞定的。

到中心的第一年，我为本科生开中级计量。那时协调安排双学位课程的是施建淮老师。施老师特别踏实诚恳，他那时在中心工作近四年，因为双学位课程老师不够，他总顶缺教没人教的课，连续几年教不一样的课程。他帮我安排好课程，还细心叮嘱了好些注意事项。那年我还为研究生开高宏与高级计量。我对那届同学印象最深，后来还常常一起玩。孙昂与韦志超很快就成了班上的班对。海燕、玲文、向婷、传伟……个个都清晰如见。去年秋天，在Duke大学教书的李嘉回来，与我聊天时还带着一脸得意的坏笑嘲笑我说：我们毕业的时候，你还和女生们抱着哭成一团，我就在一边看着。

05年霍德明老师来中心访问，聊起朱家祥老师。朱老师是我在南加大读书时计量经济学的启蒙老师。教了我们基础的统计课后，他继续教计量的第一门课ECON511。511的第一节课，他急匆匆赶来，说将车钥匙锁在车里，只好由太太火速将他送来，讲义却锁在车里了。没有讲义，他就一支粉笔，在黑板上写下大片公式，不停顿地讲了三个小时。他的课，出神入化，计量在他嘴里，就是十分有趣的一门学问。当大家困倦疲累的时候，他都会适时插入一些故事。有一次，所有人都为黑板上的公式苦苦挣扎的时候，他忽然停下来，掉过头对我们说，you know what? Life is never fair, 然后开始讲故事。我们一听，都精神一振，觉得与老师心有戚戚焉。还

有一次，他说他儿子问他，what is the meaning of life? 他也不知道答案，但是他很镇定地对他儿子说，the meaning of life is for you to find out. 居然就蒙混过关，让儿子接受了。因为上了朱老师的课，我觉得计量老师是所有老师中最真诚的，那学问也就因为真诚而酷起来。我带着“文科生又怎样”的无知无畏的豪气，选了计量作为自己的专业。可是教完我这届，老朱却要离开美国回台湾了。后来我才辗转知道，当年南加大曾有一个很大的捐赠人的儿子，上老朱的课挂了。于是有人找老朱说，他是谁谁的儿子。后来老朱告诉我说，那时他想，他是谁的儿子关我什么事，他就没有修改成绩。等到他评终身教职的时候，系里全票通过，却很罕见地被院里否了。他就这样回了台大的。

我于是就与霍老师建议，邀请朱老师来中心教课，立刻就打了电话。结果，05年的秋天，朱老师就教了05级CCER学生了。老朱很快就被学生吸引，他说学生真好，对知识的渴望就像海绵吸水那样。为“报答”学生的热情，老朱请学生吃过无数的晚饭，后来在05级毕业那年的元旦晚会上，老朱与光哥、晓乐在元旦晚会上的摇滚乐队造型出来时，是全场最high的时刻。老朱一头银发，光哥一头爆炸的发型带着夸张的黑边大眼镜，晓乐司鼓。黑了灯，大家举着荧光棒听他们唱beyond，然后就一起唱，我兴奋得嗓子都哑了。最后老朱说，05级，我为你们牺牲自己了！他摘下银色假发，光头上竟纹了CCER05几个字，那时全场轰动。不少女同学都与老朱的光头合影。晚会后老朱得意地告诉我，那当然不是纹上去的啦，是借谁谁的眉笔画的。后来老朱说要成立一个摇滚乐队，取名Metrica。那时缺架子鼓手，我就自告奋勇，好歹我也是做计量的.....虽然我还会架子鼓，但是我真的可以学啊。老朱却不置可否，终成憾事。

中心每年都有些big event。比如元旦晚会，刚回来那几年老师们都要表演节目的，就想着怎么滑稽搞笑，娱乐学生。我们有一次演唱“路边的野花不要采”，还想拉林老师一起表演却没有成功。那时的教授会都是每年去不同的地方，每年都有合影。记得某年合影时陈平老师还在林老师头上做了个兔子耳朵。一次去了牡丹江，朱老师去晚了，还是被当地警车送去的。我们笑他光头坐警车有罪犯嫌疑，他却特别得意，说坐警车很拉风，很希望将那警铃拉响，只是终究没有。说起赤水，最容易想起的是某晚教授们的畅饮。那晚开会的时候，宋老师笑咪咪地说自己没醉，喝了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七个九的量。那时都是白天参观，晚上开会的节奏，而晚上常常要讨论到超过十二点。记得去赤水那次，山路上不断看见掉下来的石头。终于有一块大石拦住了我们的道路。大石两边的教授们却怎样也不能挪动那块石头。这时来了一个瘦小的老头，用一个细细的铁钎，一下子就将石头挪开了。大家只好感叹术业真真真有专攻。不过那次之后，中心的教授会就开始注重安全而没有再去很远的地方开了。

不知不觉，那么些年就过去了。这园子里多少好同事来来往往，那些让人怀念的真实个性和独特魅力，为这个园子的底蕴留下不可磨灭的风采。那些年的欢笑、学术争论时的面红耳赤与拍桌子、讨论问题时的认真与互相尊重，对学生对工作的赤诚，都成了这院子独特的风景，留在心里，留在回忆中，留在曾经的歌声里。

撰稿人：沈艳老师

“沾光”容易，添彩不易，且行且努力

[我与朗润]之黄卓老师

文章简介:除了学贯中西的大师名家，青年学者是朗润园里另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在【我与朗润】系列“大餐”之后，黄卓老师这篇小文用他特有的“黄氏幽默”为大家奉上一道“甜点”，风味自然不同。

说起我和朗润园的渊源，可以追溯到 2000 年的上半年，当时我正读大三。某天，在阅览室的一本《经济研究》杂志上偶然看到 CCER 举办第一届经济学夏令营的广告。我赶紧回去整理材料准备报名。不过，当时报名夏令营还需要本人所在院系盖章推荐。我拿着材料跑到学院办公室，结果被告知你们班已经有两位同学报名并拿到推荐，没有多余的名额了。当时年幼无知，还不敢自荐申请，因此就这样与 CCER 擦肩而过。而我的两位同学都被夏令营录取，而且因为表现优秀被保送为 CCER 的研究生。

博士毕业前我给 CCER 投了简历，在经济学年会参加面试。当时面试我的是姚老师和巫老师。那天我提前 15 分钟来到面试办公室门口，碰到一个女孩。一问，也是来面试的，面试时间居然和我一样，而且也是做计量方向的。我心里纳闷，该不是 group interview 吧？这个可没心理准备呀。时间一到，巫老师打开门，一看到我就问：“你就是黄卓吗？”我一听，气氛不对呀，赶紧说是我。他说，“你怎么迟到了这么久？我们等你半小时啦！”我顿时吓了一跳。幸好我手头带着了秘书发给我的面试通知打印版，赶紧拿出来，原来是秘书把我的时间通知错了。由于当天安排已满，于是把我的面试推迟到第二天。也许要感谢这个插曲，第二天的面试进行的非常顺利，也让我对国发院有了更多的了解。很快，我就收到工作邀请并高兴的接受了。如今，我常用自己的例子鼓励那些参加 CCER 夏令营面试或研究生复试的同学，“你们当中可能一大半都没有机会进来，但是不要气馁。当不了北大的学生，你们还有机会当北大的老师嘛。”

第一学期我的教学任务是给经双同学上“计量经济学”。国发院开设的经双项目每年招收 900 名学生。赵普生老师带着两位年轻同事有条不紊地管理着这个北大最庞大的本科教学项目，效率之高，令人佩服。一直给同学们上计量课的是朱老师和沈老师。朱老师是理论计量大家，功力深厚，据说讲课从不用带 PPT 和讲义，一支粉笔在黑板上信手拈来，行云流水又条理分明，带领同学们畅游计量的理论和直觉。沈老师极具亲和力，授课同时乐于分享人生哲理，就像学生的知心大姐。不过对于大多经双同学，计量是最难的一门必修课，通常会拖到最后一年。因此有同学写下这样的词句：“……四年生死两茫茫，修经双，挂计量。千里孤坟，未名湖池塘……夜来幽梦忽还乡，沈小艳，朱家祥。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一来就上这样一门课，我感到压力山大。面对 300 多人的大课堂，免不了紧张。第一次上课，准备了两节课的 PPT，很快就讲完了，可是离下课还剩大半个小时。我只好说，“同学们，让我们把今天讲的复习一下

吧。”然后重新讲一遍。以后每次上课，我都至少准备好两倍的内容以备不时之需。不过正所谓教学相长，从计量到金融，三年下来我已经讲过五门不同的课程，经验日渐丰富，自信心也增强了。今天的我基本可以自如的控制语速和节奏，也能体会踩着铃声说下课的感觉了。

我在朗润园的生活，日程紧张而心情放松。每周上两到三次课，一次组会或者讨论班，两到三次学术报告会，剩下基本是与学生讨论和做科研，时间总感觉不够用。每周一，院里有教师午餐例会，老师们互相交流近况，也聊一下新闻热点和八卦。中午有空，年轻老师会约着一起去午餐，从朗润园走到食堂，也算锻炼身体了。第一年里，作为新人，我最开心的事就是听老师和同学们讲院子里那些大师们的轶事，令人神往。特别是宋老师对院里年轻老师讲的“买不起一套，就买两套”的神预测，总让我感叹之余，更叹息自己为什么不争点气早两年博士毕业回来。那样就有机会听从宋老师的建议，不至于被北京的高房价所虐。从第二年起，我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把这些故事讲给新来的老师和同学们听，仿佛自己亲眼所见，感觉已是朗润园的老人一般。经济学家最近研究表明，空气污染导致在北方生活的人比在南方平均寿命减少五年。不过每天呆在美丽的朗润园里办公，闲时看花开花落，漫步于未名湖畔，我想至少可以把自己这五年损失找回来吧。

最具有 CCER 传统的，是每年两次的教授会，全体教师齐聚一堂，总结学院的教学科研人事等各项工作，重大事项讨论投票。同时展望学院下一年的发展大计，年轻老师们也会畅所欲言，出谋划策。去年的教授会，几个年轻老师们都上了网球乒乓球羽毛球拍，因为按照惯例，开完一天的会大家总去打打球或者唱卡拉 OK 放松一下。结果吃晚饭的时候，林老师提出找几个年轻老师聊一下他对新结构经济学中心的想法，于是吃完晚饭大家都去捧场，我心里想现在 6 点半，聊到 8 点钟去打球还不晚。可是没想到林老师一讲起来就停不下来，而且越讲越有精神，一直讲到凌晨 12 点多。以我的身体素质，坚持到 11 点就开始迷糊了，到 12 点以后就完全不记得林老师在说什么了，只记得坐在我对面的几位老师开始双眼迷离。以前也听说林老师开组会，时间超级长，以至于学生们要偷偷把墙上的挂钟往前拨快两个小时，这是我第一次亲身见识到林老师对学术的激情和超强的体力。

朗润园是深入学习中国经济和关于中国的经济学最好的地方。且不说原来 CCER 的那些元老级的大师们，自从升级为国家发展研究院以后，这两年新加入的黄益平、张晓波、徐晋涛、刘国恩、林双林、闵维方等几位教授都是各个领域的最知名的学者，既能够“顶天”——在国际一流期刊发表论文，又能够“立地”——深入了解中国的现实经济，为国家经济发展建言献策。比我早来的几位青年教师，在各自研究领域都崭露头角。淼杰已成为国际贸易领域的国内领军人物；力行专攻土地和城市化，参与了多个土地改革报告的写作；建国在宏观发展和金融改革问题的观点经常被财经媒体报道；晓燕已经是中国健康与养老调查（CHALES）的中坚力量。和他们比起来，我的研究领域涉及金融计量、实证金融、衍生品定价、能源和大宗商品市场，但是都不够深入，对中国经济的了解也比较粗浅。对于自己的学术发展如何定位，我也比较困惑。直到有一天，我突然想到，我的目标可以是成为“研究金融计量的学者里面最懂中国经济

的”，或者是“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里面最懂金融计量的”。呆在朗润园里，每天和众多各领域的最好的中国经济专家讨论对话，同时被无数关于中国经济的论文、研讨会、讲座轰炸，使得我就像在电脑游戏里自动挂机练功一样，对于中国经济理解的经验值和等级不想提升都难。所以，这个目标，可以有。

从硅谷来到未名湖畔，其实并不像听起来那么有诗意。帝都的住房、交通、就医、子女教育、空气污染，座座都像大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让我这个从未在北京生活学习工作过的人深刻体会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感谢北大这个小社会，给我们这样的青年教师提供了一个缓冲保护，而朗润园更像一个世外桃源，让我静下心来教书育人做科研。院子里的行政老师们工作高效热心，特别是邢惠清和高娟两位老师，在我的安顿过程中提供了许许多多的帮助，也免去了很多杂事的纷扰。如今，邢老师已经从办公室主任变为院里的副书记，但是当我遇到困难事的时候，还是改不了拿起电话找邢老师的习惯。随着教师队伍和办学规模扩大，朗润园的办公面积显得尤为拥挤。为了保证每位教师都有独立的办公室，各个部门的行政老师们都是好多同事挤在一间办公室里。自去年开始，学院在其他院系租借办公室，许多行政同事们不得不远离朗润园办公。可以说，他们是在很不易的办公环境下，为教师和学生提供着高水平的行政服务，让我们能够专心科研与学习。真希望承泽园的新楼能够早日动工建成，让所有的同事们都能够拥有宽松和舒适的工作环境。因为，**they deserve it.**

学生，是朗润园不可或缺的风景。外面人说，这个园子的老师很牛；我们老师们常说，这里的学生更牛，因为他们代表了中国最有潜力的一批年轻人。在园子里经常出现的，有四种学生。一种是我们自己的硕士博士研究生，接受严格的课程和科研训练，是老师们得力的研究助手与合作者。另一种是 MBA 和 EMBA 学生，工作的同时继续学习。第三种是经济学双学位的本科生，他们背景更加多元化，思维活跃，常给老师提出简单却不易回答的问题。最后一种，是从去全国慕名而来，希望来请教、蹭课、拜师、考研的学生，其执着的精神让老师们难以拒绝。我担任了 2012 级研究生的班主任，和他们既是师生，更像朋友。最难忘的是，前年学院元旦晚会的时候，和班上几个男生一起表演“江南 style”，当然我的任务主要是客串中间一小段。为了加强效果，表演那天，我悄悄的跑去租了一整套鸟叔的专业行头，没有告诉任何人，去晚会现场也是把衣服裹在厚厚的羽绒服里。直到我上场前，才从后台脱掉羽绒服冲到台上，给了现场的学生和老师们一个 **big surprise.**

在我加入朗润园不久，林老师从世界银行回来，和老师们座谈。邢老师向林老师介绍我，说我在几个学校的工作机会中，选择了国发院。林老师用他标志性的普通话笑着对我说：“你知道吗？你做了一个灰常灰常正确的决定！”我当时心里想，希望二十年以后，我也有机会和林老师说，“国发院当年把我招进来，其实也是做了一个灰常灰常正确的决定。”无论是教师、职员还是学生，每个在朗润园里工作的人，都受其润泽，专业和心性不断成长。不过，沾朗润园的光容易，为朗润园添彩不易，为了实现这个场景，我且行且努力吧！

撰稿人：黄卓老师

我的朗润情节

[我与朗润]之宫玉振老师

文章简介：同事发来邮件，要我在院庆之际，围绕着“我与朗润”为主题写一写自己的感想。黄益平老师又两次当面叮嘱，要我从自己的视角写一些在朗润园十年的体会。我自知并无写大块文章的才华，近期又连日奔走在赤水河畔，便只好利用空白时间，拉杂写来，都是一些片断，略表自己对院庆的惓惓之忱而已。

1. 朗润园：和平时期的“用武之地”

2004年的3月，我脱下军装，走进了朗润园。在此之前，我在军事科学院战略研究部任副研究员，从事兵法、战略和军史的研究。促使我放弃在军中的发展，下决心转业的，是时任BiMBA院长的胡老师跟我说的一段话。当时胡老师正在着手开发山东的现地战略体验课程，需要一位学军事的人选，洪兵主任把我推荐给了他。胡老师跟我聊了几句后便说：“现在是和平时期，部队又不打仗，天天歌舞升平，你学的东西也没用。不如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这儿天天打。”我一听，觉得这事儿挺有意思，于是第二天就做出了加入BiMBA的决定。后来同事们经常跟我开玩笑，说我是被胡老师给忽悠进来的。

吸引我加入BiMBA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园子。我早年在北师大读研究生时方向是晚清史，期间发表的10多篇学术论文中，第一篇就是关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末官制改革的，所谓的丙午改制，这篇文章是我学术生涯的开始，而朗润园正是当年亲王大臣们议改官制的场所；朗润园的主人一度是咸丰皇帝的六弟恭亲王奕訢，致福轩的匾额即为咸丰皇帝的御笔，我在读书期间，曾利用故宫档案馆所藏的档案，专门写过一篇咸丰朝北京地区通货膨胀的文章；朗润园的最后一位主人载涛，是宣统的皇叔，做过禁卫军大臣、军咨大臣（即今天的总参谋长），是清末军事和政治史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而我硕士毕业论文的选题即是清末新军编练与中央集权。还有庆亲王奕劻、镇国公载泽，这些晚清政坛的重量级人物，想必当年是经常出入这个园子的。对于许多人来说，朗润园就是个古色古香的王府花园，但对于我来说，这里一砖一瓦，一楼一轩，背后都是生动的事件和鲜活的人物。这可能算是我跟朗润园的特殊缘分吧。

2. 一个难忘的小插曲

这年年底，中心在九华山庄组织了一次团拜，同事们可以带着家人参加。我是带着女儿去的。吃饭的时候，林老师挨桌给大家敬酒。到我那一桌的时候，正好站在我女儿的旁边。我女

儿那年只有4岁，还没有桌子高。当林老师碰了一圈，端到嘴边刚要喝，我女儿在一旁突然冒了一句：“怎么不给我敬酒啊？”林老师一看，哟，旁边还有一个小女孩，赶紧跟我女儿碰了一下杯，笑着说：“噢，还有你啊。”如果到此为止，这件事情可能我也就记不住了，但没有想到的是，这时林老师又添了一杯酒，然后蹲下身子来，跟我女儿讲：“来，咱俩儿再喝一个。”我当时站在旁边，林老师绝对没有注意，但这件事情，我至今难忘。

转变：从“我想讲什么”到“学员需要听什么”

加入 BiMBA 不到一个月，胡老师就交给我一项任务，要我五一期间配合当时的战略管理课程，在威海为 E02 学员做一次甲午海战的讲座。这是我第一次为 EMBA 上课，胡老师要我先给他试讲一遍。我很快就做好了 PPT，但是当我给胡老师讲完了以后，胡老师做出了这样的评价：“思路不清楚，要重新理一遍。”一开始我非常纳闷胡老师为什么会这样说，我对自己的专业知识和逻辑水平还是很自信的。但是当胡老师一点点帮我理思路，告诉我学员会对哪些部分感兴趣、对哪些部分不感兴趣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胡老师的意思。我是从军事和历史的角度备的课，专业上没有任何问题，但我这次的教学对象不是学军事的研究生，而是 EMBA 学员。对于 MBA 教学来说，讲课人必须有一个从“我想讲什么”到“学员需要听什么”的思路转换过程。我按照这个路子重新备好课，又给胡老师试讲了一遍，胡老师这次听完后，只说了一句话：“你肯定能讲好。”我是带着胡老师的这句鼓励去做讲座的。正如胡老师所说，讲座确实受到了学员的欢迎，直到多年之后，E02 的学员见到我，还会提起当年的那场讲座。现在想起来，虽然我读过 10 年的师范，但讲课的基本功，却是在胡老师的提携之下一步步培养起来的。

3. 情归朗润：胡老师“一语胜千言”

2006 年下半年，我带着女儿去了美国。当时我太太在纽约州景色佳的康奈尔大学，我去了以后很快也做了康大东亚研究中心的访问学者。太太和女儿非常喜欢美国的环境，尤其是我女儿，在那里上学上的也很开心，很想继续留下来，我个人则是有些犹豫，毕竟这是大事儿。2007 年上半年，胡老师突然从纽约给我打了个电话说：“我到纽约出差出来了。”我说：“那我去看您去。”他说：“不，我去看你。”我说：“您来了我这儿可没地儿住啊。”他说：“没关系，我去了住你客厅不就行了吗？”我一想，也好，康奈尔大学位于五大湖区的五指湖畔，在常青藤大学中校园和周边环境可能都是最漂亮的一所，胡老师来了，我可以陪他逛一逛，于是便说：“好，那您来吧。”胡老师因为离开美国的时间太长，美国驾照已经失效，就坐了 4 个小时的灰狗，也就是长途汽车，到了我家里，住在我的客厅。当天我们就陪着胡老师到校园和周边看了看。第二天是周日，太太开着车带着女儿参加教会组织的活动去了，好留下我跟胡老师继续聊天。我和胡老师海阔天空，都很开心。但是到了中午，我突然发现出了问题：家中没有饭吃。我家住的地方，离镇上吃饭的餐馆很远，车已经被太太开走了，而我又比较笨，不会做饭。这可怎么办？正在这时，胡老师说了句：“没关系，昨天晚上的菜剩了那么多，咱们用微波炉一

热，不就可以了吗？”我实在没有办法，只好挑出两个稍好一点的菜，用微波炉热了热，陪胡老师吃了，然后又把胡老师送上了灰狗。胡老师走了以后，我就知道我必须回国了：胡老师是国内著名商学院的院长，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坐了4个小时的灰狗到了我家，住的是我的客厅，然后吃了我两个剩菜走了。我再不回国，都没有办法做人了。跟胡老师闲聊时，他从来没有说过你回国吧，给你加薪晋职之类。他只说了一句话：“5月27号，你的课就开始了。”结果我是5月20号回的国，因为要提前回国倒一下时差。回国以后，太太和女儿在美国又待了半年，最后到国庆节时，也回到了国内。她们两位，是流着眼泪回来的。

4. 朗润之魂：坚守士人价值与尊严

弹指一挥间。从我第一次走进这个园子，至今已有10年了。我常常在想，究竟是什么东西，使这个园子与别的地方不一样，是什么东西吸引了那么多人来到这里，又使来到这个园子中的人不愿意离开，而离开这个园子的人对她依然有着深深地眷恋。的确，朗润园很美，它有着厚重的历史底蕴，但答案显然并不在园子本身，而是这个园子中的人，以及园子中不懈的追求。是什么让林老师从金门到了大陆，从北大到了世行，在名满天下之际，又从世行回到了朗润园，一心构建他的新结构经济学？是什么让周老师在命运注定他此生似乎就是完达山的一名猎手时，却依然在青灯之下啃着那些艰涩的理论著作，直到今天依然风尘仆仆，到最偏僻最落后的地方去调研？园子中的每位教授，都有自己鲜明的个性：宋国青老师的诙谐睿智，巫和懋老师的蔼然笃诚，卢锋老师的严谨谦和，黄益平老师的温润儒雅，以及姚洋老师的少帅风范，汪丁丁老师的自由追求，杨壮老师的人格魅力，还有马浩老师的豪放大气，张黎老师的宽厚包容……朗润园之所以能够将这些秉性各异的人汇聚在一起，靠的是一种不绝的天下情怀，一种深沉的家国意识，一种经世济民的使命与理想。宋儒张载曾经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人心浮躁的今天，朗润园却在执着坚守着千百年中国士人的那份价值与尊严。这个园子能够成为人们向往的圣地和净土，正是由于这种坚守。这，是朗润园的灵魂所在。

撰稿人：宫玉振老师

十七年 一瞬间

[我与朗润]之徐建国老师

文章简介：世界上总有一个地方，无论你走多远，离开多久，心里总是惦记着回来，那就是——家园。时至今日，朗润园已经成为许多人的精神家园。十七年弹指一挥间，本文作者徐建国从朗润园的青涩学生已成长为这里“小荷初露尖角”的青年学者，并与这里根脉相连。其洋洋洒洒万余言，仍难诉深情。今天先为大家奉献上半部，从“缘起”到“风平”，从“浸润”到“试水”；明天再推出下半部，敬请期待。

(一) 缘起

恰逢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2008年更名为国家发展研究院）20周年院庆，动员大家写一点纪念性的文字。稍一思量，从在这里求学，到回这里教书，转眼竟已续了17年的缘分。从此间少年到渐生华发，众多师长，诸多教诲，竟历历在目。

1997年9月，我考进CCER读硕士，是CCER的第二届研究生。97年9月入学的硕士，考试是在97年的一月份，报名是在96年9月底。准备考研的学子，一般前一年的暑假就要开始准备。我本来要考的是法律，因为本科时对于历史、法律比较感兴趣。可是96年9月的时候，偶然得知新成立了一个CCER，是一批海外回来的博士成立的。立刻跑到研究生院的招生公告栏去看，居然看到林毅夫、海闻的名字，于是就很快转变主意报考CCER。其实当时已经9月下旬，记得离报考志愿只有4天。临时变阵不无风险，但是林、海二人在脑海里的印象深刻，也就义无反顾了。

第一次见到林毅夫老师，是1994年冬天，在北大破旧的老二教的一次讲座上。当年的老二教如今早已拆得不见踪影，但是那一次讲座依然记忆犹新。林老师身材高大，思维敏捷，言语幽默，回答问题快速而清楚。那时北大学风很好，每晚上自习都要占座位，还有各种各样的学术讲座。林老师的讲座，是听过的讲座中印象最深的。

当时懵懂，不完全听得懂，比较优势、休克疗法、东欧模式这样的词汇，当时还很陌生。后来才知道，林老师笔耕不辍，可能是唯一对中国经济变迁提出系统性解释，建立了自己的理论框架的人。

初见海闻老师，是旁听经济学院的课程。查无可查，记得应该是1995年春季。听学长说这个老师的课讲得好，于是早早在教室占座位。记得是在三教101，三教就在五四球场的边上，现在依然还在。临上课时，突然有几个人进来说他们定了这个教室。海老师刚好进来，说我们也定了，且已经满满一屋子的人，对方只好作罢。海老师便开口笑言，这就是先占领市场的好

处，尽显日后海老大的风范。

开始上课之后，海老师才让人见识到他真正的功力。我第一次见到一个老师，可以用一支粉笔，在黑板上把两国贸易中供给、需求、价格、福利的变化讲解得如此清楚。后来自己也教书，知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的含义，自己不理解透彻，是决计不能讲的如此清楚明了的。此后多年，海老师一直是北大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我一点都不奇怪。

还有一件小事情，促使我义无反顾报了 CCER。得知 CCER 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以后，就打听 CCER 在哪里办公，得知是在老地学楼，就在概率系老化学楼的对面，于是立马跑过去看看。本来是要咨询一点招生的事情的，可是跑过去之后，看到拥挤不堪的两间办公室，人来人往地在那里忙碌。因为拥挤，所以大家都是侧着身子过来过去。于是我什么都没有问，默默地在门前站了一会儿，就决定报考 CCER 了。

报考的时候，还不知道宋国青、周其仁、易纲、赵耀辉、胡大源这些即将对自己产生深远影响的名字。可是，缘已起。

(二) 风平

CCER 一年级的课程，是蛮艰深的，有人称作是魔鬼训练营。主要的课程就是“三高”，高级微观、高级宏观、高级计量。高级微观用的是一本叫做 MWG 的教材，MWG 是三个作者 (Mas - Colell, Whinston, 和 Green) 姓氏的第一个字母，书名叫《微观经济学理论》(Microeconomics Theory)。这本书的第一版是 1995 年，我们 1997 年上课就用了。此后很多年，这本书一直是世界上最好的博士项目一年级课程的教科书，后来我毕业后美国杜克 (Duke) 大学读博士，用的也是这本教科书。CCER 从成立起，就树立了很高的标准，由此可见一斑。

微观是经济分析的基础，MWG 的微观经济学，集微观经济分析之大成，是极好的教材。研二的时候，有机会担任一年级高微的助教，又学习了一遍。助教的工作是跟课，然后上习题课。不知当年给学弟学妹们讲清楚没有，但是自己再学一遍获益良多，倒是真真切切的。

相比微观，宏观要难一些。微观考校的基本就是逻辑推导能力。给定前提，会推导就行了。推导完了，意义也就明了了。虽然谈不上融会贯通，但基本也算是会了。基本“会了”之后，还有功力深浅之分，那就是另一层的境界了。

宏观不一样。宏观考校的不仅是逻辑推导的能力，还需要对经济系统的运行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对现实的情况要有一定的把握能力。不然的话，不知道自己推导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有时明明推出来的东西和现实不符，自己也不知道。错了还不知道，这是最恐怖的。因为这一条，我从不相信数学好的人就一定能学好宏观。

初识宋国青，是 1998 年春季，也就是一年级第二学期，听他讲授高宏二，即一年级第二学期的高级宏观经济学。宋老师用的是卢卡斯的教材，上课就开始讲模型，推公式，从卢卡斯果树模型讲起。记得当年有点被虐的感觉，因为模型前后线条太长，不太好缝上。前提假设说

完了就是一大堆，然后开始推，然后还要加假设，然后再推，然后再说假设好不好，哪一个假设如何导致了哪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好在哪里，坏在哪里，怎么换会更合理。逻辑线条长了，头绪多了，就不太容易看清楚，前后不好连上。事后看，宏观讲究一般均衡，头绪自然多一些。

被虐之后，就心甘情愿选了宋国青作导师，有幸此后一直聆听教诲。此后多年，宋国青常常可以漫不经心地一句话点透你，功力尽显。智力虐待，何尝不是一种精神享受。

整个一年级的时间，同班同学的生活大致都一样，就是看书、上课、做作业。课程之外，还给胡大源老师做过一个学期的助教，课程是商务统计。胡老师做事情极为认真仔细，多年一直如此，CCER的老师同学们都是知道的。特别记得的是有一次胡老师让我讲一个章节，课后说我讲课还不错，也增加了一点日后当老师的信心。

虽然课程重，但是大家都很充实。用现在的话讲，当时的幸福感很高。其实忙碌是CCER文化的一部分，半夜的时候老师们经常都在。据说老师开会都安排在半夜，因为老师们白天忙，开会很难排时间，晚上都来加班，安排开会反而容易了。学生忙，老师更忙，没有人有怨言。

一年级的生活紧张忙碌，风平浪静。

（三）浸润

从二年级开始，就要真正开始学习做研究了。上课是走别人走过的路，研究是走别人没走过的路，其中甘苦，饮水自知。探索没走过的路，方向感、品鉴力就特别重要了。作为CCER的学生和教师，不好评述CCER的路数有多正，但是那几年在朗润园的浸润，铸就了自己对研究方法、方向的理解，定了以后做研究的调子，却是实实在在的。我脑子里的经济学方法论，可用三个关键词概括：“从现象出发”，“约束条件”，和“真实世界”。

林老师的观点一直是“好的理论从重大的现象中来”。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美国先后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重大的经济现象先后围绕英国、美国发生，由此先后在英国、美国孕育了一大批经济分析的大家。现今，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出意外的话，很快就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了，许多重要的经济现象，已经开始围绕中国发生。对于林老师来说，脱离这个“最重大现象”的中国经济研究，都有缘木求鱼的危险。

同时，林老师又强调，经济分析不能脱离现实的“约束条件”。比如，“要素禀赋”就是最直接的约束条件，一国要根据自己的资源状况制定发展战略。从这里出发往前，其实就是“比较优势”了。中国是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家，当然要优先发展劳动力密集的产业。1950年代的重工业发展战略，违背了比较优势，因此事倍功半。而“比较优势”往前再走一步，就是“动态比较优势”了。一国的要素禀赋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相应的产业战略也要随之变化，资本、技术密集的产业不断增加，劳动密集的产业相应减少。

大道至简，有用的理论往往并不复杂。多年以后，再仔细回溯日本，亚洲四小龙，以及中国改革以后的发展轨迹，其实都可以在这一框架下解释。看似简单，实则有用。这样的经济学，

或者正应该是我们追求的。

周老师刻在我脑子的，则是“真实世界”这四个字。记得当时周老师有一篇关于科斯论文的读书笔记，题目叫做《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我看的版本，是 CCER 的工作论文，后来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收录在《产权与制度变迁》一书中。这篇读书笔记，写得荡气回肠，前后读了很多遍，出国的时候还带着，可惜后来丢掉了。周老师写字的时候一定用了心。用了心的文字，是不一样的。

周老师对于“真实世界”的强调，源于科斯 (Ronald Coase)。科斯很强调经济假设的重要性。经济分析中，“假设” (assumption) 是避不开的，因为涉及对现实世界的简化，否则分析没法进行下去。好的假设，几乎就是好的研究的一半了。

科斯认为，好的假设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要真实 (realistic)，假设真实推出来的结论才可靠，要不然怎么知道推导出来的东西靠不靠谱？二是易于处理 (manageable)，这样才能得出结论，否则分析没法进行。“真实且易于处理”，是科斯对于假设的基本要求。科斯针对的，是经济分析中对于真实世界的忽视。科斯曾说，当经济学家们发现他们不能分析真实世界里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个他们把握得了的想象世界来替代。真是惟妙惟肖。

不得不提的，是米尔顿·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的实证方法论。弗里德曼认为，只要预测对了就好，至于预测的前提假设是什么，对不对，并不重要。在经济学日渐量化的今天，弗里德曼的方法论都有大量的拥趸。很多模型，对于假设是否合理并不关注，甚至根本没有明确的假设，而只有量化的公式。不过，这种模型对于“易于处理”的要求，是很高的。本质上，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

但是这种模型对于中长期的分析，往往效果一般。对于政策的分析，就更加无用。“中长期”的意思，是人们的行为方式会发生变化，量化模型难以包含这些变化，效果自然大打折扣。这时候，“真实且易于处理”的假设，就极为重要了。周老师看到了这种量化模型的缺陷，更看到了人们因为短期“实用”就忽视长期风险的倾向，因此更加强调要研究“真实世界”。以周老师的阅历，自然知道这里面的危险。真正的学者，免不了有时要不合时宜地“众人皆醉我独醒”的。

与林老师、周老师不同的是，宋老师从未开口谈过方法论。作为宋国青的学生，多年观察的结果是，宋老师惜字如金，不愿多谈，一直忙于在复杂的真实世界里实践这些方法。他脑子里装了无数的现象，不停地考校着约束条件的变化，计算不同情况下的均衡结果。

经常可以看到的一个情景，是宋老师飞速转动的大脑和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嘴巴搏击，隐隐有刀来剑往、火花四溅之势，看得人热血沸腾，叹为观止。超越自己，对于很多人来说或者只是一句心灵鸡汤。对于先生而言，却是多年来的身体力行。

宋老师对于逻辑的严密和精确有近乎宗教的偏好，因此偏爱数理模型。但是他从来不是模型的奴隶。模型只是他的显微镜，是他的工具。模型不适用的时候，他会修正、舍弃。他关注的，是模型能够带来的对真实世界的穿透力。他的出发点和落足点，始终都是实实在在的、重

要的问题。对于那些“在约束条件下表现高超智力的经济学研究”（周其仁语），和周老师一样，他亦只是一笑而过。

作为导师的宋国青，教书育人的方式，是把问题象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一层地剥开。只是，有时他剥得稍微快了一点，一下子就到芯了。

因为有幸得识 CCER 的老师们，我从不相信中国人没有科学精神这句话。迄今 CCER 还有一群青年学生依然在科学的路上跌跌撞撞，算是老师们科学精神的传承吧。

（四）试水

课程的学习，更多是打基础。实际做研究，还是要上手“做”的，否则就是纸上谈兵。CCER 的诸多老师，都提供了这样的机会。而我试水上手做研究，要感谢赵耀辉老师提供的机会。

最早接触赵耀辉老师，是 1998 年秋季学期。当时我二年级，给她做一年级高微的助教。赵老师教学一丝不苟，至今依然记忆犹新。后来知道，赵老师做什么事情，都一样的严谨。对于我自己而言，有机会再学一遍高微，是难得不过的机会。每周都要把作业再做一遍，然后给大家去讲。自己有了讲课的经历，体会到讲清楚比会做题难多了。对老师的尊敬，又多了几分。

助教工作期间，赵老师问我要不要一起做一点研究，我当然是求之不得，从此开始给赵老师做助研，持续了接近两年。赵老师说一起做研究，其实是客气，我其实就是研究助理，给赵老师打下手，借机接触一些实际问题。赵老师厚道，写文章加我的名字。

当初赵老师带我看过的几个问题，迄今依然记得清楚，现在对养老问题、就业问题、教育问题的理解，都得益于当初打下的底子。赵老师是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师从著名的 D. Gale Johnson 教授，分析问题丝丝入扣。其中印象最深的，是着眼的角度。芝大一派，讲究分析经济个体的行为，分析人们随着环境和政策的变化而进行理性的选择，这其实是“卢卡斯批判”的实质所在。赵老师时常问，这样做行不行得通，人们在没有约束下会如何选择，加了约束会有什么变化。

与上面分析方法对立的，是可以称之为“经济工程学”一种分析方法。在“经济工程学”的分析里面，往往为了分析的简化，大笔一挥，人们就按照“经济学家”的指挥棒行事了。其实简化并不可怕，人们做分析总要简化，简化完了自己要有数。可怕的是，分析完了之后，“经济学家”们会“忘记”自己做过这样那样的假设，以为真实世界就是他们假定的那个样子，忘记了推敲不同假设下的不同结果，忘记推敲不同结果的合理性。更有甚者，把推导出来的东西作为标准，把现实往推导结果上面靠，而不是相反，真是让人无语。当上帝的冲动，看来不仅政客有，经济学家也有。周老师对于“真实世界”的强调，也是因为这样的“经济学”太多了。怪不得，周老师有时会开玩笑说，“你们经济学家”。

最难忘的，是和赵老师一起改文章的情景。记得那时赵老师的办公室很小，改文章的时候一般是她坐在电脑正前方，我坐在边上，主要是她写我看着。印象最深的，是她对每一字句的

雕琢，反复问我这么讲意思是否准确、到位，话有没有说过头，有没有意思没有表达出来，还有没有更好的表达方法。我时常诧异，原来写作的过程，可以发现很多新东西。本来脑子里有的一些模糊的东西，经过写作的打磨，可以发现其中的错误，推演出本来就在那里，但是自己却没想到的东西。培根（Francis Bacon）说过，写作让人精确，大概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记忆里，这是我的写作入门课。言传不如身教，多年以后，我也这样改学生的文章。或者，这就是传承的意思。

（五）启蒙

跟宋老师做助研，则如醍醐灌顶，开启了我对经济的理解之门。身为宋门学生，不好评说自己的老师。一定要说一句的话，不妨借周老师金口：宋国青是中国宏观经济的第一人。宋老师守正出奇，语出惊人的风范，是坊间公认的。之所以奇，是因为想不到。问题是，他总能想到，别人总是想不到，这就奇了。

修习经济学的学生，大都会经历这么一个怀疑的阶段，怀疑自己学的东西到底有什么用。比如，高微的数学这么复杂，那么多看起来不合实际的假设，定理和数学定理一样复杂，怎么和经济现象联系上啊？这样严格的假设能用来分析人的行为吗？宏观模型就更离谱了，假设条件一大堆，推来推去没完没了，到底有什么用。这种迷雾，是初学者时常困惑的。我也一样。

宋老师带学生的方法，是给你一个有趣的题目，让你去看、去想、去体会。记得让我也去看的第一个问题，是有关存货的变化。当时是98年底的样子，适逢中国已经步入通货紧缩，实际利率上升。企业和家户对实际利率上升的反应，是减少消费、减少投资，特别是减少存货投资。在总需求的各个成分中，存货的波动是最大的。恰逢前几年中国的通胀率很高，这样企业和个人的存货水平其实很高。一里一外，那一轮去存货的过程可用“惨烈”二字形容。98年我国经济增速很低，“保8”是街头巷尾的谈资，与存货的大调整有很大的关系。

当时的另一个重要现象，是银行惜贷。因为实际利率水平高，企业前几年又借了很多钱，这样债务负担就很重。债负重了，经营自然艰难，银行贷款的时候自然就很犹豫。加上当时加了一条“贷款责任终生制”，哪个银行经理还敢往外贷款？企业拿不到钱，通货紧缩当然就来了。朱熔基总理被称为“铁相”，有时确实够“铁”。

在这个简单的例子里，企业、家户、银行、政府都在里面，各方的行为都可以用教科书的分析来解释。对于存货大调整的周期，宋老师用看似简单的分析预见到了，大声疾呼经济下行的风险。因为亲历他的预见力，经济分析的魔力令人不得不服。

当然，宋老师抓住了当时的一个关键变量，就是实际利率的大幅变化，引起各方行为的变化，这就把很多现象都穿在了一起。这种提纲挈领的本事，当然需要很深的功夫。后来，和宋老师的对话中，屡屡能够体会到一剑封喉的功力。而且，在宋老师那里，这些似乎都很简单。从此我认定，世界上最好的分析，一定很简单的。不能做到简单极致，往往就是没有真正理解。

当年宋老师有好多精彩观点，至今依然记忆犹新。1999年的时候，宋老师就提出，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支柱，是“房、车、路”。回过头来看，何其正确。其实后来问过宋老师，为何看得这么准。他手里仍拿着一支“三五”的香烟，淡淡地说，还能是什么。

也是在1999年，有一个关于“南水北调”的辩论。宋老师是坚决反对南水北调的，因为经济上不合理，这么费劲调来的水，成本很高的，根本没人用得起。替代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北人南移”，放开户籍制度，让人口自由迁徙，人们自然就会向东南沿海迁移，工厂也开到沿海地区，减少华北、西北地区的水资源压力。在此基础上，辅以灌溉技术的改善，在需要的地方加大投资进行喷灌、滴灌，大幅减少水资源的浪费，华北、西北的缺水问题完全可以解决。

事后看，虽然“北人难移”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可是不能掩盖其背后逻辑的正确性。每年几亿农民工浩浩荡荡地向东南沿海的迁移，就是这一逻辑的最好注脚。户籍制度，或是这个国家最大的一块硬伤。

宋老师当年有一句话，叫做“预测回头看”，意思是做预测要用事后的事实来检验、修正，否则不如不做。在经济学家的世界里，往往十个人有十一种观点，个个都理直气壮，头头是道。多说无益，那就看谁的预测准吧。

CCER聚集了一群学识与品格并重的师长。言传身教的影响，或是不经意之间的。周老师研究电讯改革时那一句震聋发聩的话，“两个魔鬼，总好过一个天使”，是我知道的对竞争机制的最清楚的表达。周老师的另一篇文章，《市场里的企业：一个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特别合约》，抽丝剥茧，丝丝入扣，成为我日后思考和写作试图模仿的一个典范。个人以为，这篇文章超越了科斯和张五常，是现代经济中对企业理论的最好诠释。周其仁常被称为是“最懂企业”的经济学家，头衔背后，是深厚的经验观察和理论修养。

易纲老师在组会上那一句“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则暗含了“大道至简”，“融会贯通”之意，相信很多易门的学生都依然还记得。学生们往往说了很多，但是提炼不出“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易老师会退一步问，“最重要的三点是什么”。古人讲循循善诱、谆谆教导，大概指的就是这个吧。易老师很尊重别人，总替别人着想，他那一句“你们的时间贵着呢”，至今依然如在耳边。

（六）暂别

2000年从CCER硕士毕业以后，到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念博士，算是和CCER暂时离别。Duke位于美国东海岸的北卡罗来纳州(North Carolina)，是南部名校。学校位于一片森林之中，风景宜人。我对“小镇”的喜欢，就是在那里养成的。

在Duke的日子，其实是蛮轻松的。由于有了在CCER打下的基础，一年级的博士课程并不觉得难。当时的高微老师是个牛人，拿着粉笔讲MWG，而且清清楚楚。初到美国英语不好，但是得益于在CCER的基础，在高微课上还是敢发言的。老师是个妙人，你结结巴巴说一句，

他就在黑板上加一笔，然后就很清楚了。

Duke 是篮球名校，大多数学生都会几下，小伙伴们每周都会在篮球场上聚一聚。我对篮球的热爱，就缘于此。当时还练过网球，可惜以后日久生疏了。即便如此，高微、高宏、高计都轻松过关。一年级结束时的博士资格考试，也轻松过关。

真正犯难的，是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找一个博士论文的题目。周老师早先讲过的果然不假，做研究最难的，一是批评，二是提问，比上课难多了。提出一个好问题，博士论文的题目就有了。可是提出好问题，需要很多的积累，很深的功夫。

最后发现，还是 CCER 期间的积累起了作用。记得曾经问过宋老师这样一个问题，宏观经济模型，往往都假设一个“代表性家户”，即经济体中的居民都是相同的，具有一样的禀赋，面临相同的约束，最后的优化选择也都是相同的。可是，现实中人们都是不同的，代表性家户推导出来的结果会不会有问题？

宋老师的回答一如既往的轻描淡写：由于异质性导致的问题在代表性家户模型里无法研究。言下之意，如果一个现象是由异质性导致的，那么就要引入异质性的考虑。言下还有一层意思，对于代表性家户模型可以解释的问题，如果异质性考虑只有边际上的影响，就不要过于分心考虑，除非这种边际上的考虑对于正在思考的问题非常重要。

那么这种异质性怎么办？抛开不管吗？该管的时候还是要管的。宋老师的回答里面的最后一层意思，就是这个。于是，我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人们的异质性信念对资产价格的影响。

2005 年博士毕业以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香港大学任教。因为运气好，博士论文的第一章得以顺利发表在顶级期刊上。2007 年，申请到了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任教。加国冰冷，我对红酒的兴趣，就是那时候养成的。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学多年以后，思乡的情绪，越来越强烈了。

（七）归来

2009 年 5 月，在香港大学给一个讲座，期间接到 CCER 的陈曦代表周老师和巫和懋老师发来的邮件，问我是否愿意回 CCER 任教。我当然愿意，然后就回了 CCER。

周老师后来有一次说，劝我回来很费劲。其实他知道，我心早定。当初犹豫的，是回来以后发表会比较难，而发表是获得学术自由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行里的人才会知道，现在“发表”和“研究”其实是两个东西。高校里面的学者，发表完成之后，才能真正开始做研究的。你看中国这么多有趣的现象，这么多重要的经济问题，但是高校里青年一代的学者却基本处于“集体失声”的状态。其实这一代青年学者的基本训练要比前辈好得多的，只是忙于发表，没时间接地气。

这一点上，我特别佩服林毅夫老师。林老师的博士论文，做的就是中国 1959—1961 年的大饥荒问题，而且能够发表在一流的期刊上，发表和研究都不耽误。林老师一直强调“现象”，

强调要关注“重大的现象”，而且身体力行，多年来一直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吾辈为五斗米折腰，整天忙于没有实际意义的发表，实是难以望其项背。

不过，周老师的说服能力是一流的。何况，我内心根本不需要说服。人生苦短，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是最重要的。即便不能完全如意，也不能完全放弃。经济学是社会科学，观察现象是第一位的。观察中国的现象，一定要在国内，感受这 13.5 亿人的脉搏的跳动。这一百多斤放在哪里，决定一个人能够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周其仁语）。

回来的第一年，受命组织 CCER 的学术研讨班（seminar），请了好多人来给讲座，平均大概一周两次，好不热闹，自己也借机学到很多。从 2000 到 2009 年，九年间漂流海外，其间所做研究基本与中国的现象无关，其实是退步很多了。正好抓住机会补补课。

组织学术研讨班期间，有两个观察。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确实缺少 seminar 文化。Seminar 的本质，是大家坐在一起讨论问题，一般是主讲人讲自己的研究，然后大家各抒己见，围绕这个研究展开批评、讨论。其中批评是最重要的，是学者交流的关键环节。客气话开头讲一句就可以了，讲多了不好。Seminar 的要义，是思维之间碰撞、激发，这样才能发现彼此的弱点、盲点，共同提高。好的经济学家，不是一个一个出的，是一批一批出的，比如芝加哥学派，出了那么多顶尖的好手。究其原因，互相批评，互相促进，是重要的一条。一个人自己想，再天才的人也会想叉，会走弯路，甚至钻牛角尖，进死胡同。

CCER 的 seminar 文化传统，算是好的了。记得当年念书的时候，老林发言总是很积极。有一次杨小凯来给讲座，记得是 1999 年，讲的是中国式渐进改革和苏东式休克疗法的比较，来了很多人，包括德高望重的茅于軾老师。当时的争论很激烈，林毅夫和杨小凯的观点就不同。不过二人君子之争，后来杨小凯过世，林毅夫专门撰文纪念。君子和而不同，由此可见一斑。

茅老当时话很少，几乎未开口。大家争到激烈处，茅老开口说了一句：中国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止分定争，大家都认。学者们讨论问题，角度不同，各有侧重，但又有谁会异想天开，妄想切断历史？除非是真的不懂。历史如此厚重，乃无数的苦难与智慧凝结而成，而游行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我理解杨小凯对于宪政的强调，无非也是担心发展后力不足，难以持续，而不是对休克疗法的肯定。

我从未参加过芝加哥的 seminar，据说那里的讲座，主讲人常常在第一页幻灯片就被打住，众人狂问不止，场面时常火爆。坊间传闻，有的主讲人被问哭了。真假不得而知，但是讨论的氛围可见一般。芝加哥的教授们，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打磨出最好的文章，听来不禁令人神往。

学者的荣誉与尊严，在于把问题说清楚、把道理讲透。别人未必同意你的观点，但一定要觉得你有新意、有趣。其他的东西，并不能给真正的学者以尊严。林老师常说，结论不重要，怎么得出结论才重要，其实也是注重研究本身，包容不同观点的意思。

其次印象深的，是现在学生们的发言已经进步很多了。我念书那时候，学生在 seminar 上很少发言，包括性格活泼、课下话很多的学生。记得清楚的，是汤弦当时在 seminar 上比较活

跃。可是到了我回来组织 seminar，学生时常发言，提问、批评、评论兼而有之，而且质量常常很高。短短十年之间的变化和进步，让人不得不侧目。因为这一点，我是从来不用担心人们常说的 80 后、90 后问题的。

回 CCER 以后，有机会和以前的老师一起工作，继续向他们学习，当然是非常幸运的。卢锋老师主持的中国经济观察季度报告会，是重温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场所。学习不能白学，有时也做一点打杂的工作。当然也结识了一些新的老师和同事，黄益平老师对我的帮助就很多。另一个重要的感受，是 CCER 文化对于年轻老师的包容和影响。在我的眼里，CCER 的年轻老师，和别家的不太一样。虽然大家来自国内各大高校，但日子一长，都会打上了 CCER 的烙印。

转眼回国已经 5 年，期间感受最深的，还是追随周老师看土地问题。念书的时候，周老师那篇《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的读书笔记，写得荡气回肠，每次重读都有心神荡漾之感。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当年没能和周老师出去调研，心中常常遗憾。回国后终于能够一了心愿，补上观察真实世界这一课。这一补就是五年，估计还要补满长的时间。

研究真实世界，是一句“知易行难”的话。跟着周老师跑了很久，还是不得门道。看着周老师在田间地头和老乡相谈甚欢，我这农家子弟却张口结舌，不得要领，常有“情何以堪”的感觉。参加了无数的座谈会，基本上都是周老师和对方数人对话，有时甚至是舌战群雄，我基本插不上话。看起来，先生多年如一日的坚持、努力和积累，不是看看就能学会的。

回 CCER，就像是回家。或者，不仅对学生而言如此，对老师也一样。你看黄益平不是也回来了，林毅夫不是也回来了。

（八）家园

直至今日，依然怀念当年的老二教。老二教是旧式的建筑，有六个二百多人的大教室，夏天很凉快，常常去那里上自习。老林的那次讲座，也是在那里上自习顺便听的，之前并不知道林毅夫。然而，就是这么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我以后的人生轨迹。或者，这就是缘分。

2009 年回 CCER 的时候，老二教早已拆掉了。有一次在新二教附近逡巡，目测新二教应该就建在当年老二教的原址上。

拆拆建建是常有的事情，本不奇怪。只是时常觉得，拆掉的不只是老建筑，也不只是我们这些“老人”的怀旧情怀，还有凝聚在建筑里面的历史和文化。建筑宛如雕塑，凝聚了设计者的匠心。屹立的时间久了，见证的风雨多了，建筑也会长出灵魂。立足她面前，凝视她身姿，你会听到她安静的诉说，或磅礴大气，或沉静睿智。

机构也一样。创立者的品格和匠心，决定一家机构的文化和底蕴。时间越久，这样的底蕴就会越醇厚，如陈年的佳酿。

CCER 就是这样一个机构。创始人和元老们的学识和品格，与古典的北大情怀融合，形成

了一种气场，弥漫在朗润园，浸润一草一木。后人沐浴其中，自然如入芝兰。记得有一位学生说过，CCER是“最北大”的地方。

正因为如此，对于很多 CCER 学子而言，不管走了多远，朗润园都是我们永远的精神家园。

撰稿人：徐建国老师

致青春·我的十七年“经双”路

[我与朗润]之赵普生老师



经济学双学位项目老师：刘博谦（左）、赵普生（中）、勾雪（右）

文章简介：在朗润园，在北大，由赵老师领衔的经双团队有口皆碑。回顾十七年风雨经双路，赵老师倾情写就了这篇《致青春》的文章。青春不会逝去，青春永远在我们心中，在为学生、为事业的奋斗中。岁月流逝，赵老师却一直铭记着所有为这项事业付出的人们，除了“感谢”还是“感谢”。其实，最该感谢的或许正是她自己，那坚守着希望、砥砺前行的身影一直在激励着朗润园的年轻人。

20 年院庆大家的回忆文章水平越来越高，使得我更不敢动笔，况且只是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但是黄益平老师还是不断的叮嘱，于是提起拙笔拉拉杂杂地写出一篇流水账，希望得到谅解。

从 1997 年 11 月走进中心朗润园的院子不知不觉已经过去近 17 年了，惊愕时间过得如此之快，但静下来细细回味许多场景仍历历在目。

1997 年我的工作单位解散，所有员工需要重新在北大安排工作。得知经济中心正在招聘，我拿着简历走进了朗润园。第一个接待我的是办公室主任张佳利老师，他把我引到海闻老师的办公室，当时说了什么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可能一直在学校工作的经历让中心选择了我，几天后得到通知可以上班了。由于之前对中心的情况和老师们的经历了解不多，所以也没有太多的想法，只觉得是一份工作而已。

后来经历的一件件事情让我逐渐改变了看法，中心的文化感染了我，推动着我，也提升着

我……

记得当时中心的教职员工白天各自忙碌工作，所有会议全部是晚上 9:00 以后召开，即使是鹅毛大雪的晚上也是如此。每次全体会议，员工可以提前半场——大约晚上 11 点左右离开，教师还要更晚，大家创业的激情无比高涨。我想是以林毅夫老师为核心的经济学家们，放弃国外的优渥生活，真心想为国家的发展奉献自己的学识、能力和一腔热血。这些话现在人可能觉得有点假大空，但是作为亲历者，我真切地感受到了这种氛围。

作为中心主任林老师每晚都会工作到子夜以后，节假日也是如此。副主任海闻老师有时工作到很晚索性就在办公室打地铺。

我清楚地记得，一晚我们在中心当时最大的会议室（现在的致福轩会议室）讨论工作。有员工提出，教辅行政工作职责分工明确更有利于工作。林老师严肃地说：“行政工作要有分工，但是很难把所有的工作分得一清二楚，你看到的工作就是你的工作，这就是中心的文化，如果不能适应这种文化，明天即可离开。”当时会场一片肃静，接下来海老师做了解释并举例说明，为什么要这样做，过去是怎样做的，今后应该如何做。中心始终应把学生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大家都是为培养学生服务的。

从加入中心我就一直负责经济双学位项目，这个项目是易纲老师提出并亲自设计实施的，易老师依据自己在美国读书教书的经验提出设想，并亲自制定教学计划，到学校主管部门申请报批。96 年秋季第一学期开了 5 门课，易纲老师讲经济学原理，赵耀辉老师讲微观经济学，胡大源老师讲经济与商务统计，还有两位数学学院的教授刘西垣、何书元分别讲高等数学和概率统计。强大的师资、经典的经济学教材，吸引了北大学生纷纷报名参加。17 年来，经双项目始终保持择优录取的传统，一批批优中选优的学生在经双这个大家庭中成长起来。

那时经双的教务管理由硕士生曹雄飞兼任。1997 年 11 月我从曹雄飞手中接过项目的管理工作，虽然当时双学位已有 2 届 500 多人，但是经双如何发展我心里确实没谱，只是想好好地为学生和老师们服务。

好在中心领导对经双的工作都非常支持，重要的事项都亲自把关处理，这是经双工作顺利开展的重要保障。

林老师作为中心的主任，十几年来一直坚持每学期为经双学生开设中国经济专题课程，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分析引导着青年学子关注国家经济发展的现状、激发他们钻研经济学理论的热情。林老师的课程之火爆，放眼全北大也是屈指可数的。尤其是 2008 年他去世行任职前那一学期，500 人的大教室完全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我们只能同时在隔壁又开了一间视频同步直播的教室。为了培养经济学理论研究人才，在林老师的主持下，经双项目开创了中国经济研究奖学金班，致力于培养未来中国经济学科的带头人，为中国经济学科的发展做出贡献。第一期招收了 6 名学生，要求非常高，每位学生要修数学分析 I、II、III，每学期主修绩点要达到 3.5 以上，经双成绩要达到 3.8 以上，同时每人都要参加校长基金论文的写作。第一期 6 人毕业时 4 人去了美国深造，另外两位中，邢亦青在中心读硕，后去美国读博，是他们那一届中相

当出色的学生，林一青去了山东大学读博。第二届有一位英语系的女生罗弥，毕业后也在中心读硕士。作为少有的文科背景的学生，她硬是完成了奖学金班的课程要求，之后也去了美国读博，她的毅力与坚持令人佩服。林老师和他的大哥在中心建立之时，就出资 100 万建立了中国经济研究奖学金，每年都会有优秀的经双学生获得奖励。

副主任海闻老师每学期都亲自参加助教会，以自己在美国做助教的亲身经历，勉励中心的研究生认真工作。记得有一次一位助教与任课老师发生了意见冲突，海老师在当天晚上 11 点把所有研究生叫到中心开会，及时地把问题解决。海老师还发起成立了经双的学生组织 CCERCLUB，这是目前北大最大的学生团体，从学术论坛，学习交流，参观访问，职场沙龙，以及自办刊物《朗润之声》，出版系列书籍《今年我们毕业》……同学们都做得有声有色，同时也锻炼了一批批骨干，如今他们活跃在各行各业的领导岗位上。

李玲老师任中心副主任时也是废寝忘食的工作，她领导我们在教育部的评估中获得了上级领导的一致好评。当时学校把经双项目作为评估的抽查单位，教育部及北大领导亲自到中心听汇报，看我们的教学成果。因为从双学位创始起，所有重要资料均得到了细致的保存，除了教学材料、试卷等，连学生选课单、学费收据等都得到了妥善的保管，令专家组的成员感到非常惊讶，而我们展示出的毕业生照片、各位老师的授课风采更是吸引了他们的眼球。正是因为一以贯之的严谨管理、杰出的师资及教学水平，2004 年经双项目获得了北京市教学成果二等奖。

国发院成立后，周其仁老师作为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首任院长，亲自主管双学位的工作。这段时间内，周老师在双学位的课程建设、项目发展各方面都做了许多工作。他作为院长，工作非常冗杂，但是当双学位有活动邀请时，只要他在北京，几乎是有求必应。印象最深刻的一次，2012 年双学位校内招生遇到一些难题，我们临时决定举办几场宣传活动，晚上八点多刘博谦给周老师发了一条短信，邀请他做一场学术讲座，我们知道周老师忙于调研、经常在全国各地奔波，当时内心非常焦灼。没想到周老师很快就回复了，并且一口答应，这种鼓舞让我们觉得所有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双学位项目在此期间也扩展了课程的类型，例如现在在校内广受欢迎的人文与社会科学讲座课就是这个时候设立的，汪丁丁老师设计和组织了课程，并不辞辛苦地邀请了人文社科不同领域的顶级专家为双学位学生讲授课程。这些讲座的内容看似与经济学关联不大，但汪老师认为应当“引导学生关注根本性的问题，在根本问题关注的引导下，关注技术性问题。”这也体现了双学位项目希望培养“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富有创新精神、跨学科优势的新型人才的理念。周其仁老师曾多次组织员工去不同行业内优秀的企业参观学习，在舆论曝光三聚氰胺最烈的时候，带领大家参观蒙牛集团，和董事长牛根生座谈，与蒙牛集团的各部门深入交流，访问养牛专业户。后来又组织去了南方的万科、华为；北方的东软、大杨创世；东方的皇明太阳能。每次回来总结谈体会，这对我们来说都无疑是一次升华。记得胡大源老师在参观华为时，他问随行的华为党委书记：“你们五年后有什么远景打算？”对方说：“别说五年，一年都不敢想，我们每天都如履薄冰，每天都在艰苦奋斗。”这与我们的工作态度也是完全契合的。周老师请大家思考我们如何做好工作，像厨师一样为同学们提供丰富的有

营养的菜肴，同时，要有敏感度不能麻木，及时发现同学的困难和问题帮助他们解决，把问题解决在萌芽期，不要让“三聚氰胺”从我们的手中流出。

巫老师作为常务副院长主持工作时，和元培学院签订了 PPE 合作项目，并多次叮嘱我们，这些学生就是我们自己的本科生，一定要好好为他们服务。在 2013 年就业形势很困难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达到了自己预期的目标——不论是出国深造、国内读研还是工作。巫老师还不辞辛苦积极为校内外生活困难的经双学生筹措助学经费：目前已经运营两年，未来继续签约两年的富邦助学金是经双最大的一笔助学项目，已提供了近 200 多万元，帮助了近 300 名校内外经双学生完成学业。值得一提的是，巫老师的助理唐明秋赴美国学习后，将双学位项目介绍给北美排名第四的金融工程硕士项目——纽约市立大学柏鲁克学院。巫老师趁此机会向对方大力宣传我们的项目，搭起了双方交流的桥梁。对方已连续两年派人来北京直接录取经双的学生到该校深造。今年，还有 25 人的暑期交流项目已经启动。国发院的员工离开朗润园之后还在想着她，并继续为这里的学生创造条件学习深造，这正是朗润园魅力的体现。不仅员工如此，目前还有一位在美国读硕的校外双学位校友，他的父亲一直匿名资助我们的一位困难学生。有这样的同事、这样的校友，也是我们的幸运。

姚洋老师任院长以来，更加强调教学质量的重要性，要求我们学习美国大学的长处，不断改进我们的工作。赵耀辉老师作为主管教学的副院长更是要求从细节做起，全面梳理全院教师的研究领域和课程设置，做到教学任务心中有数，教学计划详实规范。除此之外，她还专门召开了与双学位学生的座谈会，直接了解学生对课程设置、教学情况等方面的意见和看法。

从 1996 年到 2014 年，经双毕业校友超过 1 万人，遍布大江南北、国内国外，正像卢锋老师的体验一样，不论是美洲，欧洲甚至非洲，走到哪里都能碰到经双毕业生和老师打招呼，从 1998 年开始每年的经济学原理课都由卢老师一人承担，当时所有的学生都能听到卢老师的精彩讲授。2003 年开始，我们又为全校学生开设了经济学原理的通选课，将班级增设至三个班，海闻老师、霍德明老师、薛兆丰老师都在不同时期为大家讲授这门课程，带领大家领略经济学的魅力。

杨壮老师是 BiMBA 的联席院长，对经双的学生也是非常关心，他开启了经双学生海外交流的先河，2013 年经双学生赴美参加美国西点军校组织的全球青年领导力论坛，就是杨老师主动帮助联系的，不仅如此，杨老师还为赴美的学生筹集了机票。

经双项目的发展离不开助教的辛勤工作，课前准备，跟听课程，上习题课，网上答疑，判作业，监考，阅卷。同学们在朗润园种下的梦想种子，也有他们汗水的浇灌。

经双项目的发展离不开国发院领导对办公室工作人员的放权和信任，使我们可以将自己的一些计划、设想、创新能够及时的落实。17 年来经双办公室也建立了自己的文化：追求卓越，不断创新；无缝管理，注意细节，同事之间共同努力相互配合营造了温暖、温情、温馨的工作氛围。

我要特别感谢一起工作的同事，去了上海的田萍，现在的勾雪和刘博谦。勾雪是我们项目

的“技术骨干”，她会不断地开发一些技术小窍门从而提高工作效率。与此同时，她还负责校外招生、校外学生助学金评定、管理助教、考试安排以及收学费等工作。刘博谦是经双学生最熟悉的名字，她每天都会通过群邮给学生发各种通知和信息。她是北大学生出身，因此与学生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她主要负责校内招生工作，实施教学计划，安排课表，管理选课，评审奖助学金，管理 PPE 学生，毕业审查等。为了更好的服务学生，我们开发了网上管理服务平台，集合了招生、选课、请假、成绩管理、毕业工作、奖助学金申请、助教工作、校友信息搜集等功能。由此一来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使我们三人能够从容不迫地开展工作，为每年在读的近三千名学生服务。

最值得骄傲的是我们可爱的学生，近年我们请了中央财经大学会计系的教授为经双同学开设财务报表分析的课程，这位教师在给我们的邮件中深有感触地说：“北大的学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学生和学风，同时也真正体验到了一名教师的社会价值。”面对这样的学生我们怎能不发自内心的喜爱？通过我们的工作将他们培养成才，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在我们的工作中最难的是处理学生在考试中的违纪问题，北大的学生是在千百万考生中考入北大的，他们不仅是在实践自己的理想，还背负着家庭，家族，父老乡亲的厚望，如果因为犯错误拿不到学位后果可想而知。面对这样的同学和家长，在坚持国发院一贯学术标准，对违纪行为零容忍的前提下，我们会不厌其烦、耐心地做说服工作，同时又不嫌弃他们，真诚地送上我们爱心。记得有一位湖北女生，在大四毕业申请出国时私自修改了成绩，被学校发现面临取消学位的处分，在寒冷的冬天听到学校的决定时该生浑身发抖不知所措，我就把她请到家里为她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鸡蛋西红柿面请她吃下，耐心地给她讲道理，缓解她的压力，帮助她勇敢地面对发生的问题。最后，这位同学还是去美国读书了。她的妈妈来电话非常感谢，说孩子在北京没有亲人，如果没有老师的及时帮助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还要感谢历届 CCERCLUB 的成员，他们在学期间读了两个学位，还要抽出大量时间为经双同学服务，使我们这个辅修项目的学生组织在学校取得了卓越的影响力。1998 届法学院的学生樊功臣是第一届 CCERCLUB 主席，在任期内正好赶上北大百周年庆典，在林老师主持下中心需要组织 10 场中英文讲座，那时的条件比较艰苦，我们的讲座多数安排在电教，每次讲座前我和樊功臣都蹬着三轮车将桌花，桌布，贴有中心 LOGO 的讲台运到会场，讲座完再运回中心，樊功臣蹬三轮车的技术也日渐提高。现在他作为搜狐的运营总监还经常被师弟师妹请回学校，传授职场经验。历届主席有的已经工作、有的还在学习。从第一届到现在，十几年时间已经过去，他们的名字对我而言仍然历历在目，他们是：樊功臣、颜冰、彭磊、汪曦、刘妍君、刘洋、饶诗韵、周丽娜、孙权、丁耀武、陈敏、白冰、杨异、方晔顿、陈鑫泉、何昱颀。

最后我还要真诚的感谢经双校友王海明，目前经双六个奖助学金项目中，《21 世纪路劲奖学金班》是唯一由校友筹资的奖学金，这个项目不仅提供奖金，还有丰富多彩的双周活动，讲座、读书会、论文竞赛、参观等等。奖学金班开办 9 年来王海明亲历亲为组织各种活动付出了极大的心血。

我们平凡而琐碎的工作在旁人看来可能是平淡甚至是无聊的，但我们自己却是觉得充满了激情，学生的支持与反馈正是这种激情的来源。我想以 99 届毕业生黄京波（目前在联合国总部工作）的来信作为这篇小文的结束，学生的收获和成长体现了我们项目的价值和我们的工作的意义：“经济学的背景拓宽了我的专业和职业选择范围。……毕业以后，我想把我的专业法语，经济学和音乐结合起来，当时获得了一份法国政府奖学金，决定到法国学习艺术管理。……有经济学作基础，管理课程并不难学，哪怕是用法语学。硕士毕业后，我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工作，经济学的思路与系统的训练被我用在工作实践中。”

撰稿人：赵普生老师

与君同行

[我与朗润]之陈曦老师

1998 年底，我开始找工作，CCER 并没有大张旗鼓的贴招聘启示，几经辗转，认识了张佳利老师，知道了林毅夫老师在招秘书的消息。那个时候的 CCER 已经是北大校园里的一个传奇，遥远而美丽的朗润园，聚集了一批国外回来的大师，低调且神秘。对于我这种生活圈限于 36 楼与三角地、学五食堂的人来说，朗润园已经是遥远的了，我对经济学没有了解，不是那么知晓林老师的盛名，居然就那样跑去面试了，现在想想，真是无知者无畏呀。

那时候万众苑还没有扩建，原来致福轩大教室是办公室和资料室，最后的一排分别是梁能、胡大源、周其仁、海闻、林毅夫、宋国青老师的办公室。第一次见林老师时的情形其实已然有些模糊，不是像小说里写的永远记得住第一次见面穿什么衣服，什么样的神态，想想一个应聘者慌乱又没有经验，自顾不暇，怎么会记得那么清呢？只是记得林老师理着平头、高大、严肃。

林老师先是简短的问了我的学业情况，聊着聊着指着桌上摆放的一首诗说，你说这首诗是什么意思，我蒙了，这首诗是苏轼的“琴诗”，原文为“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当然以我那点墨水不可能准确地说出作者和诗的名称，只能按照字面意思解释一遍，又加上自己的理解，说，他是不是想请您自己动手，要富有实干精神。林老师点点头，没有多解释。后来才知道，这是香港商界大亨方润华先生的墨宝，林老师裱好放在桌上。其实苏轼的这首诗表面上讲的是弹琴发声成韵的道理，但言外之意是成就任何一番事业都需要上下分工，相互配合，各自发挥所长的哲理，林老师将之作为座右铭。才疏学浅的我，那时是体会不出这样深刻的道理的，居然也蒙林老师不弃，点了点头。

知道我本科是学英语的，林老师拿出一封英文来信说，你代拟一封回信，因时间关系不能接受邀请。我坐在原来的资料室开始抓耳挠腮，好不容易写完拿去给林老师看，他看了两眼很认真的问我，你是中文好还是英文好，我知道这信拟得极差，连声说我中文好，中文好，没想到林老师又拿出一封中文来信，香港写来的，用词颇为古雅，说，你按照这封信的风格拟一封回信。我心想这封信要再写不好，估计就泡汤了，绞尽脑汁、搜肠刮肚弄了半天，忐忑不安中再拿去给林老师看，他看完点点头，问我还有哪些课，课余先过来帮忙，我知道这是可以留校查看了。回去之后想，自己水平有限，勤能补拙，以后在工作上唯有认真、勤力，才能做好。

之后就一直在 CCER 帮忙，再之后海闻老师和胡大源老师又分别面试了我，到 1999 年 7 月毕业，就留在中心了。1999 年 7 月中心全体教授会在宽沟举行，芝加哥大学的 D.Gale.Johnson 教授来北京访问，他也去宽沟，需要人陪同，这个光荣而不艰巨的任务就落在我身上了。那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心全体教授会，当时心里很是不安，中心的老师们都是国外学成归来的博士，又有过上山下乡丰富经历，无论从学识上还是人生阅历上，都是我敬佩和景仰的一群人，该怎样的相处才好呢，颇为紧张。这样的紧张持续了很久，一直到会中开始照相，林老师，宋老师，

耀辉纷纷与 Johnson 合影，说是芝加哥毕业的，等三位老师一起去 Johnson 照合影时，周老师笑着对我说，你也去你也去，照了就可以成芝加哥的人了，一时大家都笑了，我放下心来，原来经济学家也会开玩笑的。

中心那时老师只有十几名，行政人员也只有六名，BiMBA 刚刚开始招生，我正式参加工作后参与的第一项重大活动就是中心五周年庆。真是时光如流水，逝者如斯乎，转眼就到了二十周年庆，时间都去哪儿呢？好多原来的同事来了又走了，我还依然在此，其实我也想过这些问题，我对世界对事物的认识与观念的形成深受它影响，工作能力的习得与锻炼都在这里，曾经觉得遥远又神秘的朗润园，当我一头扎进来的时候，它勤勉向上的工作作风、严肃认真的学术氛围、低调务实的人生态度已经深深包裹了我。我像一颗正在生长的树苗，机缘巧合被种植在朗润园，发现这里的土壤与空气竟是如此适合我。这里有让人举目的参天大树，有与我比肩正在生长的各种树苗，我很庆幸能够成为其中的一员，参与并亲历了二十年来的发展。

现在的年轻人找工作总要先谈很多条件还要问以后的职业规划如何如何，其实做什么不要紧，是什么职位也不要紧，重要的是选择一个对的机构与它共同发展。林老师常说有理想且为之努力奋斗的一生是幸福的，CCER 人有共同的理想，我们在追寻理想的路上有这么多同路人，沿途看到无数风景，同行者又是这样的精彩与风趣，这样的人生难道还不够丰富且幸福吗？人一生中最重要的选择是你与谁在一起，你与谁同行！

谨以此文献给中心成立二十周年。

撰稿人：陈曦老师

微风轻拂忆朗润

[我与朗润]之行桂英老师

你无法将一段记忆收藏，将它放进抽屉里面，因为风会把它找见，并告诉你的松木地板。

国发院二十周年，祝你生日快乐，再创辉煌。

1. 那些老师

对 CCER 的初步印象是那些闪亮的名字——林毅夫、易纲、海闻，感觉有一种神秘感和特殊气质。1997 年的某一天，我接到通知参加 CCER 的面试，也许是某种缘分，找朗润园异常顺利，几乎没有询问就找到了，面试我的是海闻老师，具体细节已经记不住了，只记得海老师说在 CCER 工作最重要的要求是尽自己最大能力把每一件事情办成。事后回想，那是因为 CCER 刚成立，又是一个思想超前的单位，当时制度还比较保守，体制还比较官僚，许多事情按常规办不了，需要个人的坚持和强烈的责任感才能办成，张佳利很好地诠释了这个理念。入职之后海老师还让我写了一个简单的英文邮件测试我的英语水平，是否过关不得而知。

97 年 10 月我正式入职，主要工作是外事、林毅夫秘书和研究生管理工作。工作之后最大的不同在于心理落差，原来在公司销售部门工作，可以说是公司的核心部门，受重视程度高，到这里后角色发生了变化，学生、教授是主体，要求服务至上，为此我适应调整了很长时间。CCER 外事任务繁重，主要是林老师和周老师的出访多，特别是林老师，一次出访很多国家，需要同时办理好几个签证，可是只有一个护照，那时出国手续还比较难办，批件需要提前好几个月办理，而对方的邀请函却迟迟不能发来。那时我除了和邀请方联系催要邀请函外，还经常穿梭于教育部、港澳台办和各国使馆之间，当然最重要的工作还有和北大外事处的老师“套瓷”，希望能尽快把批件办下来，后来我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套瓷”办法，就是到办公室给他们讲笑话，以至于后来成为朋友后大家见面还会提到讲笑话的事情。

最让人温暖的是林老师、周老师，基本上每次出访回来都会带小礼品给我以资鼓励。印象深刻的是林老师的一个小礼品钱包，有一次我上街买东西拿出钱包付款时要求打折，对方鄙视地看着我：拿这样的钱包还要求打折！我回去一查，原来那是个名牌，对不起啊林老师我竟然不识货。由于林老师凡事追求完美，给他当秘书最大的感觉就是亚历山大、不言自威，以致我女儿看到他后立即藏到桌子底下；林老师的信件比较多，我便业余集邮，后来我不做秘书了，他有邮票还记得送给我。

2. 那些学生

来到 CCER 后，从事琐碎的事务性管理工作，经常会失去自我，迷失方向，真正让我看到它的价值的还有那些年轻的学子，那些鲜活的面孔总会浮现在我的眼前。由于从事学生管理，每年有学生奖励评选，97 级硕士郭明各方面表现很好，几个奖项都给了他，最后他说：行老师，我获奖很多了，给其他同学吧；98 级汤玄毕业离校时将自己不多的补助给了我，说要留在中心做学生活动经费使用；00 级学生范文辉，记得本科是北京工商大学毕业，经常到办公室给我们帮忙，对 CCER 非常崇拜，在这里上学是她莫大的荣耀，非常勤奋，看了她写的班级纪念文章，我了解了原来每个学生都不平凡，他们在闲暇无聊的时候还不忘调侃老师，有天早上查邮件，他们班的张焕腾发来一个影星的照片说：行老师，你看这张照片像不像你的？哈哈。记得她找工作时最淡定，悄无声息地就去了发改委。他们班的郭凯毕业后去了哈佛读书，工作多年后回国到人民银行工作，他写的《王二的经济学故事》送我一本，读后很有启发；01 级赵鹏飞提前毕业，记得他上学时就热衷于校友工作，中心 10 周年庆时他捐了 1000 元；影响最深的研究生会是乔攀那一届，几个女将将校友活动做的风生水起，那届校友行业讲座印象深刻，共作了 6 讲，由 97 级校友丁琳牵头，效果很好；记忆中 05 级的班风比较活跃，朱老师任班主任，班长周晓乐是朱老师朋克乐队一员，王琅喜欢摄影，收到过他自己拍摄的明信片，意境很好。有一次我生病在家，他们班 6 个同学带着水果、牛奶到家里看望，真的感动了我，其中的李新宇同学最神，出国读书时找到了漂亮的高个子女朋友，不知道现在换了没有。他们班排的小品《CCer TV 旧闻联播》非常有创意，金竹维负责编排的舞蹈《龙的传人》很有感染力；中心的学生才气过人，江宇、李伟博、刘丹的小品《买书》笑翻了好几届 CCER 人，朱老师和几位同学的朋克乐队成为了无法超越的经典；我看过 11 级硕士王也写的一篇随笔，没想到在那个粗犷的外表下，隐藏着如此活跃的思维和细腻的情感；如今已是光大首席经济学家的徐高博士每年新生入学时还不忘给新同学做精彩的报告：最重要的几年——怎样在 NSD 中为未来职业发展打好基础；最难忘和快乐的事情还是去上海出差时和那几位八卦王聊 CCER 各种八卦，受益匪浅！太多的回忆……，如今他们都已经成了总监、经理、主任、教授……，不知道是否记得当年林老师教诲的经世济民、强国富民的梦想，希望他们在滚滚洪流中没有迷失。

3. 那些工作

在中心的十几年，可以说见证了中国研究生教育发展的各种变迁，更重要的是见证了 CCER 研究生教育成长的成长经历，当时胡老师负责研究生教学，CCER 曾经开创了多个先例：2000 年首次举办全国经济学大学生夏令营、博士资格考试严格淘汰制度、研究生入学大比例差额复试、每年公布每个学生的毕业去向、博士出国访问奖学金资助、与国际接轨的博士培养方案改革……，这些年培养的学生如今活跃在国内外各个行业，许多已成为了领军人物，也希望在未来的二十年国发院能继续引领潮流，占领经济学研究的制高点。



往事并不如烟

[我与朗润]之邢惠清老师

拍纪录片的刘导，在进入剪辑棚前，最遗憾的事情是没有录到与我的谈话，他采访了 60 多位老师、员工、学生还有校友，很多人都提到了我这个元老级人物。本人真不喜欢出镜，既然自称“周粉儿”，这点要和周老师保持一致！黄益平老师一再鼓励，我仍然不敢接话儿。419 活动进入倒计时，压力山大，我连伊利都顾不上，那有时间管文章的事儿呀！陈曦推出力作《与君同行，此生无悔》，很煽情，汪老师书写《我们一起成长，在朗润园》，引入他对成长的诠释：有能力欣赏更自由的人生！桂英老师神秘出场，发表了她的《不平凡的师生 不平凡梦想》，平凡而感动。

419 院庆系列活动圆满结束，为迎接余明德老师回来，张维迎老师请饭，他拿出珍藏十多年的茅台酒—醇香，酒过三巡，唤醒大家尘封近二十年的记忆，往事并不如烟。

记得第一次见到林毅夫老师是 1994 年 8 月初，在勺园 5 号楼的 106 房间，当时对他的感觉就是“高大帅气”，普通话里带着浓重的闽南音。以为他是台湾人，应该称林先生，但周围的人都叫他林老师，以后也就跟着称林老师。那天林老师讲了很多话，大致内容是，据他的预测 21 世纪很可能是中国经济学家的世纪，将要迎来中国经济学在世界上人才辈出的到来。他对 21 世纪是中国经济学的世纪充满了信心，一方面，时代给了我们机会，二方面，需要我们共同努力。说实话，大部分内容我是没听懂，就理解创办 CCER 这是一个事业，很伟大！财务这份工作，很重要！中国历代知识分子想做成点儿事情很难，首先我们自己必须事事严谨自律，特别是在财务方面，不允许出任何问题。他们在前方冲锋陷阵，我们在后方看家护院，必须保证后院不能起火。后来陈平老师也和我谈过类似的内容，他经历过文革时代，每次政治运动整人就是从三方面开始：历史问题、生活作风问题、财务问题。对于 CCER 这个机构而言，就剩下财务问题，所以这个方面绝对不能有任何漏洞。

1994 年的秋季是易纲老师主持常务，那时 CCER 没有自己招收的学生，他们就给经院和管院的硕士和博士生开课，易老师教计量，维迎老师教微观，张帆老师教宏观，明德老师好像是人口学？创业的过程是挺难的，每件事情都要从零做起。学校收发室没有 CCER 的信箱，我们就拿着一张批准中心成立的复印件，请他们给开了信箱。喝不上热水，也是用这张复印件，到总务部申请领到一个开水牌。老地学楼办公室的装修，张佳利从马路边找来三个民工，花很少的钱，2-3 天就完工了。林老师说，勺园的房租很贵，省几天房租就够买一个书柜。老地学楼的书桌、书柜还有一套沙发是张维迎老师去买的，物美价廉，搬到朗润园后仍在用，现在耀辉办公室里用的就是那批桌子，可以算是文物吗？下一个十年庆典时可以拿出来拍卖吧！记得 CCER 的第一部电话号码是 2501474。在 1994 年装电话是件很大的事情，为了再申请到两部直拨电话，易纲老师带着我在电话室磨了一个多小时，最终，电话室张主任实在不忍心拒绝，给

加了两个号码 1475、1476。我们说，1474（要死去死）不好听，能否给换一个号，张老师大大方方的告诉我们：怕什么？整个北大都是 250。再后来，电话号码升到八位，北大才改为 6275****。事隔多年，遇到张老师，提到此事，表达感谢，她已经不记得了。维迎老师讲到燕北园家里装电话，初装费 5000 元，手续复杂，申请号码很困难。装热水器时更具波折，他和易老师家都约了工人来装热水器。他请工人吃了碗面，热水器顺利装到合适位置，到易老师家安装时，工人怎么也不肯商量，最终位置放的不对，使用时很别扭。热水器装好之后，易老师有句感慨：能洗到热水澡就和在美国生活没什么区别啦！维迎老师的愿望是出门可以打的起“面的”，这就是过上体面生活的标准。明德老师最不习惯的是，喝不到冰水，餐馆不给提供餐巾纸，用的是那种我们叫“马粪纸”——很粗糙的原生态纸。尽管他们对冰水、热水有不同的要求，但就这样简单的生活却不容易满足。

虽然老地学楼工作条件比较差，但我们和左邻右舍都相处得非常好。左边是王义道老师的实验室，也有一伙年轻人无论白天黑夜都泡在实验室里工作，后据张佳利透露，那是个危险品实验室，门上画着骷髅和红叉子，当年也没人考虑对身体是否有危害。每当我们的电脑出现问题时，就会喊他们过来帮忙，小华老师那绝对是有求必应。右边几间办公室是校工会，自从和他们当上邻居，工会有活动就会带上我们。最难得是他们有间小会议室，遇到 CCER 有会议时，就去借用。后来我们用的次数越来越多，大有雀占鸠巢之势。我们还借用过一楼东面技物系和三层环境中心的会议室。朗润园里也有位很好的邻居——季羨林先生，他的房间与林老师的办公室隔着季荷遥遥相望。“朗润园”迎客巨石、“万众楼”牌匾都是季老先生给题写的。属于无心插柳，每当季老坐在书桌前工作时，抬头就正好看到他自己书写的“万众楼”三个字。天气好的时候，老先生会在朗润园里散步，偶尔走进我们院子，大家都会争着与他合影。院子里的石榴熟了，我们摘了先给他送去。《病榻杂记》收录的是季羨林先生自 2001 年住院之后写的散文，其中有篇《石榴花》，记录到朗润园他院门前那株石榴开花。

陈曦的前任是行桂英，当时 CCER 的行政人员只有三位，她身兼主任秘书、外事秘书、教务管理等职务。正如桂英所言：“那是因为 CCER 刚成立，又是一个思想超前的单位，当时制度还比较保守，体制还比较官僚，许多事情按常规办不了”，为了力争办好每件事情，她想尽各种办法，和学校部门的老师们拉近距离。CCER 的老师出席国外学术活动多，时间安排紧，按常规申报程序很难成行，外事处的老师都会积极帮助想办法解决。为了表扬外事处老师们的工作效率，她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燕园里的凡人小事》，登在北大校刊上。

在讨论院庆晚会主题时，我的传播中心同事高玲娜提出：女子二十岁为桃李年华。用“桃李朗润”意喻 CCER 二十年，灰常灰常合适。二十年时间，在一个人生命中不算短；对于一个机构而言，还很年轻。

祝福 CCER 有美好的未来！感谢所有给予 CCER 关心、支持和帮助的人们！

撰稿人：邢惠清老师

“朗润·印象”原创作品大赛 获奖作品展

【文字类·一等奖】

印象朗润四言韵诗——柳舟、潘佳佳







【图片类·一等奖】



刘博谦-朗润园第一缕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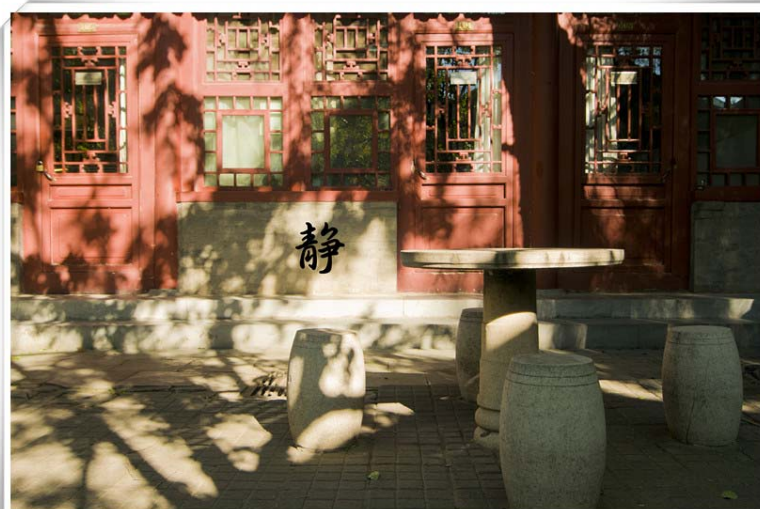
刘博谦-致福轩·晴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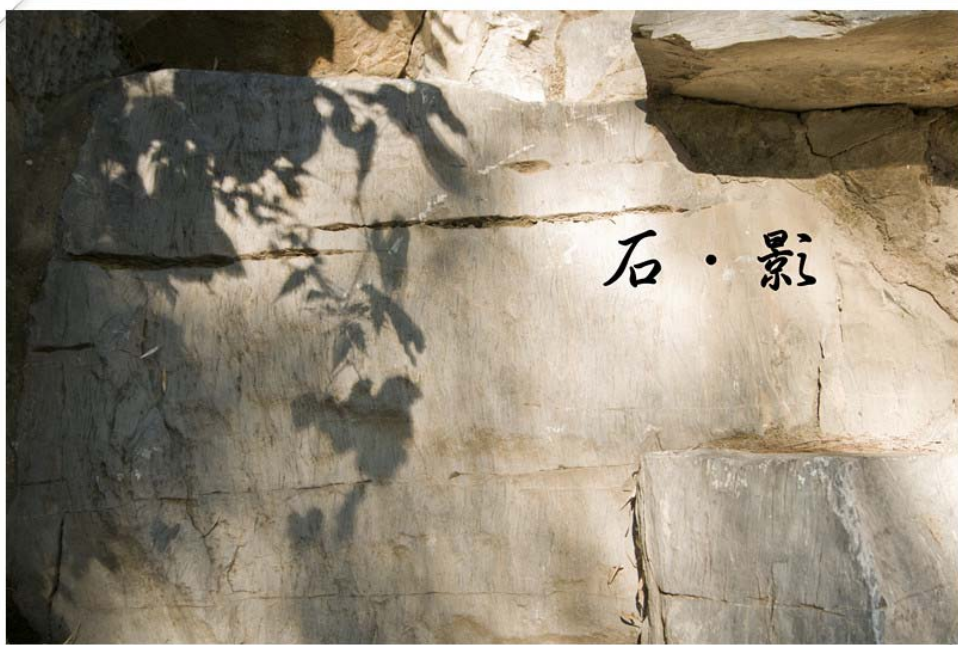
杨文韬-光



杨文韬-红·绿·蓝



杨文韬-静



杨文韬-石·影



杨文韬-一隅·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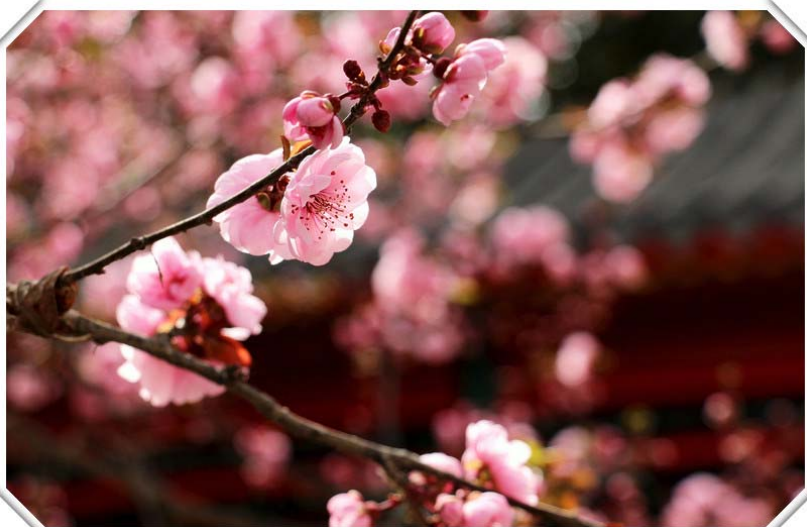
【图片类·二等奖】



陈鑫泉-花开正好



李智鑫-黛瓦朱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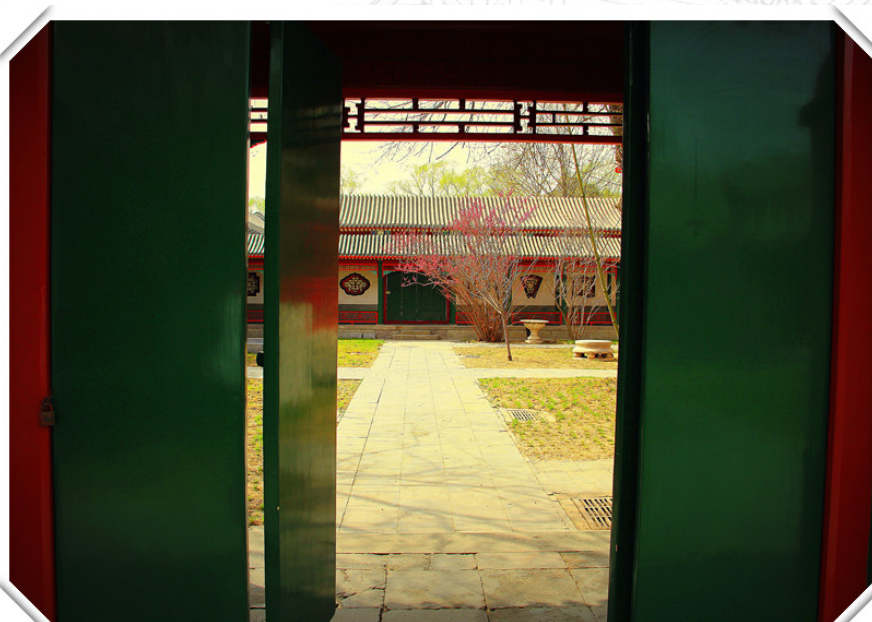
李智鑫-春满朗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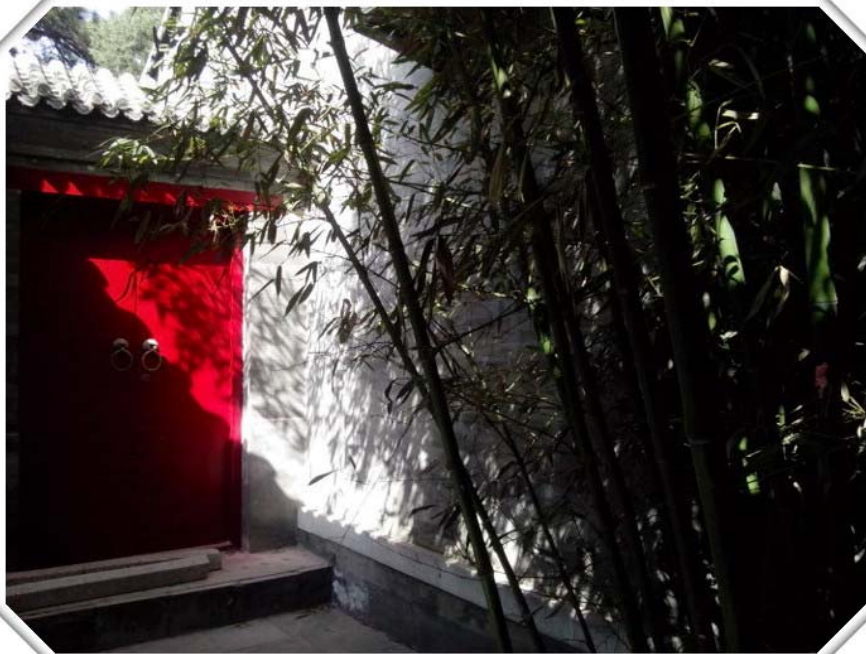
李智鑫-含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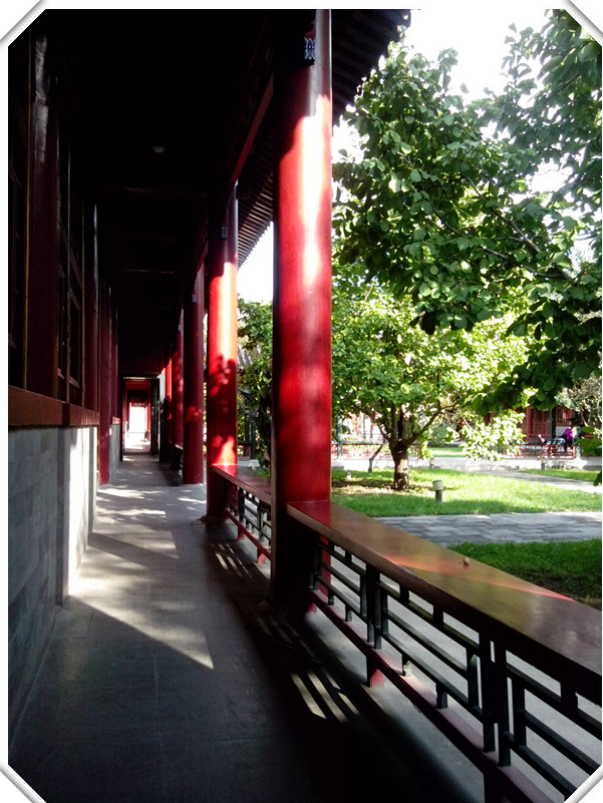
李智鑫-花落知多少



李智鑫-门中春色



张宇涵-竹影



张宇涵-时光



张宇涵-琐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李强教授讲座：

传统中国何以未能产生现代资本主义

韦伯的制度主义解释

讲座简介：2014年5月8日晚7:00，CCERCLUB朗润“对话”跨学科系列讲座第一场在北京大学一教101室成功举行。本次讲座的主题为“传统中国何以未能产生现代资本主义：韦伯的制度主义解释”，由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李强教授担任主讲。

首先，李强教授指出，传统中国不能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的儒教缺乏资本主义精神。传统中国强烈的文化主义导致儒家伦理与新教伦理乃至资本主义精神相冲突。随后，李强教授从韦伯的主要著作、韦伯论现代资本主义及其起源、传统中国政治法律制度与资本主义、传统中国文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反思韦伯等五个方面，详细解读了韦伯的思想及其对理解传统中国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启示。

就韦伯的主要著作而言，李强教授指出，韦伯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研究涵盖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多个领域，对于理解20世纪初期历史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他向国发院的同学们强调，如果没有读过韦伯的著作，就难以在经济学等领域有深厚的造诣。李强教授将韦伯的主要著作分为经济史和法律史著作（包括《中世纪贸易公司的历史》、《罗马农业制度的历史对罗马公法与私法的重要性》、《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原因》、《古典西方农业社会状况》、《世界经济通史》等）、比较宗教社会学著作（包括《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印度宗教》等）、集大成的著作《经济与社会》，以及方法论著作。韦伯认为，社会现象本无因果联系，但人们可构筑观念的因果联系，以助于理解现实。

在第二部分里，李强教授着重阐述韦伯制度主义对欧洲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的原因、现代资本主义的条件等问题的理解。他认为，韦伯的上述问题剖析皆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论的回应。不同于以纵向思路进行历史比较的历史唯物论，韦伯另辟蹊径，对问题进行横向分析、对比不同文明的发展，形成历史唯心论。根据韦伯的观点，经济发展不是问题的因，而是问题的果，其依赖于独特的政治法律制度；进一步言之，现代社会能否发展出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取决于一国的宗教文化。欧洲国家之所以能产生现代资本主义，便是由于其新教文化促使社会形成一套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法律制度。在阐述何为现代资本主义的问题时，李强教授对比具有个别性、局部性的传统资本主义与现代资本主义，提出韦伯的观点：现代资本主义依

赖于利用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为，即依赖于在形式上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相比，传统资本主义追求非交换获取的利润，而是依靠暴力、掠夺、权力等非交换手段获利）。在此基础上，李强教授深入探讨现代资本主义产生的条件。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存在需要六大先决条件：（1）企业家占有生产手段；（2）市场的自由；（3）理性的技术；（4）可预测的法律；（5）自由劳动力；（6）经济生活的商业化。其中，李强教授着重阐述第四点——可预测的法律，他表示，理性的法律与理性的科层制国家是现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土壤，按照韦伯的说法，“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组织，如要合理运用，就必须能依靠可预测的判断和管理。希腊城邦时代或者亚洲的宗法制国家，这个条件都不具备。资本主义需要的是可以像机器一样靠得住的法律。”李强教授进一步指出，资本主义的本质是等价交换，在人人趋利的情况下，须靠法律强迫人们等价交换；如果说投资基于可预期回报而得以进行，那么可靠的法律是不可或缺的。

在第三部分中，李强教授主要讲述了传统中国政治法律制度与资本主义，结合韦伯的制度主义探讨中国本土问题。李强教授首先分析了三大支配类型（理性的及法律的支配、传统式支配与卡利斯玛氏支配）的特征，由此强调：韦伯主张欧洲封建制度属于典型的封建制度，而封建阶层之间的权利义务恰恰是通过契约形成的。相反，传统中国社会是典型的家产制代表，其以权力专断性、随意性为根本特征，是最极端的分权制度。基于此，该制度下的**商业投资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财富的积累唯有依靠权力进行掠夺。接下来，在探讨多元社会结构问题时，李强教授对比欧洲与传统中国的城市结构及特征，指出：欧洲的资本主义是从城市发展起来的，城市通过特许状获得自己制定法律的权利，后来不满足封建地主占据生产资料的格局，从而进行资本主义革命；相反，传统中国是一种“大一统”的结构，城市不是一个经济中心，而是政治中心，所以中国的城市不会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然而，李强教授也指出韦伯更进一步的观点：尽管传统中国不能产生自由资本主义（因为不是一个多元社会），但它可能产生国家资本主义（如王安石变法）。

在第四部分“传统中国文化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中，李强教授将焦点移至文化，讲述韦伯对宗教文化与现代资本主义的认识：新教是众多宗教中最具有理性化潜能的宗教，它将超验价值与现实世界对立起来，进而以超验价值改造现实世界。而中国儒家伦理恰恰缺乏超验价值与现实世界的对立，其后果便是得以适应世界，但却无法改造世界。

在演讲的最后，李强教授对韦伯的制度主义进行反思，在肯定韦伯理论的贡献的基础上，他认为：韦伯的不足之处在于，他并未对中国社会巨大的自我治愈潜能形成充分的认识。在李强教授的启发下，同学们对传统中国及资本主义的发展条件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

接下来，在主持人精彩、简略地点评之后，讲座进入问答阶段。李强教授就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的巨大潜力、儒家宪政研究、资本主义的出路、日韩资本主义借鉴等问题一一进行了解答。

专访陈平原教授： 学术史视野中的王瑶先生

引言：

王先生对具体的文辞不是很感兴趣，诗文及审美不是他所擅长的。他偏于历史，所以他讲人心、世道、思想、潮流等时，更为本色当行。

王先生去世的时候，老钱说了一句话，让我很震撼，那就是：大树倒了。生活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大树的存在，使得年轻学者可以遮风挡雨。

张丽华（简称张，下同）：我们先从王先生的著作开始谈吧。您在回忆文章里提到，在见到王瑶先生之前，很早就读过《中古文学史论》，当时对这部著作的感受如何？对作者有什么样的想象？

陈平原（简称陈，下同）：我的阅读有很大的偶然性。我的父亲是中专的语文老师，家里有王先生很多种书，所以，早在“文革”期间，他的书我就看过好几种。这本书，我最初翻看的是删节本的《中古文学史论集》，但是，虽然读过，其实根本读不懂。《中古文学史论》的写作风格，对于非专业的读者来说是有障碍的，它明显是一本面对专家的著作，因大量密集地排布资料，最后才是一个结论。初学者能读懂的，只是一个基本思路。我在读大学之前，根本没有这个知识准备，当时能读懂的，只是一般的文学史。即便后来我到了中山大学念本科、硕士，在进入北大读博之前，其实都不能说读懂了这本书。

我来北大前夕，恰好王先生应邀要去日本演讲，那时我刚通过入学考试，他说我给你布置一个作业，做一个这几十年来中古文学研究状态的综述。趁这个机会，我又重新读了一遍，那时才比较有感觉。在我看来，王先生《中古文学史论》在40年代达到很高的水平，50年代以后，中古文学并不是研究热点，不说停滞不前，但起码缺少突破性的发展。我就此做了一个综述，交给先生，先生表示满意。

【师承】

张：如果放在中古文学研究的脉络里，王先生这本书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陈：中古文学研究，要说大的阶梯，最早有刘师培1917年的北大讲义《中国中古文学史》，接着是1927年鲁迅在广州撰写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再接下来就是王先生的这本书了。其间还有一些单篇文章很精彩，如宗白华的《论〈世说新语〉和晋人之美》，陈寅恪的《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等。王先生其实是在那时候读书人普遍关注晋人之美、关

注魏晋风度、关注中古文学生活的精神氛围中，从事自己的研究的。王先生的同学范宁在回忆文章里就说，西南联大时期，中文系的研究生几乎全做中古研究，范宁自己做魏晋小说，季镇淮做“观人论”，王先生做文学思想。这个问题，我后来曾分析过：对于抗战中撤退到大后方的读书人来说，中古的魅力某种程度在于南渡的心境。

张：在王瑶先生的学术师承里，我们一直强调王先生对鲁迅的继承。这方面有没有被后来的叙述夸大的可能呢？

陈：早年王瑶先生在清华编辑《清华周刊》的时候，是一个左翼文人的身份，他那时就写过几篇关于鲁迅的文章。“文革”结束后，他再三强调与鲁迅精神上的以及学术上的联系，是有一个大的背景的，那就是整个社会对鲁迅的崇敬。就左翼立场以及对知人论世的“世”的感觉而言，他和鲁迅确实是相通的，《文人与酒》、《文人与药》这两章，一看就是从鲁迅那篇文章发展而来的。学术上，王先生肯定受到了自己的导师朱自清先生的影响。但他和朱自清确实不一样，王先生对具体的文辞不是很感兴趣，诗文及审美不是他所擅长的。他偏于历史，所以他讲人心、世道、思想、潮流等时，更为本色当行。

有一个问题，我之前也提到，但没有深入讨论，那就是怎么看待他与陈寅恪的关系。王先生《中古文学史论》背后的思路明显是偏史的，其中最精彩的是对那个时候的士人生活及精神状态，还有思想潮流与文学表达的论述，这个论述背后有陈寅恪的影子在。

张：20世纪50年代之后，王瑶先生开始转向现代文学研究。王先生转向的契机，以及您认为王瑶先生能够成功转向的基础是什么？

陈：王先生自己有过论述，是学校要他开现代文学的课，他才转向的。做检讨的时候他再三说，当初觉得研究现代文学不能“成名成家”，还是希望能从事古代文学研究。在我看来，这个表述是有缺陷的。我在谈王先生的学术史意识时说过，解放后，他如果继续做中古文学研究，也就这个样子了。其实，他的转型有外在的压力，也有内在的兴趣。这个兴趣基于几点：第一，他曾经是个左翼文人。第二，他对鲁迅非常崇拜。现代文学这个学科，尤其是50年代以后，鲁迅神话支撑起整个学科的半边天。第三，他受朱自清先生的影响。在1929年到1933年间，朱自清在清华大学讲过“中国新文学研究”这门课，并留下了系统的讲义，王先生手头有这份讲义。后来，1978年钱理群这一届研究生进来，他把讲义交给赵园去整理，发表在上海的《文艺论丛》上，王先生还因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对王先生来说，之所以转向现代文学，有外在的压力与诱惑，加上“诱惑”两个字，可能更合适些。对一个敏感的学者来说，这的确是一种新的可能性，他必须思考：整个社会转型以后，如何安身立命？其次，还有内在的知识准备和学术史意识，导致他非常容易转过来。假如真有抵触情绪，他不会那么快地完成《中国新文学史稿》。他在1949年开课，1951年出《史稿》的上册，下册是1952年6月22日完稿，1953年出版。三年之内，完成一个学科的奠基性著述，这种工作热情，很能说明问题。王先生晚年谈到对清华的怀念与迷恋，再三强调，“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两部主要著作《中古文学史论》和《中国

新文学史稿》，都是在清华完成的；他最好的学者生涯，是在清华。

【著书】

张：说到这两本书，我对其中述学文体的变化特别有感触。从《中古文学史论》到《中国新文学史稿》，文体截然不同。短短几年，述学文体就发生这么大的变化，这里面是否有当时“毛文体”的影响？

陈：其实，对于人文学者来说，对话的对象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你的风格及水平。王先生写《中古文学史论》的时候，他所面对的历史资料以及研究成果，从中古到现在，非常丰厚，并且他对话的对象是中古文人，所以其论述风格简要、质朴、古奥。而新文学是另外一种对象，需要另一种论述方式。

至于“毛文体”，虽然1949年后左翼文化成为主导，但王先生和那种解放区过来的文人学者不一样，不能说他深受“毛文体”的影响；他受到的是30年代左翼文化的影响。左翼文人的白话文，基本上是一种翻译体，夹杂不少刚译介过来的马列文论的术语，还有苏联文艺理论的影响。王先生《史稿》的论述风格，是从这里来的。毛泽东的文体相对干净、简单、有力，虽然后来被大家所重复模仿而成为陈词。

还有一个因素，今天我们可能不太能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关键的学校不是北大、清华，而是1948年8月成立的华北大学，此大学1950年10月改名为中国人民大学，那是从延安的陕北公学发展而来的，根正苗红，更为新政权所信赖。清华教师王瑶写《史稿》这本书的时候，某种意义上也是在转换立场，是在学习一种新的语言、文化、政治表述。后来王先生检讨说，他当时觉得理论上没把握的，就引用权威的话，从周扬到冯雪峰到胡风等等，可没想到这些人后来一个个倒下去了。

张：这本《史稿》后来的命运如何？

陈：《史稿》上卷第二版的《修订小记》很有意思。我后来看王先生的检讨书才知道，上卷出来后，《文艺报》开了一个会，批评很严厉。其中有一个观点，说这不是枝节问题，而是整个立场的问题。王先生接过来讲：我的立场不行，理论没学好，要思想改造多少年后才能写一本新的，但是我把资料搜集好了，且按照我的思考排列下来，“它在目前阶段发生一点‘填空白’的作用”。这表面上是一个非常谦虚的自我批评，但王先生说“我起码留下了资料”，这句话很重要。当初人家批评他，说很多东西不是你的，这边抄过来，那边抄过去，引一个马克思，又引一个高尔基，还有鲁迅，引了一大堆别人的话，这算什么学问。但是在王瑶先生心目中，生活在大转折时代，不能保证路线是正确的，但起码资料留得下去。这是古典文学研究的思路。日后王先生还说了一句话：唐人选唐诗，即便后来的人觉得有错误，但它留下了一个历史的印记，让我们知道那代人是怎么思考的。

50年代在他之后出版的各种新文学史稿，如丁易的、刘绶松的、张毕来的，在打倒“四

人帮”以后，基本上都不能看了，但王先生的书还值得参考，这是他聪明的地方。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尚在形成中，我们不能判断它的未来走向，也没有强大到自己独树一帜的地步，那就采用这个办法，保留了基本的学养和资料，让后来人在这个地方往下走。当初纯粹做现代文学的，大都相信某一种理论、旗帜或立场特别正确，拿过来就用，冲锋陷阵，大胆砍杀，留下很多遗憾；而王先生表面上“东拼西凑”的那个“史稿”，反而留了下来。这跟他在西南联大受过比较好的学术训练有关，即使转移学术阵地，他的史识及学养，使得其论述相当谨慎，褒贬之间，很有节制，故多年后还能读。

《史稿》从1954年起就不能再印了，而且被当作反面典型；每有政治运动来，王先生必检讨《史稿》的写作。直到1979年，这书的名誉得到恢复，王先生才开始请人协助修订，重新出版。

张：后来您和钱理群老师、黄子平老师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的课题，是否有和《史稿》进行对话的意思？

陈：当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权威，最主要的三位学者是王瑶、李何林、唐弢。唐弢虽然也主编现代文学史，但他主要做鲁迅研究以及新文学的史料整理，李何林是做左翼文学运动及鲁迅研究，对整个中国现代文学有史的整体性的思考的，是王瑶先生。我们出来挑战，肯定会影响到王先生的权威性。

“三人谈”刚出来的时候，在学界引起很大的反响。王先生第一担心我们骄傲，第二那时乍暖还寒，怕有人会打压，所以他自己先站出来批评我们。他说你们的论述有世界主义的倾向，中国现代文学在民族文化中的根基这方面论述不够。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出于意识形态考量，经常批判“全盘西化”。王先生特别担心我们被卷入，因为当时的文学潮流及学术倾向，往往和政治风潮纠合在一起。很多人认为是代际的差别导致王先生对我们提出批评，按照老钱的说法，王先生是“老奸巨猾”的，他知道自己先站出来说，别人就不好意思多说了。

【学养】

张：关于文学史研究，王瑶先生有一个很有名的判断：文学史既是文艺科学又是历史科学。刚才您也提到，王先生自己的研究偏于历史。樊骏先生在《论文学史家王瑶》一文最后部分谈到，王先生晚年对这种偏向有一个反思：把一切的价值放置在历史流里去判断，是不是也会有所遮蔽？其实北大的现代文学研究，也在很大程度上传承了王瑶先生这种偏于历史研究的趣味与传统。对于这种偏向的得与失，您怎么看呢？

陈：我进入北大念书时，中文系文学专业还有四位老先生健在：林庚、吴组缃、王瑶、季镇淮。其中，王瑶和季镇淮先生偏史，林庚和吴组缃先生则偏文。孙玉石老师曾回忆说，王先生和吴先生一起开会的时候会互相吹捧：一个是史学修养，一个是文学趣味。理论上这二者应该兼得。北大中文系的好处是，这两种路向都各有信徒，各有受众，都能被接受，都能被欣赏。

五四“文学革命”之后不久，新文化人就开始整理国故了。这一思潮的整体思路就是使“文学研究”成为学问，要想使它成为学问，一定会往考据、历史这方面走，因为从审美角度来说，往往很难形成定论。清代的戴震说过：大国手门下不出大国手，二国手三国手门下反而可能出大国手。为什么呢？大国手的气场、学养、威望，不知不觉会给学生造成巨大的压力，很容易使下面的人不能反思，更不敢反叛；可要是都照着老师的路子走，学问必定越做越小。聪明的导师不会管得太死，会释放一些空间给有才华的学生，让他们自由发展。王先生指导学生是因势利导，有的管得很紧，有的则基本不管。

作为学者，王先生是有比较大的眼光和胸襟的；但从他的整个著作来看，比起同时期北大学者林庚、吴组缃来，王先生缺乏艺术的敏感，所以他往史的方面走。这里有大学制度问题，有北大清华的学风差异，也有个人性情的因素。

张：您在《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一书的“小引”中，充满感情地回忆了王瑶先生晚年开启这个学术史研究课题的情形。您最近也在写关于80年代王瑶先生的文章。可否就此谈一谈王先生这个课题背后的一些思考？

陈：关于这个课题，王先生最初想追问的是，我们20世纪中国的人文学者为什么一代不如一代？梁启超、王国维开启的学问格局是很大的，可为什么后来越做越小？王先生研究古代文学，他知道看一个时代的学术成就，不是小时段，应该是中长时段，像清代三百年是个什么状态。有的时代天才成批出现，有的时代则一个都没有；若生活在后一种时代，所谓了不起的“大家”，其实也没什么了不起。最初的设想很简单，那就是王国维、梁启超那代人是在传统的学术氛围里熏陶出来的，同时又满腔热情地拥抱了西学；而上世纪30年代之后，我们逐渐专业化了，不仅中外文学截然分开，文史哲也都楚河汉界了，这些因素导致我们的学问格局越来越小。一开始注意的是方法与学养，可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问题远比这复杂。

最近这篇论文，我讲80年代的王瑶，将他的学术史研究和“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对照起来看。那时清华想重建中文系，向王先生请教，王先生强调清华中文系是“复办”而不是“新建”。讲“复办”，那是因为我们有很精彩的传统。所以，他开始思考并论述“清华学派”，在这个过程中，强调自己的清华出身，有策略性的考虑。还有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作为学者王瑶的黄金时代，是清华十年，那是他最辉煌的时段。到了北大，前面二十多年老挨整，真正过舒心日子是到了七十年代末才开始。在学术上，王先生是有遗憾的。他老跟人说，你一定要把大的东西在六十岁之前做出来，不然的话，后面你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文革”结束后，你别看他很风光，其实心里颇为悲凉。不管是书信还是谈话，他再三表达这样的意思：要写的话是“垂死挣扎”，不写的话则“坐以待毙”，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垂死挣扎，那我就再写一点吧。可我算了一下，1978年，王先生才六十五岁，就说力不从心；今天老钱都七十五了，还活蹦乱跳，做很多事情。主要不是身体状态，而是心境的问题。经历过长期的思想改造与洗脑，那代人其实是很悲苦的。80年代的王瑶，在北大、在学术界都是备受推崇的，别人给他戴了很多高帽，说他多么了不起。只有若干熟人或近在身边的学生，才能深切体会到他的遗憾。他40

年代写《中古文学史论》时跟季镇淮说过：“我相信我的文章是不朽的。”他那时是多么硬朗、乐观、自信，晚年的王瑶，我相信他知道自己没能完成年轻时的自我期待。

【风范】

张：《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初编）中没有刘师培，是否有“影响的焦虑”？

陈：不是这样。当初王先生的思路是凸显 20 世纪中国学者的自觉选择，即兼及中西。因此，不收传统的文史学者。那时他觉得章太炎和刘师培是传统学者，日后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发现，章、刘本身也深受西方学术的影响。当初“二十家”的设计就是这样的，有缺陷，但并非“影响的焦虑”。这二十家中，选择王元化争议很大，很多人认为王元化不是古典文学研究专家，他只有一本《文心雕龙创作论》（日后更名《文心雕龙讲疏》）；但王先生坚持这么做，其基本立场是：王元化用西方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立场来解读《文心雕龙》，为这个古老的学科带入了新的视野，因此他代表了一个方向，一种新的可能性，那就是既要有国学根基，又有西学修养，还得有足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才是一个好的学者。王先生甚至说，让王元化殿后，这样做很好，这书因而有了一种方向感。王元化先生也很认真，这篇文章前后换了四个作者，有的写不出来，有的写出来了但不理想，王元化先生说来处理。

张：王瑶先生被朋友们断言，“除了是学者……还是一位不搞政治的政治家。”您怎么看王瑶先生的“政治”情怀，以及这种“政治”情怀对他学术研究产生的影响？

陈：王先生研究中古文学，深受《世说新语》影响，有魏晋文人的风范。他特别喜欢跟友人及学生聊天，经常语惊四座。大家一鼓掌，他就更得意了，因而有很多精彩语录留下来了。比如“上课是马克思，下课是牛克斯，回到家里是法西斯”，此类流传广泛的隽语，还有好多。后来挨批判，他自己反省，说好逞小聪明。本来是逗趣、好玩，但一上纲上线就很麻烦了。可这是《世说新语》中人的趣味。与此相关的是政治及学术上的敏感。他能从《人民日报》的字里行间读出很多言外之意，然后迅速推进，并作出自己的判断。可这些东西，猜对了又怎么样？好友朱德熙先生说他做学问带有点游戏的意味，还说他对政治过于热衷，如果不是这样，学问会做得更大。后来的人为了维护王先生的形象，再三辩驳，说他这是有意为之，且无碍学问。但我是认同朱先生的看法的。

张：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王瑶先生才会花很大精力去做现代文学学科的一些组织工作，比如学会和《丛刊》？

陈：不能说他在学会或丛刊上花了很多精力，故影响个人著述。他的好处是识人，且能用人。比如，学会的事，大都是樊骏在管，他很放心。80 年代以后，王先生意识到自己学问的界限，开始将精力转移到扶植年轻人。当然不只王先生，当时一大批老学者都是这样的。你看王先生的《润华集》，三分之二是序，给弟子辈的乐黛云、孙玉石、蒙树宏、吴小美、黄曼君、黄侯兴、钱理群、吴福辉、温儒敏等等写序，目的是扶持，让后辈尽快成长起来。王先生去世

的时候，老钱说了一句话，让我很震撼，那就是：大树倒了。生活在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大树的存在，使得年轻学者可以遮风挡雨。大树倒了，下面一代学人就必须直接面对各种困难，这困难有政治上的，有学术上的，也有人事上的。当然，也会促使他们尽早成熟。

采访人：张丽华
(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

时间：2014年4月24日下午

地点：北京大学人文学苑1号楼

聂锦芳教授讲座：

通往《资本论》之路

重新思考马克思学说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

讲座简介：2014年5月17日晚7:00，CCERCLUB“朗润对话”系列讲座第三场在北京大学二教107成功举行。讲座主题为“通往《资本论》之路：重新思考马克思学说与古典经济学的关系”，由哲学系教授聂锦芳担任主讲。聂锦芳老师的研究领域为马克思文献学和马克思与西方思想传统，因此，他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为现场同学带来了哲学层面的《资本论》反思。

首先，聂老师提出了认识社会的三条标准：真实性、总体性和本质性；我们必须在对社会现象进行客观真实描述的基础之上，结合总体性结构把握社会现象并深入分析其本质，从而为社会实践提供指导性力量。伴随15世纪以来世界历史的形成与发展，资本逐渐成为塑造世界的最重要力量。马克思的思想贡献和伟大之处不在于对经济现象的一般性描述，而是对经济现象的深入批判和对社会历史发展逻辑的建构。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现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呈现一定的张力：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思想逐渐成为主导意识形态的国家哲学，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思想不断退出普通民众的生活，由此，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当代性如何体现？事实上，聂老师认为，马克思主义思想并非简单对现象的描绘、对常识的判断，因此，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不需要得到当代性重释，其本质特征决定其理论生命力正在于其对当代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

本次讲座的主要内容围绕如下四个方面展开：其一，走向古典经济学之前马克思的思想状况；其二，古典经济学在何种意义上启发马克思走向经济学研究之路；其三，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超越了古典经济学；其四，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当代意义。

一、马克思早期思想背景及其发展

马克思早期思想带有浓烈的德国古典哲学色彩，提倡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深入讨论自由和自我意识等问题。此时的马克思是一位观念论者，强调人作为认识论主体的重要地位，在价值论层面肯定唯心主义的真理。然而，莱茵报时期，伴随着对社会现象认识的不断深入，马克思逐渐发现了自由理性的矛盾性所在——对自由的渴望和现实中自由的极度缺乏形成了巨大的张力，催生了马克思关乎现实的苦恼疑问。

国家是自由理性的集成和代表，那么在国家层面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国家以立法为核心，由此马克思开启了法哲学研究；然而，马克思进一步发现，国家和法背后的支配力量是市民社会，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普通人的经济生活和经济关系。马克思由此展开了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分析。

二、古典经济学的基本议题和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路径

古典经济学为马克思提供了进入社会的基本议题。古典经济学注重讨论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形式，却忽略了其内在联系。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基于资本的本质特征，马克思进一步论证了二者的统一性，服务于社会的总体结构。资本的无限创生能力深刻影响了社会历史发展进程。

更进一步，马克思关注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工人的生存状况，揭示了劳动中人与劳动产品、与劳动、与人的类本质、与人的异化关系，形成了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认为，从国民经济的议题和现象出发，国民经济学无法完成对议题和现象的合理解释；异化背后的根源是私有财产的占有制度。

另者，在穆勒评注中，马克思在李嘉图生产、分配、消费的论证上补充了交换环节，进一步论证了经济生活中人的关系的异化。货币作为一种异己的交换中介，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经济关系。信贷业的兴起进一步激发了资本的创生力量，加深了人和人关系的异化。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由此上升到价值关怀层面，对私有制的批判和扬弃使之走向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将人的活动和过程还给人。

三、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

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超越主要表现在哲学反思层面和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变革。马克思从政治经济学走向对社会现象的思考的根本思想力量在于其哲学思维的变革，改变了德国古典哲学从天国降临人间的思维方式，由抽象的形而上学转向现实生活。

《共产党宣言》指出资本的两重性，强调了资本之于文明塑造的重要意义。1856年资本主义世界全球性危机促使马克思将经济学问题的思考重点由交换领域回归到资本生产领域，在《1857—185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将商品作为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深入分析了商品背后的生产关系，揭示了商品的二重性，创造了剩余价值理论，这些思想在《资本论》中得到进一步深化。

《资本论》不仅揭示了资本社会现象的完整逻辑，而且提出了社会认识理论的四方法：普照光、从后思索、抽象具体和人体解剖。马克思基于时代的同构性形成了完整的现代社会认

识结构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理论和实践具有深刻的并列关系，之于社会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事实上，《资本论》的讨论范畴的最终主旨并非社会经济的繁荣，而是处理现实人的处境及其发展的问题。因此，《资本论》的所有范畴必须从人的角度考虑。对古典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双重超越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根本性力量所在。

四、马克思和古典经济学的当代性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批判性力量之于当代社会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将对资本的批判推向顶峰，而资本的弊端在当今社会并未得到完全消解。聂老师认为，中国和苏联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忽略了两点：其一，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历史性前提是资本塑造文明的过程，因此马克思未能很好解释东方和古代社会的基本问题；其二，在自由和人道的观念极其缺乏的威权结构社会进行激进的社会主义实践，违背了马克思的价值前提，因此，苏联的解体和改革开放不是马克思的失败，而是由于这种实践没有真正理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递进关系。

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的弊端并未改变，应正确估量资本的价值和作用。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并非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而是解决世界资本的出路问题。金融危机的爆发是资本运动的必然，因而无法通过金融体系内部修正或者国家宏观调控得以彻底解决，而是需要通过历史的回归，寻回马克思的智慧，重新思考资本的创生力量。

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嫁接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一方面，前资本主义的问题同样在当代中国涌现，当代中国的发展必须在吸纳资本塑造文明的积极作用的同时避免资本的弊端；另一方面，基于特殊的中国国情，我们同时寄希望于中国文化和哲学的再造，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进步提供更为深刻的答案。

闵维方教授讲座：

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北京大学的改革

讲座简介：2014年5月18日晚7点，双学位学生社团 CCERCLUB 组织的“朗润对话”系列讲座第四场在北京大学二教 203 教室成功举行。本场讲座的主讲嘉宾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闵维方教授。闵维方教授曾先后担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党委书记等领导职务，是北京大学改革的见证者和领导者。他演讲的主题是“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北京大学的改革：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闵维方教授首先指出，中国的经济转型是北大改革的大背景。计划经济体制下，高等教育是计划经济的一个构成要素，高校在高等教育的各个环节中缺乏自主权。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教育体制改革长期落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计划经济时代遗留的教育条块分割和部门分割的格局长期存在，专业设置过细过窄，高校毕业生与用人单位出现了严重的专业不匹配现象，浪费了宝贵的人才资源，北大的改革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进行的。随后，闵维方教授从五个方面回顾了北大的改革。

一是教学改革，这是高等教育改革的核心。北大率先提出了“拓宽基础、淡化专业、因材施教、分流培养”的指导思想，倡导大学教育从以传授知识为主向以培养整体素质为主转变，向更加综合化和通识化的方向发展，更加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

二是人事改革，以教师队伍建设为重点。北大着力改变学术上的近亲繁殖格局，使教师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具备更好的互补性。同时，北大实行了教师聘任制改革，择优扶重，奖勤罚懒，鼓励竞争，打破了铁饭碗，提高了教师队伍水平。

三是财务改革，规范财务行为，严格财务管理，优化资源配置，增强办学实力，提高办学效益。财务改革为学校的发展奠定必要的物质基础，图书馆、百年讲堂等标志性建筑都是依靠捐款建设的，这与财务改革的成功是分不开的。

四是体制改革，其指导思想是精简党政机构，提高学校运行效率。闵维方教授坦言，体制改革是最困难的，北大的体制改革有些做的很坚决，有些则需要适当的妥协以求循序渐进，有些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

五是改革目标，就是要把北大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其内涵包括一流的学术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校园氛围和社会服务等五个方面。北大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距离世界一流大学仍有相当长的距离。未来需要进一步加大改革力度深化改革，以改革为动力推进我们一流大学的建设。

在演讲的最后，闵维方教授回答了现场同学的提问。

撰稿人：种鹏、唐杰

陈平原教授讲座： 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

讲座简介:2014年5月24日,由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双学位项目 CCERCLUB 主办的系列讲座“朗润对话”之“大学故事的魅力与局限性”顺利举行。本场由中文系陈平原教授担纲主讲,整个教室座无虚席。由于在座的同学来自不同的专业,陈平原教授将原来的题目细化,讲述具体的大学故事,即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陈教授用真实的资料和数据为大家讲述了抗战烽火中的中国大学,让大家了解了在那段最艰苦时期中国大学弦歌不辍。

陈平原教授首先给大家展示了两幅照片。第一幅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轰炸伦敦,伦敦被炸以后的第二天,在西伦敦的图书馆里面照常有人进来看书,断壁残垣,但书籍依然温暖着他们。第二幅照片,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五位教授在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一起照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他们,刚毅志气全都写在脸上,可谓顶天立地。陈教授说恐怕今天再也照不出这样的照片。陈教授说,台湾作家齐邦媛在作品《巨流河》中描述到,在四川乐山的武汉大学,战事紧迫,随时可能撤离,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校长说不到最后一天弦歌不辍,第二天朱光潜先生继续讲他的诗篇。战争不会影响我们的阅读思考,以及对文学、对美的向往。

抗日战争中国取得了最终的胜利,经历了无数大大小小的战役,中国人可以说是惨胜。战争之后国民政府做统计,政府军总共伤亡 3227926 人,病亡 42 万,总计损失 365 万,中共军队死了 58 万,平民死伤 900 万,整个战争军民死亡大概 3480 万。然而,战争没有摧毁中国大学,战争期间整个中国的大学大部分保留了下来,而且大部分撤到西南和西北。当时大学包含国立、省立、私立以及教会大学 108 所,战争胜利的时候中国学校增加了将近 50 所,学生增加了一倍。

陈教授用战争刚开始时三个文人的日记来讲述那个特定年代文人特殊的心理路程,它们分别是清华大学教授吴宓的《吴宓日记》,丰子恺先生的《黔贵流亡日记》和北京大学浦江清的《西行日记》。

战火纷飞,中国教育文化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已经被占领了,读书人怎么办?中国大学怎么办?只能往大后方走,往西南、西北走。1941 年共产党《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讲抗战以后专科以上学校集中的地方为四川成都一带,重庆、云南昆明一带,贵州地区,西北地区,湘西地区及两广地区。

迁移并不简单,战争中的迁移是一个奇迹,绝大部分大学事先并不知道要迁移,也不知道日后还能不能回来。为了让大家更直观了解战争中大学的迁徙,陈教授用民国年间地图标注出十所大学的西迁路线图,每所大学背后都有属于自己的西迁故事。这十所大学是西南联合大学、

中央大学、浙江大学、中山大学、武汉大学、同济大学、河南大学、厦门大学、西北联合大学和上海交大。十所大学西迁，共同特点是事先没准备，一路走一路看，好的转一次、差的转五六次，但都是一边走一边读书，弦歌不辍，战争中不是惊慌失措，而是继续成建制，撤退读书。

为了说明当年的读书状态，陈教授引用了几篇当年的文章。第一篇是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写的《战火中长大的大学》，校长说敌人能炸毁的是我们的物质，炸不毁的是我们的意志；炸得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结果，炸不毁的是我们建设的经验。第二篇是西南联合大学冯友兰写的西南联大的碑文，八年辛苦三校合作，没有闹分裂，而是倡导学术自由。第三篇是中山大学许崇清写的《告别澄江民众书》，感谢当地民众对学校的支持，同时学校也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当地的文化。第四篇是浙江大学的校长竺可桢给贵州民众立的一块碑的碑记，感谢贵州民众的帮助。这些文章能让大家了解战争中中国读书人的精神状态。

陈教授指出，中国大学西迁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大学的存在不仅仅是教育，也是精神，也是志气。战争中弦歌不辍的大后方，代表了国民政府的信心，代表了民众的期待和意志。整个战争期间，我们中国的大学相信这仗是能打赢的。而这个信念是支撑起八年抗战重要的力量，弦歌不辍某种意义上是中华民族不屈的信念的表现。

陈教授认为战时中国大学西迁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第一，组织上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搬迁。第二，精神上不是逃难，而是一路上读书，一路上弦歌不辍。第三，教学上不是应急，而是长远打算，战时如平时，打仗不靠学生，建国要靠学生，大学教学质量不能下降，教学规模以及各种各样的方法不能改。第四，学术上不是仓促行文，而是出有思想的学问，出大学者，人文研究方面尤其明显，沉潜把玩，酝酿出大结果。

陈平原教授又从教育史角度分析了战时大学的特点。第一，是在迁徙过程中人生忧患与书本知识合一，因为抗日战争中国大学撤退到大西南、大西北，使得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文化教育中心放在那个地方。第二，是生活圈子缩小，教授与学生合一。冯友兰说战争中间第一次和学生走得这么近，跟学生没有距离地接触。此前此后教授是教授、学生是学生，只有这几年中间教授学生在一起。第三，是枪口一致对外，不同政治派别协调，没有那么多的政治斗争。第四，是理想型与幸福感，正如何兆武先生在《上学记》中的回忆一般，青春年华、少年义气，是一辈子最幸福的日子。

陈教授指出，中国大学如此大规模内迁，坚持到最后的胜利，这是一个奇迹。二战中其他国家的大学，也都面临各种危机，前苏联大学迁移与中国有相似性，但更多是不同，中国大学迁移时间更久、更艰辛。

从政治史和文化史看大学西迁，王力先生有一句诗，“应教青史有专篇”，这不仅适合西南联大，而且适合全国高校。今天中国大学都在奔着世界一流。然而，尽管我们有了大楼、我们有了目标，我们有了机会，但是我们的精神还没有跟上这段历史。陈教授希望大家记住当年走过的路程，能有当年那种气宇轩昂的精神状态。正如著名数学家、前复旦大学校长苏步青说的那样，希望有一天浙江大学有一个教授像李约瑟一样跑到剑桥大学去参观，然后说剑桥大学很

好，不愧为西方的浙大。

讲座最后，陈教授留下几个问题让大家思考。第一，如何看待西迁大学与当地民众的关系；第二，如何叙述两地办学；第三，如何谈论伪大学，如伪中央大学、伪北京大学。第四，如何看待已建及将建的纪念馆，因为它不只是本地的旅游资源，更是大学寻根、珍惜那段历史以及上一代人感情的依托。

随心播种 静待花开

专访雷晓燕老师

嘉宾简介:雷晓燕，女，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博士，现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教授，教授中级微观经济学（双学位课程）、实证策略（研究生课程）、劳动经济学（研究生课程）等课程。研究兴趣：劳动经济学，健康经济学，应用计量学。

一、朗润园 廿载情

记者:从您 07 年初到朗润以来，您觉得国发院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嘉宾:我觉得比较显著的变化有两个。

第一个变化就是从经济中心变成国发院，而后国发院又逐渐的发展。一开始的时候就只有经济这一个专业，但从 08 年变成国发院后就有意识地进行跨学科的设置，相继建了几个其他的中心，比如我们的健康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中心，法律经济研究中心等，比原来更加丰富了。

第二个比较大的变化就是当时我来的时候年轻教师还比较少，老一辈的教师比例是比较大的，它的好处就是年轻的老师有很多学习机会，能从前辈当中学到很多东西，但当时大家也担心这个结构不利于长远的发展。所以近几年国发院就引进了很多中青年教师，包括黄益平老师、张晓波老师、刘国恩老师以及其好几个年轻的老师，现在看起来就是教师年龄结构更加合理，更利于长远发展。

记者:您当初博士毕业后选择加盟国发院，国发院吸引您的地方是什么呢？

嘉宾:当时经济中心给我 offer 的时候，我也是在考虑这个问题。当时有一个老师，他原来在美国教书，干得很不错，但后来就回国教书了。在我考虑的时候，他跟我说，他觉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得非常快，回来就会有一种参与的感觉，参与到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当中去，不一定做出多大的贡献，但是那种参与其中的感觉让他觉得非常有意义。当时他说的这些话就挺吸引我的。当然我也考虑到经济研究中心一方面和国外的研究环境差不多的，因为全部都是海归，另一方面又专注于中国方面的研究方面，那种参与其中的感觉在这里应该会找到，这两方面的结合非常吸引我。

记者:国发院的研究环境和教学环境还符合您初来时的预期吗？

嘉宾:非常符合。在回来之前我就觉得自己是在中国农村长大，对中国的问题应该了解的

差不多了，但是当我真正到这个地方来做研究，并且周围都是同样的做中国研究的人，加之又跟着周其仁老师、赵耀辉老师等一起下去做调研，这才发现自己以前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其实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以前虽然在中国长大，但当时还没有相关知识的积累，也就根本没有去深入思考太多这些现实问题。现在已经学到了一些东西，有所准备了，再下去调研时思考就不一样了，看待问题会更深入，了解得也会更透彻一些，并且也会把它跟政策等东西联系起来去综合考虑，这是到中心之后收获比较大的。

另外一个好的方面就是这儿的教学和研究环境，因为林老师一开始设立中心的时候就明确行政是为老师和学生服务的。所以在这边你不会体会到任何官僚的气息。跟国外一样，国发院有着比较纯粹的学术环境，非常符合自己的预期。

记者：您对国发院日后的发展有怎样的憧憬？

嘉宾：国发院最近正在院庆，院庆的时候很多人在回忆以前的经历，也整理了以前的成果。你会看到这一路走来国发院在中国经济发展的每个阶段都起到了它的重要作用。这时候我们会思考，未来我们还能不能达到那样的一个高度？以前我们建立的是全国最领先的机构，但现在我们虽然还是有我们独特的优势，但未来可能也会有很多挑战。我希望我们就是踏踏实实地去做，未来十年、二十年我们再回顾的时候能够有今天一样的感觉，那就是很幸福的事了。

二、求学路 研究路

记者：雷老师当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后，曾在中信实业银行总行工作过一段时间。请问您先进入业界后转而出国深造是自己原来的规划吗？

嘉宾：实际上我是计划比较少的，出国也是。当时我上研一的时候就有一个出国的机会，但因为生病错过了这个机会。等到后来病好了之后，就有一种心愿未了的感觉。当时看到也没有想得太明白，只是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因为我从四川走到北京，就觉得眼界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我就想如果我走得再远一些，回来时应该会看得更高远一点，所以我就出去了。

我出去之后还曾经想过要转专业，因为我原来在人大是学金融的，但我考的是 GRE，所以就只能申请经济。我刚到 UCLA 就去商学院问老师能不能转过来学会计，他说其实读博士的话经济和会计是差不多的，而且第一年会计专业的学生都要修经济专业的课，让我等第一年修完之后再决定。我就开始学经济，第一年下来考资格考，当时三分之一被淘汰了，但是我考过了，这时候我就想，我辛辛苦苦考过了为什么还要去转专业呢，而且经济系看起来比会计学的基础还要好，所以我就不转了。

之后就要决定研究方向，在选择期间我又病了一次，当时就是查出脖子上长了一个东西，可能是癌症，但得等一个月后手术完了才能确诊。于是我就想要不然学个跟健康有关的吧。然

后就去了解那些老师们的研究方向，就看到一个老师在做健康经济学，我读她的文章就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也觉得这些东西跟自己的生活真是息息相关，看着就特别有感觉。看到题目就特别想去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所以就选了这个领域，跟着做下来了，觉得还蛮喜欢的。

我就是这样一步步下来，也没有太大的计划。我个人感觉就是计划赶不上变化，虽然我们长远来看要有一个规划，但总要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当然最好的就是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很多人不一定那么幸运，一下子就明确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我自己也是这样的。在没有其他更好选择的情况下，我觉得干一行爱一行的感觉也挺好的。

三、经双课 师生缘

记者：您为经双的同学们开设了中微这门课，您希望同学们在这门课中学到什么呢？

嘉宾：我觉得任何一门课都很难讲它对未来直接的作用，很多时候这仅仅是一种思维的训练。中微这门课我觉得主要是让人以一种比较科学的方法去理解经济。在学原理的时候会觉得这些东西都跟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观察到的现象相关，但为什么以及怎么来的可能就不太清楚了，这些疑惑可以在中微中宏的学习中得到解答。里面会学到各种模型，以一种比较科学的方法来证明，使得经济学更加像一门科学。

记者：有很多同学反映觉得中微有点难，您有什么好的学习建议吗？

嘉宾：我觉得这门课其实不难（笑）。有的同学可能学文科，他一看到里面有好多公式就头疼，就像理科同学看到大段文字的感觉一样。这是一种畏难的心理，但真正去学就会发现所用到的数学知识很简单。我们有很多文科的同学最后都学得挺好的。只要克服最初的畏难情绪，坚持下去的话就会发现只要认真弄懂一个问题，后面的问题由于都是相通的，也就迎刃而解了。

四、致学子 勉后学

记者：现在经双同学中有很多都希望在未来从事经济学研究工作，但对于自己的学术潜力并不确信，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嘉宾：我觉得我们做经济学研究的人好多本科并不是学经济的，所以并不一定是一开始就要学这个专业。我们经双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让本专业不是经济学的同学也有一种经济学的常识、思维。双学位本身就是给你一个尝试的机会，看看对这个专业是不是真感兴趣。有的人会觉得有这些经济学常识和经济学思维会对本专业有帮助，另有些同学觉得对经济学还挺感兴趣的，那他就可以去尝试。可以找个题目试着真正做一下。做研究可能跟自己的想象不一样，在这过程中，也许你会发现反复和深入去挖掘一个问题的过程很有意思，那么可能你就比较适合做研究；反过来如果你对一个题目做两下就觉得没意思，静不下心去做，那你可能就不太适合。

研究就是“re-search”，也就是反反复复寻找，所以就要耐得住寂寞，能够坐得下来静得下心。

记者：您对经双同学有什么样的寄语呢？

嘉宾：经双的同学选择同时修两个学位，已经是很大的勇气，因为整个过程需要比别人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是既然我们已经做出了这种选择，就要有心理准备，就要尽自己的努力去做这件事情，义无反顾的去把它做好。我们同学整体都很优秀，有很多机会很多选择，有时候会很迷茫，不知如何选择。如果什么都要抓住的话可能最后什么都做不了。当你有很多机会的时候应该去做个排序，抓住最重要的，做出最优化的选择，经济学就是教我们选择的。另外，机会从来都不是天上掉馅饼一样砸到你头上的，真正能让这些机会转化成现实的话还是需要踏踏实实的付出，只是一味想着抓住机会而不去行动的话可能最后什么也拽不住。不管有多慢，只要你一直在行动在进步，也总会在未来的某一刻获得回报

撰稿人：朗润之声 及桐 沈仲凯

运筹帷幄内 问道朗润中

专访宫玉振老师

编者按：在大师云集的朗润园中，有一位老师的来自东阿之地，辗转军事科学院，最终加盟国发院，他的研究领域独树一帜——国家发展战略。作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北大国际教授、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北京大学孙子兵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理事，宫玉振老师在大国国家发展战略，竞争战略与执行力，逆境中战略与领导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领导力等各大领域都有十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研究成果。

不久前的5月7日，我们在初夏的朗润园中，有幸采访了宫老师，聆听他的真知灼见。下面是采访实录。

一、大时代 大战略

记者：您所研究的领域在国发院中可微独树一帜，您为经双同学们开设的《大国国家发展战略》这门课程也颇受欢迎。能向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领域以及这门课程开设的缘由吗？您最希望经双同学在这门课程中学到什么？

嘉宾：我原来本科是学历史的。研究生毕业以后到了军事学院战略部做战略研究，07年以后加入北大后负责EMBA的战略学，从军事看管理，从战略看竞争。后来经济中心改为国家发展研究院以后，需要一门关于经济发展的综合战略的课程，当时的副院长找到我希望开设这样一门课程。我个人本科是学历史的，后来也从事了战略研究，对这方面很感兴趣，所以后来就承担了这门课程。国家发展还是属于一门比较新兴的课程，没有比较完善的体系。

今天回过头来看，许多事情是“路径依赖”的。我一开始读了七年历史，毕业之后到了军事科学院，因为研究战略也正需



要军事的背景，两者有很强的关联，而且都是综合性的学问。真正好的战略研究一定需要历史方面的积累。到了军事科学院之后，我从历史的角度进行了一些战略研究，包括与孙子兵法相关的研究等等。我们对于战略的关注不仅在于其现象，更在于其背后的历史演变，从而也更有深度一些。到了军事科学院之后，我从一个历史研究者成为一个战略研究者，思维模式也有所变化。

在国发院执教 EMBA 课程后，我原先所学的历史、军事、战略等等，都完全得到运用，我可以从历史和军事的角度来理解管理和竞争，和别人就不太一样，大家对这门课程也特别感兴趣。后来，我的研究又一步步从历史、军事、管理延伸到国家发展。经济数字并不是我的强项，而我会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国家发展，从而得到更长跨度的把握。其实从历史的角度去看军事、看战略、看管理、看国家发展，万变不离其宗，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以前所学的东西其实都是有用的，都会变成一笔财富，会成为一个人独特的东西。

给本科生开设的《大国国家发展战略》是一门综合性的课程，包括了政治、经济、外交、军事、价值。这门课程我觉得它的作用在于拓宽大家视野，国际发展是一个综合的发展，需要一个宏观的长远的综合视角。这门课希望大家多阅读一些东西。

记者：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其政治、军事的发展与变革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您能详细讲一讲政治，军事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吗？

嘉宾：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会为政治的变革提供动力，另一方面会导致一种新的社会力量的兴起，新的社会力量的兴起势必会推动政治的变革。英国就是商业发展导致政治变革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他国家也是这样的情况，一定要有新的力量的出现。首先从经济领域中诞生，然后成为政治变革。按照马洛斯的理论，经济的发展又必须建立在产权保护之上。产权保护需要政治的力量，对于权力的一种制约。英国之所以能出现变革，正是因为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的。而你之前讲的军事，经济和军事之间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那么经济的发展可以变成国家战争力量的基础，战争又可以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正如英国的革命，英国不断的对外战争，与法国之间的百年战争，最终为它带来了巨大的海外利益，其经济享受到了大西洋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好处。包括像美国也是这样，经济主体是它主导的，与其相辅相成的是其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当然其军事力量也是建立在它强大的经济之上的，否则它就变成了穷兵黩武了。

记者：那您如何评价当下中国的发展战略？它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将起到怎样的影响？

嘉宾：改革开放 30 年证明我们走的这条路是对的。西方经济学里面是没有真经的，在中国可以找到真正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和现实的发展是有差别的。中国经济发展有自己的独特性，当然中国也和世界有共同点的。我们一直做得事情是开发市场的力量，把企业家真正请回来。这套市场经济重新变为国家基石。要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看。当然我们也遇到了一些问题，

经济问题的发展只是国家发展的一部分，经济成绩上是最大的，但是在其他领域还需要提高。中国的国家发展如果需要在有可持续性，应该在很多问题上都予以重视。我想这是 18 大之后国家领导人看的很清楚，一个是社会问题，一个是政治问题，我想中国处于一个转型期，先重视经济，到了一定时期再发展其他方面，这在历史上也被很多国家发展所证实。

记者：您去年出版了《大道至拙：曾国藩与中国式领导力》这本著作，能就您的这本书和我们谈谈您的创作思想以及创作历程吗？

嘉宾：这和我最初学的历史也有关系。研究生的时候，我主要研究的是晚清历史，所以像曾国藩这样的人物，包括他们的著作，我都比较熟悉。在 EMBA 的教学过程中，我也从这一角度出发，尝试挖掘中国式的管理模式。我希望通过曾国藩这个人物来揭示一种中国式的领导模式，因为他是一位相当成功的中国特色的领导者，也深得毛泽东、蒋介石的敬佩。事实上，他在团队打造、自我修炼、个人魅力、战略制定等方面都有独具价值的一面，他在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下进行领导，我认为对今天很有借鉴意义。

我常常在生活中寻找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而用历史的眼光去探寻前人的解决方法，而《大道至拙》这本书正是这一思考方法的一种体现。我希望以曾国藩这个人物作为案例，来揭示所谓的中国式领导力，让当今的人有一些启发。

二、朗润人 朗润情

记者：今年适逢 CCER 成立 20 周年，这二十年中，朗润园中一定发生过不少让您印象深刻的事情。老师 2004 年加盟北大国发院后，觉得从您初到朗润到现在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嘉宾：国发院变化还是挺大的。当时还叫做经济中心，主要教授经济学和管理学方面的课程。林老师去世行之前，升级为国家发展研究院。从研究经济问题逐步转变为解决国家发展的问题，更加综合一些，确实契合了国家发展的需要。年青一代的学者的成长，比如姚洋老师，以前就是北大的研究生，现在也成为了国发院的中坚力量。国家发展研究院最近的影响力也在逐渐的增强，在经济领域，各个领域里面的影响力都在增强。智库排行，国发院在七个领域里面有五个进入了前五。第三个变化是向智库转变，学术研究一定要为现实服务，这是我觉得国发院最近几年的一个转变。

说到朗润的未来，我想学术依然是重心，但是要与现实相结合，比如产业化的问题，土地问题，医疗问题，环境问题，这些都是国家迫切需要学者拿出改进意见的一些方面。在未来，我相信朗润园中的学者们会有更多的成果和国家发展的意见提出来。

记者：您也执教了多年的 MBA 课程，就您的感受而言，MBA 的学员与经双的同学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嘉宾：他们之间的差距还是很大的。MBA 学员具有很丰富的管理实践经验。经双的同学年龄相对比较小，经验比较单薄，所以这两个群体非常不一样。所以 MBA 关注的是实用，经双的同学更感兴趣的是理论，对会不会管用并不感兴趣，对理论的完整性很关心。在讲课的过程中，MBA 要以案例为主，理论太枯燥，案例很容易形成共鸣，经双的话更多的是一种理论的架构，思辨的逻辑性更重要，光讲案例就觉得太水了。我觉得这是对的，本科生阶段需要更多方面的学习，打下扎实基础，这和年龄有很大关系。

三、致学子 勉后学

记者：我们作为经济学双学位的学生对经济学（如经济学脉络、各派观点等）的了解总是一知半解，并不全面，但又不知道具体该从哪些方面自我加强、深化对经济学的认识，希望老师能谈谈自己大学时是如何自我强化的，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和建议吗？

嘉宾：任何理论问题都与实际相联系。更多的结合中国实际，要重视真实世界的经济学。经济学派是从不同视角研究同一个问题，就像盲人摸象一样，摸到哪部分都不错，最关键的是要摸到象，不要因为一派而否认另一派，现实永远是最关键的。

记者：除了经济学外，广大的经双学子还面临着主修专业的压力，平时时间分配总显得不够。不知老师当年又是如何分配自己专业和兴趣的时间的？对我们两个专业上的时间分配又有什么建议？

嘉宾：企业管理中有一个“二八原则”，就是说你们要清楚哪些课程对于自己是最关键的，对未来发展影响最大的，这些课程需要多花精力。当然我觉得每个人情况不一样，爱好、背景都不一样，也应当有不同的处理。要找到自己的中心和方向，把时间分配好。

对于经双的同学，既然走了这么一条路，就必须付出；而这条路其实也并不好走，但又很值得。这两年或者三年的时间，只要能咬咬牙坚持下来，走完之后你会发现内心特别轻松。你甚至可以想：我经双都可以修过来，还有什么事不可以做！经双是一种压力，是一种挑战，但更是一种机会，是一种成长。

记者：现在修经双同学中，许多都希望能在未来从事经济学的研究工作，但对于自己的学术潜力并不确信，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您当年是从一开始就有志于学术研究工作吗？

嘉宾：我发现经双同学毕业以后做和经济相关的行业的并不多。很多同学回到自己的领域，经双最大的课程最重要的是让大家学会一种经济学的思维，以后未必要从事经济学相关的职业，但是打开了一扇门。因为经济学需要的训练相对高一点，管理学需要的相对低一点，很多同学以后读了管理或者金融，这都是很好的，根据个人兴趣很重要。单单读一个经双对经济学研究是不够的，需要读一个研究生或者博士才能有更专业的训练。

记者：老师还有什么特别想对经双同学说的吗？

嘉宾：今年是我第四次给经双同学讲《大国国家发展战略》，每次都有 300 人左右的同学来听，给我的印象也很深。我觉得经双是我们北大最好的项目，我们经双同学也是北大和北京其他高校最优秀的一批学生。经双同学们学习意识很强，也非常上进，理解力非常强。目前我们经双项目有一万多名校友，这可能是北大未来最宝贵的一批资源。我们一方面要自信，不要小瞧了自己；另一方面，你们现在还年轻，不必光看眼前的就业，不必想着要尽快毕业，拿到一个学位。眼光要放长远一些，我们今天站在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如果有长远的眼光和意识，完全可以获得更好的发展。时间会证明你们的潜质必定可以发回得淋漓尽致，十年前毕业的经双同学现在已经是许多领域中一流的人才。

我把人生分为三个层次：职业、事业和信仰。如果一个人仅仅关注职业发展，抱着一种“当兵吃粮”的心态，这种人是走不太远的。当你上升到事业这一步，认为“这是我一辈子想做的”，便会有一种热情和投入，不那么计较眼前的得失，可以承受压力和失败。而信仰，它是可以让一个人燃烧自己的。我们今天看朗润园这个园子，像林老师等人之所以能把这样一批经济学家聚集起来、产生这么大的影响，精神信仰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在今天这么一个浮躁的社会中，知识分子应当有一种执守。张岱曾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一种很宏达的追求，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使命。而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正是这样的一种使命感。我觉得经双同学学习本专业和经济的知识，更要汲取这种担当，这种北大的精神、朗润园的精神，这是我们和其他学生最根本性的区别。而朗润园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经济学的麦加，除了有这么多的大师，更是因为这一份天下情怀和家国意识。

记者：那老师您又是怎么将自己的职业上升到事业，进而上升到信仰的呢？现在很多人所关注的，更多还是某个职业的发展。

嘉宾：我很理解这种想法。现在大学生毕业之后首先面临一个生存的问题，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我们确实得找一份工作，但不能只着眼于当前的工作，决定一个人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能不能找到自己喜欢并且擅长的工作，从而可以将其作为事业来对待。这之后，你会发现自己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人，而是社会的一分子，为社会做着贡献，从而产生一种价值感。比如我作为一名老师，把自己的理解和大家分享，让更多人受益，我便有一种成就感。长此以往便会和这个社会形成一种共鸣，产生一种向上的信念，把事业个社会发展的大方向相契合。从更高的层次来讲，是一个人的价值体系、一个人的信仰决定了他的选择。

北大的学生应当有一种领导者的意识，不断提升自己的境界，完成“领导力的成长过程”。信仰如同布道一样，吸引更多的人共同为之努力，从而超越个人能力的限制。

记者：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同学会（简称 CCERclub）是一个致力于服务 CCER 经济

学双学位同学的学生组织，十七年来我们努力整合 CCER 的学术资源与校友资源，举办了许多主题活动，丰富同学的课余时间。能否请您对 CCERC1ub 今后的工作给出一些指导意见？

嘉宾：你们做得非常好，我也读过你们的会刊，参加过你们之前组织的讲座。我觉得你们确实反映了同学们的心声，祝愿你们 club 的活动越来越丰富，真正成为经双同学的精神家园，也祝愿你们的会刊越办越好！

撰稿人：朗润之声 胡祺 王宇辰

选择与自由

专访刘国恩老师

个人简介：刘国恩，男，现任国务院国家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北京大学中国卫生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兴趣：健康与发展经济学、国家医疗体制改革、医药经济学。

工作经历：2003年-2013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2013年至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2000年-2006年，美国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终身教授；1994年-2000年，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助理教授。

学术兼职：Associate Editor, Health Economics, 2013至今；副主编，《经济学》（季刊），2013至今；Co-Editor, Value in Health（国际药物经济学会 official journal），2001 - 2012；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行动网络》 - 健康组联席主席，The U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Solutions Network（SDSN）led by Jeffrey Sachs, 2013至今；主席，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hinese Economists Society, 2004-2005）。

一、祖国恩 少年志

刘国恩老师的名字非常朴实，“国恩”二字缘于父亲的殷切希望，即希望无论他长大后不管走到哪里、不管做什么，都不要忘记国家的恩情。但是作为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出生在四川茂县郊区的农村孩子，他也不清楚未来的路能走多远，又能通过怎样的人生方式来实现父亲的期望，一切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刘国恩老师出生在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是成都前往九寨沟的必经之地。他的母亲是当地羌族人，父亲是外乡汉族人，上世纪50年代初流放落户到这个边远的民族山村。因此，老师的童年更多经历的是艰辛和不平：贫穷低下似乎与生相随，乡下人欺负他是外来人，城里人鄙视他是农村人。他少年时代的梦想就是能穿上白大褂，成为一名专门给穷人百姓看病的好医生。而他的中学时代正处于中国的动荡年代，所以在1976年从茂县一中毕业后就在农村当起了赤脚医生。十六七岁的他，整天背个药箱行走乡野，在行医送药的同时，敏锐地发现中国农民就医状况的糟糕，乡村医疗条件很差，环境恶劣；到县城就医条件稍好一些，但是往往又随便地被人吼，受人歧视。出生贫苦的他对这些社会现象，心怀悲悯。但是作为一名最基层的乡村医生，他除了尽责做好自己的事情，还能有什么能力扭转这些呢？

命运终于有了一线转机。1977年10月，国家开始恢复高考。当了一年半赤脚医生的刘国恩老师，得知此消息后，随即也报名并参加了这次文革以后的首次高考。当时他的想法很朴素，争取能够考上大学去学医，学成后再回到家乡，为父老乡亲看病治病，特别不想让乡下人饱受

白眼。所以在填报志愿时，他在重点大学、非重点大学甚至中专等栏目里，从上到下填写的都是医学。

他的高考成绩名列前茅。虽然当时准备高考的条件艰苦到今天的孩子无法想象，但是聪慧刻苦的他，经过自己超常规的努力，在全县人们首次期盼的第一批高考名单中名列榜首。“刘国恩”这个不是从县机关大院长大的乡下孩子的名字，一下子通过高音广播传遍了全县。

然而，命运却在他的梦想马上就要成为现实的时候，给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可以说，是这个偶然因素彻底改变了刘国恩老师一生的轨迹——他失去了作为一个科班医生的机缘，直到现在他再也没有机会穿上少年梦想中的白大褂。

高考体检之后，他和大家一样，在家中焦急地等待通知。但是从第一批到最后一批，属于他的录取通知书却始终没有等到。绝望中，一通信息传来，告知他的政审材料缺失。在那样一个唯成份论的时代里，没有政审鉴定就意味着不可能有什么好的未来。

当时的他深陷痛苦之中，欲哭无泪，欲求无门。连县机关的其他人都都说，这样对待一个乡下的小孩太不公平了。

天无绝人之路。在临近大学开学的前一个月，他意外地接到了西南民族大学数学系本科的录取通知书。那时，身为民族院校，西南民族大学准许特招成绩优秀但其他方面有“问题”的学生，定向培养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师资力量。接到通知书后，他抓住命运这次的转机，背着铺盖到位于省会成都的西南民族大学数学系报到。

也许是因祸得福。西南民族大学77级数学系，当时云集了一批政审或其他条件有问题但成绩优异的尖子学生。在与他们的砥砺学习中，在老师的悉心传授下，刘国恩老师在学业上进步神速。学习之余，他逐渐发现，学数学不如像经济学那样对当时的中国产生更大的影响，于是他开始自学经济学，并到西南民族大学的政史系旁听政治经济学等有关课程。

由于自己的兴趣和努力，他在本科毕业的时候考取了西南地区最好的经济院校——西南财经大学的计量经济与统计专业。作为该校第一批研究生毕业后，他作为青年教师留校任教。一年多之后，到了1985年，命运再次向他垂青。当时，国家留学计划在各高校青年教师中选拔优秀的经济学人才去国外留学，西南财大推荐了他，但是要到复旦大学去参加包括西方经济学的综合考试，合格者才能得到出国留学的机会。刘国恩老师获得了学校的推荐，但是他只读过政治经济学，从未系统学习过西方经济学。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只好利用成都到上海坐火车的两天时间，硬是把刚刚借到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邹至庄老先生撰写的英文经济学教材的影印本囫圇吞枣地读了一遍，就进了复旦考场，仓促上阵。

几个月后，他获得了出国留学的机会，并前往西安外国语学院接受出国前的外语培训。喜出望外的同时，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出国究竟学什么？少年的梦想再次浮现在他的脑海，刘国恩老师就当即写信给自己唯一阅读过的美国计量经济学教科书作者 DAMODAR GUJARATI 教授，询问有没有把医学和经济学结合在一起的学科。GUJARATI 教授立即向他推荐了在纽约城市大学研究院执教的卫生经济学大师 MICHAEL GROSSMAN 教授，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填报

了纽约城市大学研究院，并于 1986 年顺利地在美国开始了自己的求学之旅，师从 GROSSMAN 教授，后面的路几乎就是“风正一帆悬”了。

1991 年，他在 CUNY 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并没有满足自己学业上的进步，他在考虑如何将所学的西方卫生经济学理论用于中国的医疗卫生实践领域，这是他的梦想。他了解到哈佛大学萧庆伦（WILLIAM HSIAO）教授是国际上研究中国卫生经济的领军人物，于是他再次投信问路，这位著名的华裔经济学家被这位优秀青年学者的一腔中国心所打动，全额资助刘国恩老师在哈佛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并在他领导的研究项目中承担计量经济学分析的重任。

1994 年初，由于他崭露头角的潜力和研究，刘国恩老师受聘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开始了第一份美国大学的教职。从这时开始，刘国恩老师的学术生涯发展迅速，并且成果显著。最终受到了美国公立大学中资格最老的北卡罗纳拉大学（以下简称“北卡”）的青睐，2000 年他接受北卡的邀请并担任终身教授之职。同年，他作为首位亚裔学者，应邀担任国际医药经济学会的权威杂志 VALUE IN HEALTH 的副主编，该杂志在 2005 年全球卫生经济、管理与政策类期刊中的影响因子排名第一。

二、朗润院 廿载情

90 年代中期，中国政府开始着手推进“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改革”，国恩老师作为来自中国大陆旅美的南加州大学卫生经济学教授，非常关注当时国务院在江苏镇江和江西九江的“两江”改革试点，并牵头对其进行了卫生经济学评估和学术交流，使国内外对中国早期的城镇职工医保改革有了更全面系统的认识。

2000 年刘老师前往北卡大学任教，并担任中国留美经济学会（CES）副会长。受林毅夫教授委托，CES 前任会长海闻老师开始联系他，并邀请他考虑加盟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CCER），开创中国的 health economic research。考虑到自己已经在美国安家立业，社会关系都在国外，加上北卡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代价确实太大。海闻老师盛情难却，刘老师答应先到 CCER 作一个学术讲座，而就在这场讲座会议上发生了两件事情让刘老师印象非常深刻。

会议由林毅夫老师主持，他特别介绍了刘老师在 Value in Health（国际药物经济学会 official journal）的 Co-Editor 工作，并强调华裔卫生经济学家在国际刊物中担任副主编的非常性，这让刘老师感受到了 CCER 的尊重与诚意。其后讲座过程中发生了第二件有趣的事情，让他至今记忆犹新。当刘老师谈到各国把婴儿死亡率作为衡量健康的主流指标时，座下老师开始提问：“那么中国与目前国际目前有多大的差距呢？”这个问题始料未及，他并未刻意去查证具体资料，凭直觉判断就回答了“大概 28-30%”的答案，而发达国家一般都在 10% 以下。没过多久，中途出去的海闻老师带着一本厚厚的资料书进来，突然说道：“不好意思啊，我打断一下，刚刚查了资料，中国目前的婴儿死亡率是 28.5%，国恩教授的估计是对的”。对此，刘老师对 CCER 严谨的治学态度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就是刘国恩老师最初与 CCER 的结缘。讲座之后，林毅夫老师屡次盛情邀请他前往北大 CCER 任教。正在考虑如何协调美国的事业、家庭与到北大 CCER 任教的期间，事情突发变故，另外一个人出现了，他就是时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副院长张维迎老师。张老师专程飞到美国北卡大学，极力劝说他加入光华的队伍，并创建北大光华卫生经济学系。考虑到同样是回国服务，对比 CCER 个人独立的研究体系，到光华可能学科建设更有序些，受益的学生群体也可能更多一些，自己发挥的作用也就更大些，刘老师极其艰难地做出了到光华任教的决定。

就在决定到光华之际，刘老师坦言：林毅夫老师的博大胸怀与爱才之心让他深深感动。考虑到 CCER 与光华当时的工资差距，林毅夫教授甚至通过越洋电话，提出北大 CCER “讲座教授”的承诺，劝说刘老师留下。刘老师坦言：“如果当时 CCER 一定要设立讲座教授，毫无疑问毅夫才是当之无愧，我实在是担不起。”面对毅夫教授的如此厚爱，刘老师受宠若惊。然而更让刘老师感动的是，就在刘国恩老师回到光华成立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的庆典大会上，林老师不但不计前嫌，还亲自出席了庆典论坛并发言致辞，为其助威支持。“毅夫教授不仅没有埋怨我，反而是敞开心怀的拥抱和支持，这种广阔胸襟实在是令人钦佩，国人之楷模！”谈及这段历史，刘老师脸上至今仍然满是感动与内疚。

2013 年，这是刘老师在北大光华任教的第十个年头，国发院再次力邀刘老师加入朗润园的学术团队，这一次他如愿以偿了。2013 年 9 月，刘老师正式调入国发院任教；同年 10 月，国际顶尖的健康经济学期刊《Health Economics》推选他担任其副主编，这应该是对刘老师加盟国发院的最佳祝贺吧。如今朗润园发展历经二十载，作为学者专心治学之地，朗朗乾坤，润润涵养，“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学者当如斯！

三、致学子 勉后学

谈到对 CCER 学子们的建议，刘老师认为能够上北大，首先是对大家聪明才智的肯定，其次要感谢命运的机遇安排，也是足以让每一位同学天天开心的事，在天资聪颖以及机遇运气两重基础上，大家还有悟性能够选择在国家发展研究院学习，这是非常值得好好珍惜的机遇和时光。谈到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的特点，刘老师用光华进行了比较说明。他说，作为中国顶尖、世界有名的商学院，光华必须重视现代企业 (corporate) 的文化和价值，并从企业的视角推进各项科研教学的工作，重点落脚在解决企业管理和产业发展的实际问题。相应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顾名思义，其科研教学工作应该围绕国家发展的主线展开，也就是说国发院的研究视角更广、更长，要放眼人类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要着眼未来探索中华名族的振兴之路。对于同学们而言，还有什么比这更有意义、更有价值、更有潜力的学习机会和条件呢？

对此，刘老师非常强调选择与自由的观念：“每个人来到世上，一辈子就是一部选择的历史，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选择，经济学就是研究选择的一门科学。大家能够到国发院来学

习，扩展了你人生选择的时空，本身就已经是难得的好选择，无论以后从事什么行业，相信大家都不会因为曾经接受过国发院的教育而遗憾。我希望对国发院的同学们说，既然你已经非常智慧地做出了一个这么好的选择，那么就尽情地去享受国发院 offer 给每个同学的机会条件，相信未来之路只会因为你现在的明智选择更宽广、更精彩！祝大家学习愉快！”

撰稿人：朗润之声 许珊

“聚焦朗润·对话双办”交流活动第一期精彩实录

活动简介：本次“聚焦朗润·对话双办”交流活动邀请到了赵普生、刘博谦、勾雪三位双学位办公室老师，通过两个多小时的交流，倾听她们的心声。

一、国发廿载 经双沿革

Q：国发院的前身——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创立，至今已有20年。第一届经双开办时的情况是怎样的？从开办到现在，国发院经双项目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才成就了今天的影响力？在三位老师的工作中，又有哪些事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赵普生老师：我觉得经济双学位和国家发展研究院一样，一直都有这么一个理念：要想做得更好，就要不断创新。办双学位这么好的创意与林毅夫老师、易纲老师、海闻老师等等开创者都是分不开的，他们把美国的通识教育引入了北大，国际上先进的治学理念和北京大学的丰富资源相结合，催生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即现在的国家发展研究院。

我觉得做任何事情，成功取决于方方面面的支持、条件、运气等等。第一届经双是1996年开办的，而在2003年又创办了校外经双。其实在2001年，经济学院和计算机系便做了一个也招校外的双学位——电子商务。这和同样是倚靠北大的强大影响力做出的项目两年后就取消了。前年，我校经济学院也创办了类似的经济学双学位，但短暂尝试之后也取消了该项目。

我觉得双学位能做成，源于很多因素。首先从大的讲，就是整个国家的改革开放，

经济学成为大众科学，且中国发展迅速，急需大量懂经济的人才。改革开放把经济学的位置和在国家教育中的份量给推上去了。第二，在美国受过教育的人到北大创建这么一个脱于传统的教育模式。美国教育比较领先，不管是教育理论，还是整个各个学科的教育理念，以及对人的培养模式。当时，北大已有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建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必然备受质疑，压力很大。而且在那个年代，早年从美国回来的人甚至有可能得不到应有的信任，因此中心创办的条件很艰难。这个过程中，当时的北大校长吴树青做了不少贡献。另外，就像经济学所说的“内生性”一样，在三年后，中心便得不到外界的支撑，必须承受自生自灭的压力。所以，办理经济中心本身就是非常艰难的过程。可以说，中心的创办是林老师、海老师、易老师报效国家的体现。这一点我也是特别相信的，他们用自己学到的西方理念报效给国家。成立中心光研究不行，想在北大站住脚，你得做点事。所以，经双也是中心为北大学生创办和为在北大立得住脚的项目。总之，我觉得创办的老师们的起点非常高，他们把先进的理念、模式带到北大，得到当时北大校长的支持，这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基于此，中心领导在培养硕士、博士的同时也格外重视对双学位学生的培养，重视双学位项目在北大的反响。

在三聚氰胺事件的时候，我们和周老师去蒙牛进行了一次参观。周老师的意思是，我们虽然不是企业，并不直接面对市场竞争，经营模式也有很大区别，但我们应该用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的精神来指导工作。当然，我们培养学生跟市场生产很不一样。市场生产有一系列的检测指标，出厂前要看合格不合格。而我们学校教育很难，只能大致通过学校、专业、学历来判断。尽管我们没有那么多硬性的指标，但我们依然要严格要求自己，争取把每一个学生都培养好，拒绝“三聚氰胺”从我们这里流出。

记得胡大源老师在我们参观华为的时候问他们的党委书记：“未来5年企业有什么规划？”党委书记回答：“别说5年，1年我们都不敢想。每天都在艰苦奋斗、如履薄冰。因为市场竞争非常激烈，而且瞬息万变。”我们也应该向他们学习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

Q：您刚把培养学生和生产牛奶进行比较。那请问经双是怎么在开始时选择“原料”，之后又是怎么整体“把关”，来保证我们学生的质量的呢？如果报名人数超过预定计划，我们又将如何筛选呢？

赵普生老师：我觉得是这样的，首先北大就把了第一关。你看北大每年在招生上投入了多大的力量。关键就是那关把得好！（全场笑）

刘博谦老师：我记得刚来的时候，校内双学位每年基本都维持着四五百人的报名量。从07年开始报名人数就增多了，突然就增到了八百多人，我们当时把所有符合条件的申

请同学都录取了。招生最多的2008年，校内同学一下子报了1200多人，经济中心实在是承受不了了，于是第一次开始进行筛选，限制到1000人。后来为了和课堂容量相匹配，就逐步减少到了现在的校内700人，校外200人的规模。

Q：2003年起，国发院开设校外经济学双学位，让众多校外同学受益匪浅。校外经双设置的初衷是什么？目前来看，校外双学位达到了怎样的效果？

赵普生老师：校外双学位的开设可以说是北大资源普及化的成功尝试。我们希望集北大资源，使更多同学受益。把北大的教学理念在更大的范围中推广。同时，校外双学位的开设加强了校内外同学的交流沟通。我们是非常关注校外双学位的同学们的。每年我们中心也都举办校外经双的交流会，既给校外的同学一个互相认识的平台，又避免校外经双被边缘化。

二、双办点滴 日常工作

Q：能和我们聊一聊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三位老师选择了成为国发院的相关负责人吗？

赵普生老师：还真是说来话长，我的这段经历和改革开放有关。我83年到北大工作。当时北大有个机构叫职工学校，那时的工作有两项，一是给年轻老师培训外语，二是对行政人员进行培训。后来，国家教育慢慢复苏，培训也不需要了，所以1996年取消了职工学校。当时说“改革”，大家都很不高兴，

学校人事部部长还亲自给我们做思想工作，安排老师到不同岗位，有的去教书，有的去审计，等等。我在学校里听了一些讲座，知道有这些老师（当时还不知道有 CCER）。职工学校取消后，我就“下岗”了。学校说正好有个单位，问我去不去，我就说“试试”，于是就来到了这儿。我是带着一种试一试的心态来的。中心可能看到我简历还不错，而海闻老师可能也觉得可以，就“收留”了我。当时经双还没人管，于是我就协助易纲老师从曹雄飞（中心在读硕士）手中接过了经双的工作。

刚开始管理双学位事务的时候，很多问题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双学位是什么？将来怎么做？美国通识教育是怎样的？当时我只有一个信念：北大这么优秀的学生接受经济学教育是很好的事情，既然做了这个工作，就一定要做好。于是我就这么一步步做下来了。

勾雪老师：我就是像赵老师说的，在国发院设立校外项目时过来的（笑）。我毕业那年正好闹非典，没办法出去找工作。你要上课老师都不让上（小编：如此爽！）。当时社会真的到了瘫痪的地步，从4月份开始就全面停课了，直到7月份才稍微有点儿复苏。我们那年，连毕业典礼都没有办，当年毕业的学生也都在学校积压着。正巧，国发院招校外双学位，然后我就来了。后来就一直在这儿工作。一进来就感觉院子很美，赵老师特别慈蔼，所以在这儿工作特别开心、顺心。估计博谦姐也跟我有同样的感受。

刘博谦老师：我来经济中心工作也是非常机缘巧合。我本科毕业后去了一家报社。

后来很巧，在燕北园采访完一位老师后，回学校跟一个师弟聊天。他当时在做学生工作，觉得我的个性还是很适合在学校工作。当时刚好北大主页招聘信息中有经济中心的招聘。尽管我没有修过经双，但对经济中心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于是我就投了一份简历。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天上午10点多到经济中心面试，跟面试老师聊了一会儿。我大概11点半回到家，刚进家门，赵老师电话就来了，说我被录取了！然后我就兴高采烈地来上班了。

我觉得自己还是比较适合做这种面对面与人交往、给人帮助的工作。虽然有人说，这是不是浪费专业了。但其实我觉得活得开心就好。尽管这里的工作较琐碎、平凡，但干起来很开心、很有激情。跟勾雪和赵老师的合作也非常顺畅。赵老师就像妈妈一样关怀着我们。

勾雪老师：没错！用三个词形容在这里的工作就是温暖、温情、温馨。一推开门就有一种家的感觉，无论在外面遇到什么事，都愿意跟博谦和赵老师说。同事之间能有这样的亲情，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

刘博谦老师：每天愉快地在这么美好的环境中工作，每天我们办公室的笑声都可以穿到前面的院子里面去，感觉特别好。正如赵老师所说，我们不断地接触新鲜的面孔、非常优秀的同学，大家也给我们带来很多正能量。我们也不断地从同学那里得到新的信息以及帮助。

还记得经院刚开始招双学位的时候，我们感觉挺有压力的。毕竟很多大一的同学对我们的项目不是很了解。当时，几位双学位

的同学和我们在办公室待到很晚，想各种各样宣传的方法，策划如何进一步的宣传活动，到了晚上 11 点多才忙完。那天走到未名湖边，心情特别舒畅。为了我们小小的事业，付出这种努力，觉得非常高兴。当然，也为我们同学的付出而感动。做宣传 PPT 时，刚好有一个元培的同学来找我聊天，看到我在做 PPT，于是就帮我改画面的色调。从阴影一点一点改起，改到夜里很晚，最后把 PPT 的模板帮我做好了。有这么好的同学，真是极大的支持了我们的工作。

勾雪老师：除了同事间温馨的感觉，同学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正能量。我最开心的事就是工作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校友过来，推开门，说一声“赵老师、刘老师、勾老师，我回来了”。这个时候是我最开心最开心的时候。

Q：双办的日常工作主要有哪些？双办的工作需要学生助理的参与吗？具体是哪些工作内容？

赵普生老师：为了更好地为学生服务，我们的 611 原先是行政办公室，而现在老师们都搬到租用的政府管理学院的办公室和朗润园其他的办公室，把这间办公室变成了学生的讨论教室。我们三位老师和研究生办公室的老师，双学位教学工作、研究生教学工作、学生工作等等都在这一个办公室内完成，算得上北大人均面积最小、管理学生最多的办公室。就是为了给学生创造一个好的条件，方便同学与同学、同学与老师之间的沟通。

刘博谦老师：双办的工作涵盖了从招生、教学管理、学生工作到校友服务各方面的内

容。双办的日常工作说实话比较平淡，也很零碎，学生助理的加入可能需要完成一些比如说给同学开成绩单、查排名、接待同学、帮助审核报名材料等工作。还有一些比较大的事情例如双学位项目年报的制作、与校友的联系、对学生毕业去向的分析等各方面的事情。

Q：经双项目对学术纪律的严格要求是有目共睹的。在这方面，双学位办公室平时也做过许多努力吧？

勾雪老师：我先笼统的说一下吧。那些违反纪律比较严重的同学给我们三位老师留下过很深刻的印象，而涉及到的一些事情也确实能够督促我们对同学服务质量的提高和制度的完善。曾经有同学犯了比较严重的错误，我们就会寻找我们工作中的漏洞，看看哪里给他留下了可乘之机让他犯这样的错误，以便及时弥补。

刘博谦老师：现在考试是按姓氏而不是学号排座位，期中期末都要在考试申请考生签字，这些制度都是有渊源的。我们每个人开始能想到的肯定是很局限的一部分，但我们在工作中不断遇到问题然后不断去完善这个制度，因为我们的机构比较简单，所以遇到问题能立刻进行修正。比如像用姓名排座位这件事，其实是有一个同学来到我们办公室向我们反映考场存在问题，于是我们立即决定建立这个制度。我们也非常感谢那个同学，跟他很好的交流了，并送了他一个小礼物。

赵普生老师：如果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也就是学生考试违纪作弊，对待这个问题学校各个院系的处理方式可能是不尽相同的，

而我们的处理方式就是遵循以下几点：第一点就是一定要零容忍，严肃处理，因为这是从整个国发院培养学生的理念和维持它一个比较好的品牌出发所必须要做的。国发院双学位能够做到现在，不是某个学生或老师个人的成果，而是靠大家一起努力的。另外零容忍之后很多事情就比较好处理了，如果每个问题上都出现一个特殊案例的话那我们就会无休止地纠缠在这种具体的事情上面。第二点是我们不回避这种事情的发生，我们会从自身工作找原因。事情发生了，我们就会自省，看能不能通过提高自己的工作从而把这种事情杜绝了，让同学不会有想法也没有机会去做这种事。

刘博谦老师：我们一直强调助教要在监考问题上特别认真，这从出发点来说不是为了抓某个同学，而是我们希望助教严肃的态度能营造出一种仪式感，让同学知道助教是很关注自己的，从而在对待自己的行为上也会十分小心。这样我们也是为了帮助同学，从一开始就断绝这种念头。我们常对助教说你们的行为对同学行为的影响太大了，而同学的行为又关乎到我们整个项目的运行。

三、课程设置 独特选择

Q：与其他双学位选课不同，经双选课“另起炉灶”，其中通过意愿点提示排名的方法有效地帮助同学们进行取舍。什么时候开始采用这样的选课方案？当时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将其与学校选课系统分别开发的？

刘博谦老师：经双的选课模式其实是一步步发展出来的。2009年以前，选课并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由于当时学校的选课系统没

有向双学位开放，修双的同学必须手动选课。同学们每年至少来办公室两次，交给我们选课条；我们则制作了一个庞大的 excel 表格来不断更新大家的选课情况。我们三位老师为了提高效率，还采取流水作业的方式：当时我们有一个打号机，每位同学来办公室选课时，先在勾雪老师在选课条上打一个号码，然后交选课条，我再把每个人选的课程录入到 excel 表格里。

这样的做法在手动选课的条件下，效率其实已经很高了。可问题是，每年修经双的有两三千号同学，许多同学还会不断调整想选的课程，甚至一出门就后悔，有的同学不断改变选课甚至递交交三四张选课条。所以说网络系统的建立其实也是被迫的，是为了改变“痛苦”的现状，为了通过网络完成各项细碎化的工作，这样我们也可以留出更多的时间来和大家交流。

2009年的时候，一位校外双学位的研究生和两位信科的本科生一起帮我们着手建立了经双的网络平台。他们本身就是学生，对于选课制度有自己的想法，我们讨论后觉得目前我们采用的方案是较为合理的。这几位同学真的非常给力，和我们不断沟通，建立起了从报名，选课，课评，到毕业、校友联系整套网络系统，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几位负责的同学们的能力都非常突出，后来也都有了很好的职业发展。，现在其中一位还继续远程为我们工作，加上新加入的网络管理的同学，这个团队可以按照学生和老师的要求随时对系统做灵活的修改。

Q：在平时的教课过程中，有没有采取什

么措施来提升学生质量？比如考试制度的设置等等？

赵普生老师：首先大家都是北大的学生，不论是智商还是学习能力上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如果在这一点上再挑剔就太残酷了。

刘博谦老师：我的想法是我们应该尽可能地提高课程质量，而不是学生质量。因为我们已经有全国最好的学生了，真的没什么可挑的了。

赵普生老师：另外对校外这一块，能保证学生质量的几个措施是：学生人数控制以及管理。我们要意识到开办经双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培养人才。所以我们在录取上一定是公平公正、非常严格的。从03年开始招收校外生，我们从未开过后门，从未录取过一名不符合条件的学生。除了教学，我们也设置了助学金、奖学金。这一切完全是从培养人才的角度来管理。

刘博谦老师：我们从一开始就把犯错误的源头给卡住了。比如考试题目我们三位老师绝对不经手，考完后立即销毁。老有同学来问，能否看看以前的题目呀，但我们确实没有。我们从制度上就杜绝了一切可能通过人情打入的关口。

赵普生老师：可以说，我们办公室的定位不是管理学生，而是把学生放在第一位来培养。第二位是教师，其他行政办公室是第三位。大家联合起来都是为学生服务的。我们始终把服务学生当作自己的工作理念和目标。另外，我们的服务对象也很好。这么多优秀的学生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正面的信息。而且学生是流动的、年轻有活力。跟不同人

接触反馈是不一样的，北大学生反应快，反馈都是很积极的。

Q：经双的课程数量从原来的十几门发展到现在将近三十门，那么这些课是如何推出来的或者说从计划到实施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

刘博谦老师：我们首先有一个基础的体系性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有几个确定的方向，根据这些方向来制定一些倾向性的课程。比如在聘请一个老师的时候，院长们就会考虑他适合开什么样的课程，然后我们会结合他的研究方向和中心现有的学科缺陷提出一些课程方向建议，继而要求该老师写一个课程大纲，即详细的课程介绍。国发院有一个专门针对双学位的学术委员会，由周其仁、巫和懋、汪丁丁、沈艳、赵耀辉这五位不同领域的权威老师组成。我们会将课程大纲发给学术委员会的这些老师，他们看完之后就会相应提出一些意见，通过他们的批改之后我们会向学校申报这门课了。一般学校对我们的课程申报要求都会予以满足，对我们还是比较信任的。学校审核通过后，这门课程就可以搬上讲台了。

四、师生沟通 促进交流

Q：这些年里，同学们找双办老师交流频繁吗？聊的问题主要有哪些？双办又给他们的怎样的帮助？

勾雪老师：我们三位老师非常希望能让我们更多的时间来和同学们交流，说来也是源于一次遗憾。当时周其仁老师希望我们能推荐一位同学去一个地级市担任市委副书记

的秘书，负责开发区的经济建设，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我们在脑海中搜索了我们熟悉的双学位同学，居然没有想到任何一位可以推荐的同学。后来，我们曾经多次在开学典礼和其他场合，多次告诉同学们多来和我们交流。其实和同学聊天的过程中，同学们也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新鲜的信息。赵老师也经常说起，比如跟某位校友聊了之后得知“美国电力也已经有了期货”之类的消息，以及其他很多第一手的资料。

刘博谦老师：实话说，校外双学位的同学在和老师沟通这点上做得比校内同学好很多，他们无论有什么问题都会随时来敲办公室的门，跟我们聊天；好多校内同学直到毕业也几乎没有见过，其实挺遗憾的。大家花了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如果最后只是拿到一纸文凭的话，获得的也太少了。有些同学会觉得不知道能和双办的老师聊什么，其实跟我们什么都可以聊，哪怕你来说“我最近情感上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们都随时可以接纳你们，来跟你们聊一聊，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帮助。

赵普生老师：我们一直希望设立一个开放日，让同学们除了平时来找我们交流之外，还能有一个时间来集中地和我们双办老师、和不同学校不同院系的同学聊一聊。有时候我们知道的信息和资源还可以帮到大家。我们经双毕业的校友在各行各业均有所建树，师兄师姐们也乐意将自己的资源优势与师弟师妹们共享。

五、寄语学子 语重心长

Q. 三位老师有什么想对正在和准备修经双的同学们说的吗？

赵普生老师：我的想法其实在刚才也已经说了很多。中国的教育有一个缺陷，似乎分数是天大的事，但事实上分数只是一部分，还有好多事情等着我们去尝试、去锻炼。美国的大学需要义工和社会活动的证明，展现学生的领导力和组织能力，美国的大学注重这些方面的培养；而中国的大学呢，高考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近期可能也还做不到。但我们国发院应带做好这一方面，鼓励同学们全面发展，也需要学会寻求他人的帮助。

你们也应该做好准备，将来在职场上面对的是各种各样的人，需要包容，需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将来你们选择工作时要想好自己适合什么样的环境。如果你特别想做一个企业家，就需要每天没白天没黑夜的创业；如果想做一个研究人员或教育工作者，面临的环境就很不一样。主要看你怎么选择。所以在学生时期应该多接触社会，包括多跟办公室的老师交流。很多时候光凭想象是不行的。像到我们办公室做学生助理的好几个学生，最后在各个方面都有很大的变化和进步。

刘博谦老师：我也补充一些。其实就我个人对双学位的理解，双学位的意义是什么？学位证书自然是一方面，但许多毕业的同学和我们聊天时觉得，更重要的可能是一种思维模式。很多同学在自己本学科的学习中可能会形成一种固有的思维模式，或者一些偏见，而经济学给大家提供了一种新的看待事物的方式。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创始人易纲老师曾经担心一个问题：双学位会不会对主修专业

的学习带来冲击？我们仔细思考了这个问题，也做了一些数据分析，发现影响其实并不显著。一方面，很多同学主修学科的课业压力可能并没有那么大；另一方面，经济学思维模式和主修专业思维模式的融合很可能会给大家带来许多新的收获。

撰稿人：朗润之声工作室

“聚焦朗润·对话双办”交流活动第二期精彩实录

活动简介：本次“聚焦朗润·对话双办”交流活动我们特别邀请到黄卓老师共同参与。黄卓老师为国发院主要讲授计量经济学、国际金融等课程。其本科、硕士就读于武汉大学，博士在斯坦福读，毕业后选择了北大任教。研究方向为金融计量。

一、双学位课程面面观

黄卓：很多人都说计量太难，想要最后一个学期再来修读，但是我建议尽量早修，减少压力并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基础。曾有中文系女生找到我说自己的计量如果挂科就拿不到双学位，而自己已经被国外大学录取，希望能够调整分数。而我告诉她分数已经没有办法再进行更改了，但是自己可以给国外的教授写一封信说明情况，尽量不影响出国。

刘博谦：大四的部分学生修读会态度不那么认真，大二大三会比较认真。

同学：一般而言校外同学修读双学位会更为认真，因为他们付出的成本较高。

黄卓：学生太多基础不一样，上课难度很难把握。我坚持的原则是使得大多数同学可以听懂，所以课程的难度其实比正规（经济学专业）的难度还是要相对低一些。但是这样也会使得一些同学觉得这样的课程毫无挑战性。因而最后采取一个措施是，课堂按照以前的难度走，但是给学有余力的同学提供更多的阅读材料、经典教材以及相关新闻报道。上经双课程的同学目标各不相同，这就对我们老师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我一直在探讨怎样进行平衡。

赵普生：经双的微信平台大家可以进行多多关注，上面有许多国发院老师的文章和国发院具体活动的信息。对于大家日后选择

很有帮助。

二、未来方向大家谈

同学：我是英语文学专业，但对专业兴趣不是很浓厚。本计划做口译，但发现随着学习深入个人兴趣减淡，现在十分迷茫。不知老师有何建议？

赵普生：如果决心做口译的话，我个人建议考北外的口译研究生。以前有一个同学就是念这个，也修读了经双，毕业后创业做了自己的同声传译公司。经双规模较大，涉及面较广，我们希望学生除了获得专业知识外，还能够充分利用经双这个平台，发现自己更多的兴趣，建立更为广泛的人脉圈。我们还希望通过跟学生的交流，能够给大家更多职业规划上的帮助。形式不拘一格，大家想到什么可以聊什么。

同学：我在研究生阶段希望转为经济金融方向，可以找一些老师国发院的老师进行合作指导吗？

赵普生：推荐赵耀辉老师的 Charles 项目和相关课程，老师会带领你进行深入实践调研，并指导经济学论文写作。

同学：我是学习新闻专业的，希望以后进入汇丰商学院继续读研。

赵普生：推荐参加财经新闻班，可以收获财经和新闻双向知识培养。

黄卓：学术型硕士对研究经历要求较高，但是专业型硕士对研究经历要求不高，更多的是一种综合能力的考察。所以对于日后研究生方向选择，能够更明确自己的方向会比较重要，还有就是你要看自己申请的学校院系是偏向于哪种类型。因为老师也会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制定不一样的培养方案。很多时候我们老师也比较困惑，因为有的学生在日后的表现跟他当初的面试表现是不一样的。

同学：专业型硕士念完后想要转做学术型怎么办？

黄卓：可以到时候再跟老师联系。

同学：我写的论文是跟自己专业有关的，偏农业，发表的论文也多跟金融没有关系，那么以后想要申请金融类硕士怎么办呢？

黄卓：怎么不来我的课程呢？

同学：哈哈，听说比较难。没有办法将自己的专业跟金融结合起来是我很困惑的地方。

黄卓：其实也不一定太纠结于是否有学术成果，老师更多看中的还是你的个人综合能力，不见得发了论文就是好学生。如果你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比较清晰，那你要敢于跳出条条框框。不一定非要按照学校的课程安排来上。该翘的课就要翘，要有自己的思路。你要把自己感觉比较好的觉得很重要的放在前面的位置。不要太消极的等待别人来安排你的时间。你要敢于走出一些规则的限制。比如说很多老师不接受本科生做科研，那赵老师就接受这种教学方式。并不是说没有机会，不要把自己限制死了。特别推荐网络课程，很多世界一流大学的教学视频都在，我觉得大家要有两种很重要的能力，一是乐观

的心态和积极的思考方式，不要抱怨，乐观面对各种问题。二是要有把不利因素转换为有利因素的能力。比如说我很想去一个专业但我被分到了另一个专业，那你就不要不停地想办法改变自己当下的处境。人生有那么多不确定性，中国社会也是，变数太多不确定性太大。像我们那代，出国要想着怎么样拿到奖学金，到了现在的社会，很多学生甚至出国花钱只是为了接受教育而已连学位都可以不拿，所以说很多事情都在变化。我的一个学生在纠结于是去 UCLA 还是杜克，他不知道怎样选会最好。最后几天他甚至给我发邮件问我，他现在都在选择是不是应该读博士！很多时候做错了选择其实也没那么严重，无外乎是路好走与否。但更重要的还是你走路的心情。终点大家差的并不是太多。自己的成长最重要。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有无改进，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草莓味和菠萝味的棒棒糖哪个更好呢？吃到的那个就是最好的，选择的就专注，好好地吃完自己的那个棒棒糖就可以了。经济学院的一个学生本科跟我做科研，农业经济学方面，申请出国读硕士还是有差距的，很多所学校都把它拒了。后来一个学校把他录了，并且没有奖学金，他觉得就这个吧。再后来又有学校提供全奖录取，并且农业经济学排前五，他觉得既然选过了就那个吧。一个好的心态比较重要，去哪个都可以。去汇丰就汇丰好，去光华就光华好。

同学：经双对我收获还是很大的，我是学物理的，感觉以后出路很窄。大二的经双学习生活完全开拓了我的思路，让我觉得路不是一条路可以走的，薛兆丰老师的课还让我觉得很多东西原来都不是死的，都是可以

改变的。我感觉我们物理学院对学生的职业辅导教育这块还是比较薄弱的，我在经双这块就对自己的职业有了更多的想法。

黄卓：你是想本科毕业就去工作？

同学：如果有好的继续学习的机会我会去，但是我之前在光华上的课也让我觉得，很多理论其实是实践了之后再去学习比较好。

黄卓：我觉得来的同学就很好，来了的话我们就可以聊到一些东西，很多事情也是你尝试了之后才知道，开始了才有机会，不开始永远没有机会。如果你没有想好是否做学术，那你就先工作一段时间看看。不是所有的人都要去做学术，我们需要科学家但我们也需要创新。很多同学直接毕业工作我觉得很好，念一个没有方向的研究生不见得是件好事情，先工作不一定比读研会差。读一个好的项目就一定有好工作吗？不一定。或者说找到了一个好工作就一定比别人发展的好吗？也不一定。更多的还是要看你的个人能力。大家要抛开读研只是为了学历的目的。

同学：很多单位有学历限制怎么看呢？

黄卓：可是念研究生也是要付出成本的。我的意思并不是劝大家都要毕业了直接工作，因为有些学生主要是不知道自己要去干嘛而去念硕士，这样并不明智，我希望大家不是为了读研而读研。

刘博谦：黄老师的意思其实是希望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自己并且有很明确的规划。我们也很希望更多的同学来跟我交流获得更多的信息。因为很多时候之前的学长学姐会直接来招人，但是我们有时候会很茫然，因为我们不知道你们想做什么。有一个同学在大学三年做了很多的实习，并且通过这些实习

更明确自己想要做的工作。

黄卓：鼓励大家在本科期间最好做至少一个实习，这样你会有感受。有的同学总是纠结自己是做学术方向呢还是职业类呢，这些困惑通过实习会变得清晰。刚开始我觉得除了学术什么什么都是没意义的，直到我去念硕士，我发现更多的时候跟人沟通也是很重要的事情。以学术为职业是一条路，做其他的也是一条路，不要太早否定一些东西，做了才会发现很多刚开始你觉得无聊的事情做起来其实很有趣。我做学术遭遇瓶颈期的时候，我选择了去尝试实业的工作，老板虽然觉得很可惜但也支持了我。我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自己可能更合适做学术，就回到学校继续做学术，所以只有把事情尝试了你才会更明了自己合适做什么。学术上不好或者申请的学校最终并不理想，不要太在意，那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要看淡这些东西。

刘博谦：想获取职业方面的信息可以跟职发部多沟通。还有就是大家一定要保持电话的畅通，别错过任何通知。

黄卓：信息沟通其实也是一种职业化的素养。

同学：希望做投资与并购方面的工作怎样做比较好？

黄卓：我觉得上课不是一个意义特别大的事情，可以多做实习。

三、CCER 夏令营正当时

同学：CCER 夏令营研究生的录取会看重哪些？

黄卓：第一个有没有很强的推荐，第二个就是你的学术成果。

同学：在筛选简历的时候，会不会只选

择专业排名前几的人？

蒋少翔：成绩当然要看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如果我们觉得你这个学生特别喜欢经济学理论研究并且能够有所建树，我们也会考虑录取。

同学：老师会给学生写推荐信吗？

黄卓：一般我会布置给需要推荐信的同学一些任务，然后通过你任务的完成来看看你的科学素养。如果我觉得你做的很好的话，就会给你写，而且这样写出来的也会比较有针对性！好像汪丁丁老师会给班上前三名写。

同学：希望申请经济学博士，但是个人感觉可能申请不到好学校，所以先以硕士为目标。

黄卓：推荐康奈尔还好。我觉得要么看学校要么看专业，当然也可以看城市。当时有个普林斯顿大学，我跟这边的老师交流会比较多，那个老师就问我是不是想去普林斯顿念书，并且说可以跟我们系主任沟通，我当时不是很喜欢那所学校就没有去。你要是很想去念学校的研究生，可以多跟那边的老师多沟通。你想一个是冰冷冷的GPA，一个是经常问问题的勤奋好学的学生，你觉得哪个更有优势？所以学生要多跟老师沟通。

同学：我可能也会比较喜欢学术，但是我个人觉得一辈子都坐在实验室里，这种生活我就不太喜欢。

黄卓：这个完全可以。你要学会理解别人的选择和生活方式。

同学：怎么样选择老师来给你写推荐信

黄卓：越容易得到的东西越不珍贵，一个老师如果很轻易的给你写推荐信那一定不够水准。你要让老师了解你，认识你，你希望别人怎么看你的材料，那你要想好。没用

的资料放上去反而会使得简历失去应有的精彩。

同学：很多物理学院的同学去做金融，认为那种生活很光鲜，那么老师结合您在华尔街的工作，您认为那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黄卓：当然会很累了。但是我觉得不妨多进行一下尝试，你可以通过做不同类型的实习来看看自己真正适合什么，到底是做学术呢还是走职业化的金融这条路。我当时在华尔街的时候确实感到比较累，那我就回来继续做做研究，慢慢的发现自己更适合后者，所以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撰稿人：朗润之声 柳舟 张文

“聚焦朗润·对话双办”交流活动第三期精彩实录

活动简介：朗润春深，第三季“聚焦朗润·对话双办”特别邀请到李力行老师加入到双办老师面对面活动之中，与同学们进行深入交流。

一、选择双学位，路在脚下

同学：李老师您好，我之前在参加一些活动的时候发现很多无论是学术还是职业上做的比较成功的人大都有比较好的教育背景，比如说毕业于名校啊或者是博士什么的，那么是不是说学历在你的职业生涯中会比较重要？

李力行：这个不一定是这样的，当然你也要分专业分方向以及每个人的性格特质来看。有些比如说要做高精尖类的专业的学术研究，那么可能继续念书不断充实理论知识比较好。如果是一些实践性比较强的工作，也不一定非要在学校里面才能获得成功，而且不要把学习这个事情看得特别孤立，不一定只有在学校才能进行学习，进入职业岗位后你每天也在不断学习，我没有觉得学历是唯一的决定因素，很多时候个人的能力也还是很重要的。

勾雪：我觉得很多时候你在社会上做的跟你在学校里学的可能也不怎么相关，之前有一个学生一直在学校念书，后来申请取得纽约的一所大学，继续念物理学位。后来他找工作的时候用的是物理学博士和五六年前拿到的经济学双学位学历在华尔街做金融，所以说每个人的道路真的不一定一样，但是我感觉会跟你的第一份工作相关性很高。

同学：那如果学历不够的话进入职场很多事情不会做岂不是很尴尬吗？

勾雪：不会啊，你在以后工作中的学习

能力也很重要啊。不是说进入社会后就终止了学习，你在学校里面是在学校其实在工作中也是在不断地补充新知识，只是可能形式跟学校这种不太一样而已。

同学：可以请老师们介绍一下 Baruch MFE 暑期项目吗？

勾雪：首先就我对 Baruch 在咱们这的招生情况的了解：他们在北美地区的排名很高，是一个对学生很负责的项目，他们的系主任每年都会在毕业季的时候和已毕业的华尔街的校友讨论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而且他们对我们的招生没有上限人数。另外对暑期项目而言这是一个双向了解的机会，让美国顶级的金融机构了解我们的学生，让我们的学生近距离的接触金融工程。

同学：老师您有建议的经济类硕士就读学校吗？以及您知道它们的具体排名吗？

李力行：我觉得你的问题比较泛。经济和金融类不太一样。经济类硕士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大都数的经济类都是 PHD，走学术路线的更多。金融工程和金融硕士又不太一样。排名我也不太清楚，但是美国的理念是专业型硕士是专业型硕士，兼顾学术和工作不太可能。那么像杜克和波士顿大学是一个相对较好的平衡，可以作为一个跳板。

同学：能请老师介绍一下国内商学院诸如光华、CCER、经济学院的培养模式吗？

李力行：现在的话，学术型硕士的开设越来越少了。现在像我们 CCER 还比较偏重学

术，但是像经院和光华更多的是偏向于就业。

勾雪：说到这里我想提一下汇丰商学院，近日听我们一个双学位校友反馈，这位校友是某央企的 HR。汇丰的同学从面试表现到职业素养都不错。可见他们在读期间还是很看重学生职场能力的培养的。

同学：那么国发院的研究生是怎样申请的，对绩点是怎样要求的呢？

勾雪：我建议你跟我们的蒋老师聊一下。一般你要在本专业排名前百分之十，当然推送进夏令营不是唯一途径，还可以参加正常考试。不过绩点真的不是唯一决定因素，很多你的个人经历或者科研成果也会给你的个人简历增色不少。绩点和其他经历成果是一个“或”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和”的关系，就是说成绩越高越好但不是唯一的入营或者推送到这边的唯一决定因素，当然成绩好更好，你要让我们看到的是你的学术潜质，绩点自然是很好的一个参考标准，但是如果能够拿出来其他的有效证据也是很好的！

同学：我也很想问一下咱们的财经新闻项目。

勾雪：这个可以跟咱们的校友王海明老师沟通一下，那是个很好的项目，记得最初海明老师在采访时很多金融界的大牛时都会带上奖学金班的同学，那是多么难得的机会。而且财经班会定期开办各类讲座进行专业指导，定期请一些优秀的传媒人进行交流，而且可以去 21 世纪经济报道做相关实习，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它有一个入学考试，一年一次每年的 10 月份大概，到时候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官网及时报名！

二、本科生科研正当时

同学：怎样看待我们的本科科研实践？

李力行：很多老师可能不是很愿意带本科生做科研项目，但是我们国发院的赵老师的社会调查实践课是针对本科生做的一个很好的科研项目。我觉得本科生如果真的可以忍受住参加调研的艰苦条件还是会很有收获的。

同学：好像之前有的学生参加了但是据说条件特别艰苦，我同学甚至还说以后都不会再做科研了！

其他同学：没有吧，我参加的那个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可能是分到的地方不一样。而且我觉得去农村也挺好的，是对其他生活的一种补充吧，很开阔视野。

李力行：想赵老师这样有一个跟同学一对一的交流，是一种很有规模的并且规范的指导是很好的。很多本科生的 paper work 要多于实践，总是找我来签字而不是跟我一块做项目，那么我觉得很多时候还是不够的。所以大家有机会参加老师开放给我们的 work，还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很多时候也不用紧张，看看别人都在做什么，自己加以尝试。很多时候学习是一个会有 peer pressure 的事情。

同学：我们物理学院的本科生科研项目对于学生的专业素养要求比较高，大家都要有自己的计划，可能是因为人不多所以老师可以进行较为详细的指导。比如说我想跟这个老师做项目，那老师先会给我们一段时间让我们尝试一下，大概时间为半年，之后你再决定。当然也有同学做了半年后觉得不合适就 quit 了。

李力行：那我觉得如果半年后放弃的话，

这个时间浪费掉了就挺可惜的。其实很多人也不一定走学术这条路。

同学：比如说之前我们物理学院院庆的时候，来了很多校友，大部分做的很成功的基本都不是在做物理本专业的科研，而是转行做了其他的比如金融、律师等。有很少的一部分人是做物理本专业的科研的，有些是院士，但是这样的校友并不多。哈哈，以致于我们的老师也挺尴尬的，因为本专业做的好的毕业生为数不多，大多还都是转换了方向的。

三、校友情，齐分享

同学：老师我之前做了比较多的创业项目，比如主题书店，最近在做一个蛋糕店，当然也参加过一些类似于挑战杯这样的大学生赛事。不知道这些是不是可以在申请的时候弥补一下绩点的遗憾？

勾雪：我们之前有一个双学位的校友是自己创业的，他做的是跟食品相关的，他说自己之前也有过创业经历，那些之前的尝试对自己以后的创业其实是很好的经验积累。我觉得你的很多努力跟想法都特别好，不一定紧急把眼光局限在能不能申请到夏令营这件事情上面，当然我觉得这些对于申请夏令营也很有帮助，我想说的是你可以去尝试更多新的东西，并且真的很鼓励自主创业！

同学：咱们的校友这块应该有很多资源可以利用吧？

勾雪：对！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多跟我们的双办老师进行交流，很多校友会提供各种

信息和工作机会给我们，让双学位同学优先享。

同学：很多外校的同学很希望推到北大来进行学校，以我们学校申请新传为例，很多即便拿到了外推资格，也会在复试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那么老师我很想知道您作为一个老师在复试的过程中会更看重学生的哪些素养？

李力行：这个东西有时候会比较个人化，就拿我们的硕士生来讲，我们在面试的时候是看重学生的学术潜质，如果您是说实习的话，我们会更看重你从实习中得到了什么。而且大家可以进行一下换位思考，你要想比如你是老师你想要筛选什么样的学生。

勾雪：我们之前有一个学生呢各方面非常优秀，在我们办公室已经做了将近半年的学生助理，其实他应该很清楚院里老师风格了。但是在面试的时候却被老师认为不能进入院里读书，他甚至不敢看着老师的眼睛进行面试交流！事实上他在园子一年多的实习经历是他一个巨大优势但是他没有展现出来，很遗憾。还有一个学生呢，他在面试的过程中就很会把老师的注意力吸引到自己这边来，让自己占有主动，如跟老师谈论自己比较关注的并且十分感兴趣的体育问题啦。所以把面试的话题尽量往自己擅长的这块拉一拉也算是一个面试的小技巧吧。

撰稿人：朗润之声 柳舟 张文

感受金融职场风云

记职场沙龙之金融专场

2014年3月22日（周六）晚上19:00至21:00，众多经双同学相聚在二教316，参加CCERClub“职场沙龙”第一场——“金融专场”。三位金融行业打拼多年的经双校友回到母校，介绍了各自在金融行业求职的心路历程，并为学弟学妹们答疑解惑，指引迷津。

就职于中信证券的刘恺学长率先发言。他用数十张PPT，讲述了自己从校园生活到求职发展的不凡道路。在自我介绍环节，刘恺师兄亮出自己在台湾参加综艺节目的照片，博得大家的喝彩。在回顾个人求学经历时，他总结了四点：第一，他积极参加各项国外交流项目；第二，他喜欢“折腾”，为了挑战极限，选了许多课；第三，有得必有失，由于经常出国交流，他也遇到不少坎坷，曾有两个春节未能回家；第四，他加入路劲奖学金班，在那获益匪浅。说到这里，刘恺学长介绍了一种“递推”的选择方式，启发大家在做出选择之前先想好自己最终目标是什么，紧接着一步一步推算自己当下做的事情是否有利于最终目标。最后，他讲述自己在求职期间的海投战术，并告诫大家，外资投行的基本条件是语言和聪明才智，而交流经理、金融知识、绩点等则为加分项。

紧接着发言的是来自宜信公司企业发展部的曾妍学姐。她表明自己从刚进大学开始就坚定自己早日进入职场而非继续学术的信念，于是，她在大学期间积极参加各项实习工作。在财政部，她获得了第一份实习机会，并在那段时间里改变了自己的价值观：尽管自己很难改变世界，但只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改变自己的小世界，就是有价值的事情。毕业后，曾妍学姐有过跳槽经历。起先，她入职于工商银行某分行，从事中小企业贷款业务。半年后，她申请去支行担任行长的助理；又过两年，她选择离开工行，进入宜信。“在工行，就像在机器里一样生活。我希望自己能往管理方向走，宜信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很满意。”曾妍学姐说道。对于自己的跳槽经历，她做出这样的感悟：世界上没有哪份工作所谓的“金饭碗”，只有你自己才可能成为“金饭碗”，前提是你能力要足够。

第三位发言的是来自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的吕宏品学长。“投行是条不归路。”吕学长一开口便感慨道，他十分好奇同学们为何对投行有莫大的兴趣。在与同学们进行闲聊式的简短沟通后，他开始讲述自己在纽约摩根士丹利参加培训的的经历。接着，他着重介绍投行的各个部门。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劝诫大家：在投行之前一定要先想好自己投行的目的是什么，否则在真正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将会经历低迷期，这样容易耽误自己的时间；另外，在求职时要先摸清每家企业的业务特色，尽量不要海投。

在三位前辈皆讲述完各自的心路历程之后，本次沙龙开始进入提问环节。同学们踊跃发言，分别提出许多有代表性的问题，如：投行中各个部门的发展前景如何？在私人银行中如何与气场不合的顾客沟通？可以通过哪些渠道了解各类公司？在金融行业中如何发挥复合型

优势？如何理解量化投资？等等。面对同学们的问题，刘恺学长和吕宏品学长一一进行耐心的分析、解答（期间，曾妍学姐因公司事务提前退场）。

最后，在主持人的提议下，刘恺学长和吕宏品学长分别为经双校友献上各自的寄语。吕宏品学长表示，希望各位同学在选择职场道路时要慎重，多多了解各行业的情况。刘恺学长则劝诫大家在本科阶段不要虚度光阴，莫给人生留下遗憾。

在热烈的掌声中，本次职场沙龙圆满结束。

撰稿人：朗润之声 罗彤

CCERCLUB “职场沙龙” 国企公务员专场活动总结

2014年6月14日，CCERCLUB“职场沙龙”国企、公务员专场，顺利在国家发展研究院512会议室举行。我们请到了北京市水务局的曾铎师兄和北京市税务局的乔丹师姐与大家进行了交流。



师兄师姐首先介绍了自己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及单位面试的求职经历。乔丹师姐笑称自己是误打误撞参加了国考并通过了，并给大家提供了参加单位面试的第一手经验。曾铎师兄介绍了自己毕业考研、找工作的历程，并跟大家分享了自己9年来从发改委到税务局的工作经历，强调这份工作需要奉献精神和服务意识。

随后，进入了问答环节，同学们就参加国家公务员考试、经双对于求职的帮助、公务员的薪酬和晋升机制等方面对嘉宾进行了踊跃的提问。师兄、师姐均表示经双对自己的求职

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并指的公务员职位需要经济、对于大家关心的公务员薪师兄师姐提供了很多详细表示公务员的薪酬相对不有工作稳定、社会地位高对大家的提问，师兄师姐经验，为有意进入公务员提供了报考、备考以及争取晋升等方面的具体建议。



出越来越多金融类人才。薪酬福利问题，的内部数据，高，但是也等优势。针结合自己的队伍的同学

短短两个小时的交流结束了，师兄师姐真诚耐心的现身说法赢得了现场热烈的掌声。相信通过这次活动，大家对公务员、国企行业的求职又有了新的收获与认识。

撰稿人：CCERClub 职发部

CCERCLUB 本科生科研经验分享会

活动简介:

2014年4月13日,“薪火相传”CCERCLUB本科生科研经验分享会在北京大学第二教学楼527教室成功举办。

本次交流会由CCERCLUB学术部主办,邀请到了四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已于2013年暑假顺利保送CCER研究生的北京大学物理学院2010级本科生冯涛师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2011级本科生、CCERCLUB副主席周越师兄、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2011级统计系本科生王庆涛师兄和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2011级本科生黄亦磊师兄。



四位嘉宾为本次经验分享会做了充分准备,并且在本次交流会上分别展示了个人科研经历中的过程、经验和教训。

冯涛师兄站在一个刚刚保送进CCER的本科生的角度,为同学们详细地讲解了准备保研论文的具体流程和心路历程,告诫同学们本科生科研不要盲目追求创新,而是要先训练和展示自己的潜力,别人才能够看到你的潜力。

随后周越师兄做了简短的发言,用亲身经历鼓励大家“文科生也可以做本科生科研,不要被所谓的数学知识吓倒。”

和周涛师兄作为本科生科研搭档的王庆涛师兄,以幽默风趣的语言、简洁凝练的pre展示浓缩了他个人经历中的一些精华部分,从如何找导师、如何找队友、如何做科研几个方面和在场同学进行了交流分享,分享过程中教室里充满了笑声,气氛轻松诙谐。



继王庆涛师兄之后，地空学院的黄亦磊师兄也就个人的本科生科研向在座同学提出了三点建议。语气诚恳、内容实在、充满生活气息、极具可操作性。

分享会大约历时一个小时，分享部分结束后，同学们纷纷离开座位，找到自己熟悉、欣赏的嘉宾进行一对一的交流，交流气氛非常热烈，在一个个小团队中不时传来笑声和争论的声音。



周日中午 12:30 交流会正式结束，同学们在互相留下联系方式之后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会场。虽然只有短短两个小时的交流，但是同学们收获了师兄们宝贵的经验教训，明确了自己未来努力的方向，并且有相当一部分同学在本次交流会上找到了志同道合、共同搭档的小伙伴。毫无疑问地，本次交流会达到了它的预期目的，主办方和听众们都表示这次交流会的内容让人受益匪浅。

撰稿人：刘一璇

2014~2015 学年 CCERCLUB 骨干通讯录

姓名	职务	邮箱
王赫	主席	wh314@126.com
柳舟	副主席	762528518@qq.com
丁聆	副主席	lindading0328@163.com
刘东奇	副主席	ldq451@pku.edu.cn
周敖	主席团助理、职发部副部长	zhouao8@gmail.com
屈博雅	主席团助理	fossqu@gmail.com
张舜栋	实践部部长	1187615282@qq.com
张啸	职发部部长	aqxznet2008@163.com
胡禛	朗润之声工作室部长	huzhenpku@163.com
刘一璇	学术部部长	695628307@qq.com
于一	外联部部长	yuyi198707@126.com
洪艾菲	内联部部长	hyfeiffle@163.com
李省辉	实践部副部长	1196043444@qq.com
阎晓韵	职发部副部长	yxy940617@163.com
及桐	朗润之声工作室副部长	tongtongji1219@163.com
张文	学术部副部长	841831929@qq.com
沙凡	外联部副部长	sf_pku@sina.com
邬翊歆	外联部副部长	yixin930104@163.com
邵轩	内联部副部长	shaoxuan@pku.edu.cn
刘晖	内联部副部长	1100012196@pku.edu.cn

“勒石朗润·寄语国发”

——二十周年会刊众筹

一转眼，当初的 CCER 已走过 20 年春秋，更扩展成为如今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值此 20 华诞，国发院希望出版一本纸质特刊，做为对师生们奋斗青春的永久的纪念。

我们采用众筹的方式，来集资出版此本国发院特刊《朗润之声》，特刊深度对话国发院的良师益友，中间特别设计了纪念专栏，学院每一位出资参与众筹的校友，我们都会将其名字和祝福话语“镌刻”在杂志之中，做为他们曾经作为“CCER 国发人”的永久纪念。

众筹单位最低 10 元/人，不设上限，且捐款数额均以 10 元为单位。此活动从 2014 年 5 月启动至 2014 年 8 月 31 日结束，共筹集资金 980 元。参与众筹的 26 人是（按拼音排序）：

蔡晨、曹文、柴亚君、戴锴、邓运强、董璐、方洋、封春升、郝园林、黄楚楚、蒋莘野、李梦飞、李一冕、刘赫、刘一璇、马潇南、任江华、王皓冉、吴婕、徐长鸣、杨政、张亮韬、张舜栋、张晓光、甄儒明、周佳程。

部分筹资者还通过支付宝留言或微信留言的方式表达了他们对国发院深深的祝福和对朗润园深深的眷恋，我们也特此将这些留言列出如下（按拼音排序）：

曹文：历久弥新，光芒永驻！

封春升：感谢国发院的培养！

郝园林：惟有报国，以哺师恩。

黄楚楚：祝国发院越来越好！

李梦飞：愿国发院越来越好。

刘赫：祝国发院越来越强大！

刘一璇：圆梦朗润。

吴婕：回忆，感谢，祝福。

徐长鸣：祝 CCER 永远充满生机与活力！

杨政：朗润已成为我做人的准则。

张舜栋：祝国发院越来越好！

张晓光：祝福国发院多创新，永辉煌！

周佳程：愿朗润园树木常青！

2014



欢迎关注北京大学国发院经济双学位微信平台
微信号: jingshuang-pku